八位大学校长

◆蒋梦麟 ◆胡适 ◆梅贻琦 ◆张伯苓 ◆竺可桢 ◆罗家伦 ◆任鸿隽 ◆胡先骕

智效民／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本书简介

本书展现20世纪上半时中国8位著名大学校长的教育理念和丰富实践。

蒋梦麟（1886—1964），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任北京大学校长。

胡　适（1891—1962），1928—1930年任中国公学校长；1945—1948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梅贻琦（1889—1962），1931—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

张伯苓（1876—1951），1919—1948年任南开大学校长。

竺可桢（1890—1974），1936—1949年任浙江大学校长。

罗家伦（1897—1969），1928—1930年任清华大学校长；三四十年代任中央大学校长。

任鸿隽（1886—1961），1935—1937年任四川大学校长。

胡先骕（1894—1968），1940—1943年任中正大学校长。

这8位校长有7位留学美国，张伯苓早年虽未留美，同样深受欧美教育思想的影响，曾获哥伦比亚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他们花大力气将西方科学精神和教育理念引入中国，对北大、清华、南开、浙大、中央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的建设，对现代中国教育与学术体制的缔造，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积累下宝贵的经验。本书不随流俗，不囿偏见，择其要者一一勾勒出来，颇具参考和研究价值。


00737913

八位大学校长

蒋梦麟　胡　适　梅贻琦　张伯苓

竺可桢　罗家伦　任鸿隽　胡先骕

◆ 智效民 / 著


2006 5 26
藏书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八位大学校长/智效民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1

ISBN 7-5354-3225-5
Ⅰ.八…
Ⅱ.智…
Ⅲ.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Ⅳ.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60911号

策　　划:刘硕良　吴　超　　美术设计:张宝英
责任编辑:丁立华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B座9-10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本:640×960毫米　1/16　印张:13.25　插页:2
版次: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180千字　印数:1-8000册

定价:22.00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目录

前　言

看他们怎样当校长

智效民

中国的教育改革向何处去？这是当代社会共同关心的一个大问题。

教育改革是从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以后开始的。从那以后，"上大学"成了每一个学子的最大心愿。无论学生、老师、家长，还是整个社会，都为此付出巨大的努力和投入，并且取得多方面的增益和进步。然而，这种努力和投入换来的不只是正面效应，还有应试教育模式得以形成的诸多流弊和后果。这种情况，正如我在一篇文章中所说："为了找一份好工作，几乎所有人都把考大学视为最好的出路；孩子们从入学开始，就要被训练成考试机器；至于人格的塑造、学习的乐趣和研究问题的习惯，则很难在教育中体现；即使所谓素质教育，也要为高考让路。"（《科举百年祭：不要为科举制度招魂》，《南方都市报》2005年9月12日）与此同时，片面理解教育产业化的办学思路，让一些学校成为谋利场所；不正常的学术评价体系和官本位体制，又让学术腐败和行政腐败愈演愈烈。大学本来是崇尚进步、弘扬真理的文化圣地，是通过求知、问学来塑造灵魂的精神殿堂。但是这一切，却使我们的大学有变成等级森严的官场和追名逐利的市场的危险，从而削弱以至失去本来应该具有的功能。长此下去，我们的精神家园将不复存在，我们的现代化将会因为丧失精神支柱而患上软骨症……

这种"盛世危言"与我们对教育的理解有关。对国家来说，现代教育的宗旨究竟是为了选拔人才、培养精英，还是为了开启民智、培养公民？就个人而言，受教育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找份工作、混碗饭吃，还是为了让人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另

外,学校与政府、学校与社会、学校与教师学生的关系如何？这种关系应该怎样处理？也是需要我们认真反思的问题。这些问题也许太大,一时难以澄清;但是看看当年老校长的教育理念、治校方针、行为方式和人格风范,相信会大有助于我们找到正确的答案。

近年来,我在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时候,接触到许多这方面的材料。本书展示的八位大学校长,曾为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值得重视的思想财富。只可惜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对这份遗产重视不够,研究不够,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受极左思潮的影响,简单地片面地加以否定和抛弃,这就使原本来之不易并有一定积累和生命力的现代学术传统和教育制度被人为地中断,导致许多原可避免和减轻的失误与弯路。因此,我希望本书所涉及的问题,能够引起教育界的关注,也能为莘莘学子及家长提供一些参考。

为了帮助读者了解本书的主要内容,我把这些老校长的人格风范和可资借鉴之处概括为“懂教育”、“负责任”、“重人才”和“无私心、有魄力”四个方面,先做些介绍。至于他们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为争取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而做的努力,以及背后那些有趣的故事,在书中还有详细的探讨。

一、“懂教育”的含义是:一要有正确的教育理念,二要摒弃官本位意识

一谈到“懂教育”,人们往往在管理层面考虑较多,而对管理者的定位以及学校的职责关注不够。其实懂教育的含义应该是:既要有正确的教育理念,又要有明确的自我定位。

五四运动时期,著名哲学家杜威来中国时曾经说过,动物的教育偏重于形体方面,而人类的教育还包括心理、知识和道德等方面,因此人类教育比动物教育的时间要长得多。这里所谓心理、知识和道德,是人文教育的主要内容。因此要树立正确的教育理念,就必须了解什么是人文教育。近年来,人文教育的缺失和应试教育的危害引起广泛关注。但是在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人们并不注意人文教育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其结果还是不能理解教育的真谛。

所谓人文教育,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一种全新的教育理念,其核心是反对神权,提倡人权。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是万物之灵,每个人都有通过独立思考来认识世界、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利,而教育本身就是启发人们独立思考,让人们认识

世界、享受生活的一个过程，因此人文主义教育是对个人能力和生命价值的最大肯定。

这种理念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作品中有深刻体现。比如拉伯雷在《巨人传》中就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国王的儿子卡冈都亚起初接受的是经院教育，那些空洞的知识和死记硬背的方法使他越学越傻。后来国王请来人文主义学者，教他学习文学、数学、几何、天文、地理、医学等知识，并注重体育、旅行、探险和参观各种游戏，才使他聪明起来。为此，卡冈都亚让自己的儿子也接受人文主义教育，结果是一代比一代更聪明。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今教育的主要问题就不仅是经费短缺，更重要的是手段落后，观念陈旧。多少年来，受传统思维和现实功利的影响，人们往往把教育局限为培养人才的一种手段，把上大学当作改变命运的最好途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教育在饱受经费不足之苦的同时，成了全社会最关心的问题，也成了许多学生、老师和家长的最大负担。于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口号便成了“书中自有黄金屋……”的翻版，一年一度的高考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科举制度的再现。

出现这种尴尬而荒唐的局面，与现代教育模式有关。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们被大工业生产的威力所震撼，也想把学校办成工厂，教室办成车间，让校长成为厂长，教师成为工人。在这种情况下，学生便只能是任其加工的原料或零件了。他们本身所具有的天赋与无限可能性，便淹没在这种“大工业生产”的流程中。这种新的教育模式在清朝末年传到中国以后，曾经起过积极作用，并形成废科举、办学校的社会潮流。与此同时，单纯注重实用的教育观念也承袭洋务运动的衣钵，在较长时期甚嚣尘上。好在当年还有蔡元培、胡适、梅贻琦等一大批教育家看到了其中的危害，再加上办学自由、教育独立等制度保障，才在可能施加影响的范围内没有出现较大的弊病。可是历经种种变革和冲击，包括照搬苏联经验之后，教育领域的“批量性人才生产”的弊病便日益显露出来了。

然而，学校是一个单纯传授知识的地方吗？学生是任人加工的原料或零件吗？学习仅仅是为了将来的工作做准备吗？有用人才能够轻易地进行大批量生产并通过考试来检测其合格与否吗？让我们看看先哲的观点和做法，就可以发现这种想法是多么片面有害。苏格拉底说，真正的知识存在于人的内部，教师的作用是唤醒潜藏于学生内心的知识，使之达到意识的层面。因此，他认为教师应该利用提问和对话的方式来激活学生的潜在意识，而不只是传授知识或智慧。杜威也认为，人的

知识和经验是自身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如果教育不能适应受教育者的内心需要，而是成为一种外来压力，就会扼杀人的天性。基于这一理念，他在提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未来生活的准备"的同时，还指出现代教育的失败，往往是因为人们"把学校当作一个传授某些知识，学习某些课业，或养成某些习惯的场所"，其结果不仅扭曲了教育的目的，也使人们为了虚幻的将来失去现在。这种思想在中国古代教育中也有深刻体现。孔子所谓教学相长，明清时代书院里先生对学生的人格熏陶，就是最生动的体现。可惜随着社会的变迁，这些传统未能得到认真的传承发扬，才使我们的教育变成今天这种模样。

由于人们把大学误认为是单纯学习知识的地方，因此许多人上大学选专业，往往是为了将来找个好工作，这反映了大家对教育的误解。如今大学的专业设置过多过细，就是违背大学宗旨和教育规律的具体体现。另外，我们的教材越来越深，科目越来越多，课时越来越长，作业越来越重。学校总想用考试来管理学生，甚至把考试当作赚钱发财的手段。有人说现在的学校成了严酷的训练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大学校长如果没有正确的教育理念，不明白教育的真谛，即便是具有很强的管理才能，也不可能把学校引上正路。

懂教育的第二个含义是指大学校长一定要摒弃官本位意识，给自己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

由于现行体制和文化传统等原因，中国的官本位意识浓厚。许多人以为大学校长也是官。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说鲁迅没当过什么官，但胡适却当过驻美大使和北大校长；还有一篇文章说，胡适多次出国是拿着公款旅游。这些话说明了作者的无知。他们不知道：第一，大学不是一个行政机关，因此大学校长不是官；第二，当年文化教育经费的管理与现在不一样，不可能是校长"一支笔"说了算。

既然大学不是行政机关，那么它是个什么地方呢？对于这个问题，蔡元培有很好的解释。他说：大学不是贩卖毕业证和灌输固定知识的场所，而是一个研究学理的地方。这地方采取的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态度，奉行的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原则。因此，校长不是一个行政长官，而是一个学术研究的组织者、领导者。他既没有仅仅服从上级的义务，也没有裁定学术思想的权力。他的最大职责是提倡思想自由，维护学术尊严，争取教育独立。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因为不能履行这些职责，只好愤然辞职。他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中说，他每天被一大堆无聊的公文和事务所包围，还要迎来送往，与教育部那些一知半解的官员

周旋，因此他感到痛苦不堪。另外，他认为"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因此在他主持北大校务的时候，为了"稍稍开点风气，请了几个比较有点新思想的人，提倡点新的学理、发布点新的印刷品"，但当局却把这种做法视为洪水猛兽进行干涉。因此他声明"我绝对不能再作不自由的大学校长"了。这使我想起前不久陈丹青辞去清华大学特聘教授也是因为自己的见地和做法难于实现。我举这个事例，并不是主张凡遇类似事情就采取蔡元培的做法，而是说真正的大学校长应该有这种理念。陈丹青辞职的消息传出后，网上有篇文章，意思是说陈丹青不玩了，但我们还要玩下去。不过，我们继续玩的目的不是迁就错误，而是为了解决问题。陈丹青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很欣赏这个观点。因此我认为懂教育的含义是绝不要把校长当成一个官。只有这样的校长，才能把学校办好。

二、"负责任"的含义是：一要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二要防止把他们变成不会思考的机器，三要鼓励他们实行自治

因为校长不是官，他的主要任务就不仅仅是对上级负责，而且更要对学生负责。但是负什么责任，如何负责任，却大有讲究。

所谓对学生负责，首先是要培养他们研究学问的兴趣。许多人以为研究学问是学者的事，其他人不必介意，这是错误的。1929 年 7 月，中国公学 18 级学生毕业，担任校长的胡适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这句话就是："不要抛弃学问。"他还告诫大家：以前的功课也许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就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即便是为了吃饭考虑，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到那时候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就太晚了。

这里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上大学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了解决"饭碗"问题，还是为了让生命更有意义？许多人把上大学当作"抢饭碗"（蔡元培语）的敲门砖，一旦文凭到手，就以为不需要做学问了。他们不知道，即使是为了吃饭，学问也具有长久的竞争力。因此，在当前社会不可能提供足够就业机会的情况下，不要抛弃学问，乃是每个青年最好的选择。何况，人生的目的绝不仅仅是为了找到一碗饭吃。

此外，对学生负责还有一个把他们培养成什么人问题。前面说过，由于学校像工厂，就很容易让学生成为“千人一面”的零件或机器。为了避免现代教育制度的这种缺陷，当年的老校长都大力提倡通才教育。他们认为，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前者是为了培养人，后者是想把人变成机器。

关于这个问题，爱因斯坦的话非常精辟。他说：“（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良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他还说：“……另一方面，我也要反对认为学校必须直接教授那些在以后生活中要直接用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种观点。生活所要求的东西太多种多样了，不大可能允许学校采取这样的专门训练。除了这一点，我还认为应当反对把个人当作死的工具来对待。学校的目标始终应当是：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个专家。照我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发展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应当始终放在首位，而不应当把获得专业知识放在首位。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那种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对照这两段话，就可以发现我们的教育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在对学生负责，让他们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方面，电机专业出身的梅贻琦和气象学家竺可桢看得最清楚，努力最有效。

梅贻琦是1931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他一上任就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科的不必注意理科，学工科的不必注意文科，这种看法似乎狭隘了点。学问范围务必要广，这不仅能使我们对人生观和世界大势有一种全面的了解，还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趣味和工作效率。他强调，大学教育的目的，“确乎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而在于“培植通才”。因此，即使是工业方面的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相比之下，“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认识倒是比较次要”的了。

竺可桢认为：“现在大学教育，注重各种专门知识之传授，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这不仅不利于科学精神的形成，而且还会导致“社会道德与政治风气之败

坏。”为此,他一方面倡导人文知识和科学知识并重的通才教育,一方面主张在大学应该推行导师制。他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大学学风的好坏,全看教授如何。假如大学教授能够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学校自然会养成良好的风气。他还说:大学教育不是要给学生现成的知识,而是应该教给他们求知的途径和方法,培养他们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1936 年 5 月 18 日,竺可桢在就任浙江大学校长时指出:“学校不是一个工厂……大学目的,不在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而在乎使他吃起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因此,大学教育不应该把人变成赚钱的机器,而应该让学生懂得怎样做人,怎样生活。此外,他还告诫自己的学生,千万不要有做大官赚大钱的想法,否则就有变成贪官污吏的可能。在一次座谈会上,他对刚刚入学的新生说:大学生是人生最快活的时期,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谋生的问题,因此大家除了诚实做人、勤恳求学之外,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这比单纯掌握一门实用技术更重要。在国难当头之际,他还痛切地对大家说:“我们国家到这步田地,完全靠头脑清醒的人才有救。”

竺可桢是哈佛大学毕业生。1936 年哈佛大学建校 300 周年时,他介绍了该校校长康诺德的办学方针:“第一,主张学校思想之自由,即所谓 Academic Freedom。反对政党和教会干涉学校行政与教授个人的主张;第二,学校所研究的课目,不能全注重于实用,理论科学应给予以充分发展之机会。”哈佛大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一流,显然与它的办学方针有关。这对我们那些想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校长们是个很好的启示。

值得注意的是,梅贻琦和竺可桢都主张大学一年级不分专业,都认为只重视专业知识而不重视人格操守的人,对社会的危害要比没有知识的人更大。因此如何正确地引导学生,并想办法改变那些不正常的状况,才是对学生负责。

除了激发研究兴趣,提倡通才教育之外,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也很重要。前几年杨东平编了一本名为《大学精神》的书,其中陶行知、蒋梦麟、林砺儒的四篇文章涉及到这个问题。陶行知创办了晓庄师院,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五四运动时,他写了一篇《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的文章,其中说:所谓学生自治,是对几千年来保育主义教育的反动,它“不是自由行动,乃是共同治理;不是打消规则,乃是大家立法守法;不是放任,不是和学校宣布独立,乃是练习自治的道理”。(《大学精神》第 261 页,辽海出版社 2000 年版)他认为:共和政体与专制政体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前者由自治的公民组成,后者由被治的顺民组成。顺民被治,尚可苟安;公民自治,则可太

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已经有不甘被治的要求，又没有实行自治的能力，那将是最可怕的一种局面。因此，公民自治是共和国的立国之本，在学校中培养学生的自治能力，是达到长治久安的必由之路。反之，如果我们的大学里不能用自治的方法培养公民，而是用管制的方法造就顺民，那么，我们的共和国就有名不副实的可能。在这篇文章中，陶先生还就学生自治的利弊、范围以及它与学校的关系等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在学校中实行学生自治不是为了争权夺利，不是为了驾驭别人，更不是要与校方分庭抗礼。学生自治的目的，一是为了培养独立的人格，以改变专制时代大事小事都要由师长包办的习惯；二是为了让学生关心公众幸福、承担共同事务、明辨公共是非。他强调，凡是愿意做共和国公民的学生，只要大家不愿争权，而愿服务，不愿凌人，而愿治己，不愿对抗，而愿协助，不愿负气，而愿说理，就能把学生自治搞好。

蒋梦麟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过北京大学校长。他说："我觉得北大这么大的一个学校，研究学问、注重品行的件件都有，就是缺少团体的生活。所以我希望大家，一方各谋个人的发达，一方也须兼谋团体的发达。"（同上，第275页）他强调："学生自治，并不是一种时髦的运动，并不是反对教员的运动，是'移风易俗'的运动，是养成活泼泼地一个精神的运动。"（同上，第271页）

林砺儒早年在多所大学任教，上世纪50年代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教育部副部长。他指出："学生自治是学校里必不可少底训练……我们中国人向来没有自治底习惯，也可以说中国人旧习惯和团体自治正相反对。因此，学生自治在中国学校里，更该负起改造国民性底重大使命。"（同上，第278页）这说明，学生自治既是老一代教育家的共识，也是大学生进入社会的必要准备。然而时至今日，国人对此还没有清醒的认识。举一个众所周知的事例：许多大学为了维护秩序，雇佣大量保安人员，而对怎样激发当代大学生自理、自律、自强、自信的观念和能力就想得不多，做得不够了。

写到这里，又想起近年来关于大学生道德滑坡的议论。值得玩味的是，尽管有关部门一再强调德育课如何重要，但不少学校的这一课程却始终处于"教师不好教，学生不爱学"的尴尬境地。我认为，如果我们的校长、老师和有关方面的负责人能够仔细研究一下学生自治的真谛，弄明白"智育注重自学，体育注重自强，德育注重自治"（陶行知语）的道理，这个问题的解决就会出现新的途径和前景。

三、"重人才"的含义是:不仅要礼贤下士,还要无为而治

所谓尊重人才,首先表现在求贤若渴、不拘一格降人才方面。在这方面,老校长们堪称后世表率。

蔡元培主持北大时,为了提倡新思想,曾聘请胡适、梁漱溟来北大任教。当时两人都很年轻,才20多岁,胡适还有个洋文凭,梁漱溟根本没有学历,后来钱穆去燕京大学任教也没有学历。相比之下,如今的大学门槛越来越高,非博士进不去,进去也呆不住。结果逼得许多四五十岁的大学教师为了一张博士文凭,不得不去充当现代教育制度的"老童生"。这其实是教育资源和人才资源的一种浪费。另外,如今大学对教师的聘任考核制度既繁琐又死板,大家对无穷无尽的考核和表格早已怨声载道。这种状况的形成固然与管理上的教条主义和文牍主义有关,但也隐含着对教师的不够尊重和信任。面对这种情况,陈丹青不能忍受,说这是"一格一格"降人才,可谓一语中的。

在求贤若渴方面,竺可桢值得称道。他担任校长后,听说马一浮和邵裴之的学问很大,被"杭州视为瑰宝",便多次登门拜访,请他们前来任教。谁知马一浮坚持学生必须登门请业,不能上门送教,才只好作罢。抗日战争开始后,马一浮带着许多书逃难,竺可桢帮助他度过难关,他才答应到浙江大学授课。

除了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之外,坚持教授治校的办学理念更是尊重人才的具体表现。竺可桢上任前,发现工学院院长朱一成不仅反对教授治校,而且还只拿着薪水不到学校,便觉得此人不堪重用。因为教授治校是竺可桢的一贯主张,他认为要想把大学办好,需要"首先觅得一群志同道合之教授也。"(《竺可桢日记》第一册,第26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可见对人才的尊重,不仅指物质上的满足、交往中的礼貌,还包括人格上的信任、工作上的支持、管理上的合作。

蔡元培也是教授治校的倡导者。当初他担任北大校长后,发现一切事务由校长和学监主任、庶务主任决定,连学长(相当于学院院长)也不参与,认为这种办法不妥,就主张成立评议会、教授会和各种委员会,分别管理行政、教务等事宜。这样一来,既体现了对人才的尊重,也为北大奠定了民主管理的基本体制。蔡元培说,有了这种制度,"就是一年换几个校长,对于诸君研究学问的目的,是决无妨碍的。"(《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342页)

在管理校务方面,梅贻琦则是另外一番气象。他的最大特点是不爱说话,因此

被人称为“寡言君子”。按照清华大学的规定，凡是学校规章制度、年度预算、新增项目、建筑设计……都要由教授会和评议会讨论决定，而教授会、评议会都要由校长主持。许多人在回忆中谈到，每逢开会梅贻琦都很少说话，而是仔细听取别人意见。作为一校之长，他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是因为他对自己扮演的角色非常清楚。他说他在学校就像京剧中的“王帽”一样，看似重要，却不大开口，主戏要让别人来唱。正因为这样，他在处理校务时总是非常尊重大家的意见，有一种“吾从众”的大家风范。在这方面，朱自清和曾经担任过清华中学校长的傅任敢都有很好的评论，有兴趣的读者会在书中看到。

说到无为而治，胡适是最有力的倡导者。1928年胡适担任自己母校中国公学的校长后，发现学校连一本正式校规都没有，便首先召开校务会议，通过了“校务会议组织大纲”、“教务会议组织大纲”和“学校章程起草委员会”等议案。有了规章制度以后，胡适便对学校事务不大过问。关于这个问题及其道理，书中有比较详细的介绍。需要指出的是，胡适的这个观点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陌生的，许多人一旦大权在握或负点责任，就想要搞出些名堂来。他们不懂得一个人智力和认识是有限的，因此“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轻易做一件坏事”一样，对人有警示意义。这也是胡适在1932年初次与蒋介石见面，就把自己写的、阐述这个道理的《淮南王书》送给对方的原因。可见奉行无为而治的原则，从另一方面体现了对人才的真正尊重。

无为而治并不轻松，而是把精力集中到大的方面、集中到大局的把握和要害环节上。我们从书中可以看当得好的大学校长是怎样恰当地理解和履行自己的职责的。

四、“无私心、有魄力”的种种表现

除了懂教育、负责任、重人才之外，无私心、有魄力也是老校长们的共同品质。

胡适当中国公学校长时，因为没有安排宿舍，不能天天到校办公，便主动不拿工资，每月只领100元车马费。后来他的其他收入减少，学校董事会董事朱经农过意不去，便写信劝他提高薪水，但他没有接受。

这让我想起原山西大学校长赵宗复。宗复先生的父亲赵戴文是阎锡山的密友，曾担任过国民政府内政部代部长、监察院院长和山西省政府主席等重要职务，

但是他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却参加了共产党，因此被称为“红色大少”。1949年以后，他担任山西大学校长，1952年院系调整时山西大学被一分为三，他改任太原工学院院长。当时他要捐献父亲留下的全部房产，组织上给他留下一个院子，于是他坚决不要学校的宿舍。工学院在城外，离他家很远，按级别他本来有专车接送，但他却每天骑自行车上班。赵宗复之所以如此，与其家庭出身、教育背景和政治信仰有很大关系。可惜，如今这种人几乎绝迹了。

梅贻琦也是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典型。他担任校长后，主动放弃了前任校长享受的几项“特权”，其中包括免交电话费、免费雇佣家庭帮工和免费拉两吨煤等待遇。他说：“虽然款项有限，但这是个观念和制度的问题。”直到晚年，他都要用自己的钱买办公室需要的火柴、茶叶、肥皂等物品，绝不公款私用。傅任敢认为：“在清华，一切没有私，一切是公开。因此，学术的风气才能增进。”

抗日战争中，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困难到极点，西南联大规定，学校给教职工谋的福利，没有领导的份。当时，梅夫人为了补贴家用，只好外出打工。1948年12月，梅贻琦离开北平。后来去了美国，生活非常艰难，年过花甲的梅夫人不得不再次出去打工。梅先生晚年病重的时候，病床下有一个皮包，皮包里放着什么，连梅夫人也不知道。梅先生去世后，大家才知道里面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丝毫不差。为此，曾经担任台湾清华大学教务长(后任校长)的陈可忠就此事盛赞梅先生廉洁奉公，人格伟大。但是刚从美国归来的孙先生却有另外一番感慨。他说他听到这话后内心非常难过，因为公款公用是校长的本分，如果一位校长做到了，只能说明他奉公守法，不值得褒扬。如果有人公款私用，那与偷窃、抢劫有什么两样？我简单介绍这个故事，是觉得孙先生的话应该给我们以强烈的震撼。

蒋梦麟在《西潮》中指出，“凡是亲见清室覆亡的人都知道：清政府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财政制度的腐败。公务人员的薪水只是点缀品，实际上全靠陋规来维持。”他还说，当时官员们把贿赂需索视为当然，就连被誉为“中兴名臣”的曾国藩也要为它辩护。这对社会危害极大，它不仅腐蚀了官员的公德心，毒化了社会风气，也导致一个政权的灭亡。蒋梦麟认为，消除陋规需要以良好的制度，在这方面，除了外国人管理的银行、邮政、海关、盐务、铁路等部门之外，由中国学者自己建立起来的现代大学制度，可以说是一种成功的典范。蒋梦麟的这个判断非常重要。如今的大学问题多多，与当年建立起来的大学制度中的良好一面被中断有关。

据《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记载，北伐战争之后，北京大学被贬为北平大

学的一部分，并沦落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帮助蒋梦麟重返北大，胡适与傅斯年等人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为北大筹集100万元，再加上北大的100万，用于聘请第一流教授和研究人才。蒋梦麟上任后，有一件事最能反映他的办事作风。当时，他曾对胡适等三位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辞退旧人是得罪人的事情。蒋梦麟之所以勇于承担此事，说明他的确是一位无私心、有魄力的好校长。

罗家伦也是一位正直无私、颇有魄力的负责任的好校长。1928年北伐成功后，他才31岁就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但是他却不大满意。他认为清华大学如果不能冠以"国立"二字，就仍然有半殖民地之嫌。经过一番努力，当局终于把清华纳入国立大学体系。因此，冯友兰把这件事当作中国学术教育走向独立自主的重要标志。走马上任后，罗家伦在争取清华基金的管理权、建设图书馆和实验室以及招收女生、奠定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等方面，都有很大贡献。这都反映了罗家伦的行政能力和办事作风。

我原来以为，当年老校长的风范已经成为绝响，因此，对当前教育改革的前景比较悲观。但是，最近在网上看到《瞭望东方周刊》对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的采访后，这种看法有所改变。在这次采访中，王校长谈到应试教育、官本位、高额学费、大学城圈地等许多热点问题，表现出少有的勇气。他说：

——高校应该是先进文明和主流价值的传播地。但是经过多年的应试教育，特别是高考前的巨大压力，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很多，对自私自利，考试作弊习以为常，自杀、厌学的情况并不鲜见。

——整个考务系统的经济利益非常巨大，在这个垄断经济中就很容易滋生腐败。近年来为什么考务系统屡屡出现泄题，或用高科技手段内外勾结作弊等现象，就是因为背后有巨大的利润。

——中国的教育还是官本位。大学被扣上行政级别，被赋予官衔，这是非常尴尬的。比如，有的高校校长被定为副部级。……大学的作用不在于行政级别高低，大学本来最应该体现社会公平，但是这种浓厚的行政化色彩让大学处境尴尬。

——作为校长有一点我体会最深。办大学不能赚钱，否则大学是办不好的。

——在全社会关注教育、教育消费占居民消费的第一位的情况下，我们的教育却出现这么多问题，应该说在管理上、规划上没有按照客观的规律去做。比如各地建大学城的问题，原本是件好事，却变味了，变成了政绩工程，变成了炒房地产，

完全背离了教育的宗旨。

——大学应该各有分工。国家应该明确按照大学类别，分不同层次设定不同的评价体系。每个层面的大学社会都是需要的，没必要去跨领域竞争。就像拳击一样，轻量级的不一定非要往重量级去打，无须为了挤进重量级而盲目地增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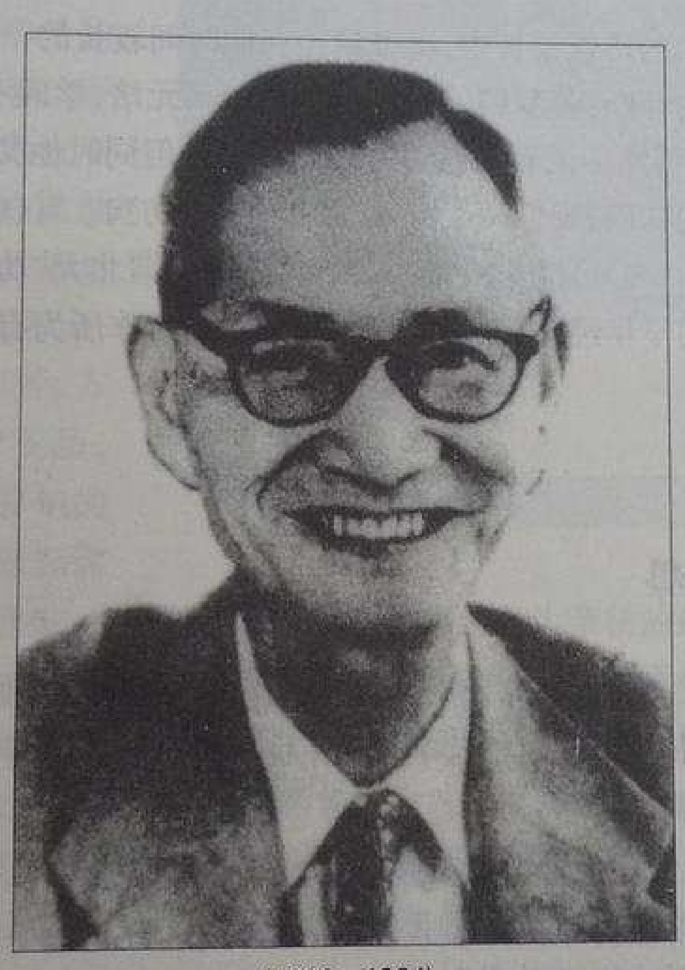
这些观点，击中当前教育制度的要害，也表现了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最近，我经常与朋友谈起知识分子的责任，大家认为，中国的许多事情需要好人来做。如果好人不做，就会为坏人留下空子。在这方面，中国太缺乏大智大勇、敢于担当的知识分子了。换句话说，尽管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阻滞，如果大家能够坚持不懈地努力，事情终归是能做好的，是有希望的。这也是我多年来坚持学术研究的动力所在。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事先并没有刻意设计，但本书脱稿后才发现，这八位大学校长几乎都具有在美国留学的经历。这恐怕不是偶然的。一来我这些年对欧美留学生比较关注，二来我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就应该向最发达的国家学习。蒋梦麟说，中国学者建立的现代大学制度，是一个成功的典范。因此，就好像欧洲文艺复兴需要到古希腊去寻找资源一样，当代中国的教育复兴，也应该从中国的先行者开拓者那里寻找资源。当然，这八位校长和他们领导的大学仅仅是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一部分或某些部分的缩影，至于这个制度的全貌，还需要有心人进一步研究；而且他们的思路和做法都离不开当时的环境和条件，自然不能简单地照搬到今天。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不过是抛砖引玉，不过是多提供点思考和研究的线索吧。其中的疏漏与错误，需要有识者不吝指正。

在本书的形成过程中，好友丁东和谢泳给予很大的推动和帮助；著名出版家刘硕良先生提出宝贵意见，付出很多心血；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离休副馆长阎立中先生和好友高增德先生提供了许多资料。借此机会，我表示真挚的感谢。

2005年6月初稿，同年10月改定

北大功臣蒋梦麟



(1886—1964)

北大功臣蒋梦麟

在北京大学的历任校长中，蒋梦麟是在职时间较长的一个。关于他的贡献，傅斯年曾有这样的评断：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不如胡适，但办事却比他们高明。对于傅斯年的看法，蒋先生是认可的，但同时他又开玩笑地说："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现代世界中的中国》第192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蒋梦麟为什么会成为他所谓北大"功狗"，其实也是北大功臣呢？这与他的早年经历、教育思想和在北大的所作所为有关。

一、早年经历

1、兴趣与理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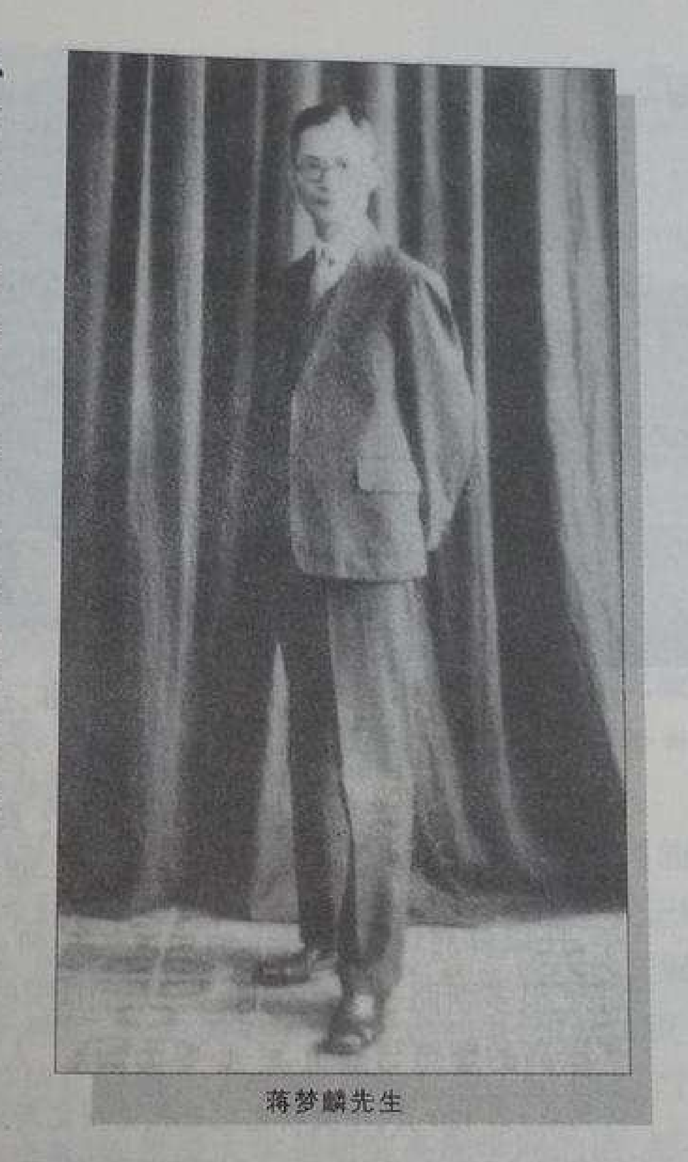
蒋梦麟字兆贤，号孟邻，1886年1月20日生于浙江余姚蒋村。出生时他父亲梦见一只熊来到他家，便给他起名梦熊。后来他在浙江高等学堂闹学潮，被列入黑名单，才改名梦麟。

蒋梦麟的祖父在上海开过钱庄，是个比较成功的商人。他的父亲是当地绅士，喜欢发明创造，曾经仿照西洋模式盖过一座洋楼，还造过一艘轮船。楼是盖成了，但轮船却因知识浅薄而失败。因此，他"一心一意要让他的儿子受现代教育，希望他们将来能有一天学会洋人制造神奇东西的'秘诀'"。（《西潮·新潮》第40页，岳麓书社2000年版）

蒋梦麟5岁多就进了私塾，由于痛恨那种死板的读书生活，曾经逃学回家，并

发誓要杀了先生，烧毁私塾。对于小孩子的这种恶作剧，他的继母和先生都没有当真。

尽管没有挨打，但蒋梦麟还是回到私塾，继续那苦不堪言的读书生活。他说：“在最初几年，家塾生活对我而言简直像监狱，唯一的区别是：真正监狱里的犯人没有希望，而家塾的学生们都有着前程无限的憧憬。所有的学者名流，达官贵人不是都经过寒窗苦读的煎熬吗？”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忍受监狱似的煎熬。他还说，如果没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名言警句的激励，他早就跑到上海经商去了。因此他认为：“理想、希望和意志可以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同上，第31页）


蒋梦麟先生

平心而论，蒋梦麟最初的理想还是属于传统社会的一种个人奋斗，但是这种个人奋斗与国家社会是联系在一起的。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在《任鸿隽与四川大学》一文中，曾经引述陈衡哲对女儿任以都说过的一段话，也谈到这个问题。她说：“我们那一代人出去留学，都有一个理想，就是学成归国，要为国家、人民尽点心力、做点事。你们这一代却根本对公众的事，没有

知识的忠实。欲求学术之发达，必先养成
——蒋梦麟

学问家，而后始有真教育家。有真学术，而后始有真教育，有真
——蒋梦麟


北京大学一院

什么理想，只愿念个学位，找份好差事，这算什么？"当年任以都因为思想激进，一再痛骂士大夫祸国殃民。但陈衡哲对她说："你知不知道士大夫阶级为国家、人民做过多少事？真正的士大夫，处处为国家、人民着想，从不考虑个人利害，这样过一辈子才算是有意义的。"直到晚年，任以都对母亲的这番话还记忆犹新。她说："他们那一代，不但开辟了很多新路径、新园地，为日后中国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也满怀崇高的理想与抱负，一心要为国家、人民贡献心力。"（《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第120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八十二年出版）蒋梦麟比任鸿隽夫妇略大几岁，士大夫气质在他身上也有明显的表现。

2、思考与研究

据蒋梦麟说，他的童年教育有三个来源：一是念古书，二是听故事，三是观察大自然。这些经历养成了他的观察力、好奇心和理解力，再加上他喜欢思考、讨厌死记硬背，才有后来的成就。12岁以后，蒋梦麟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浙江高等学堂求学，并于18岁考中秀才。在绍兴中西学堂时，蔡元培正好是那里的"监督"。（相当于校长）没想到十几年以后，他居然会协助蔡元培主持北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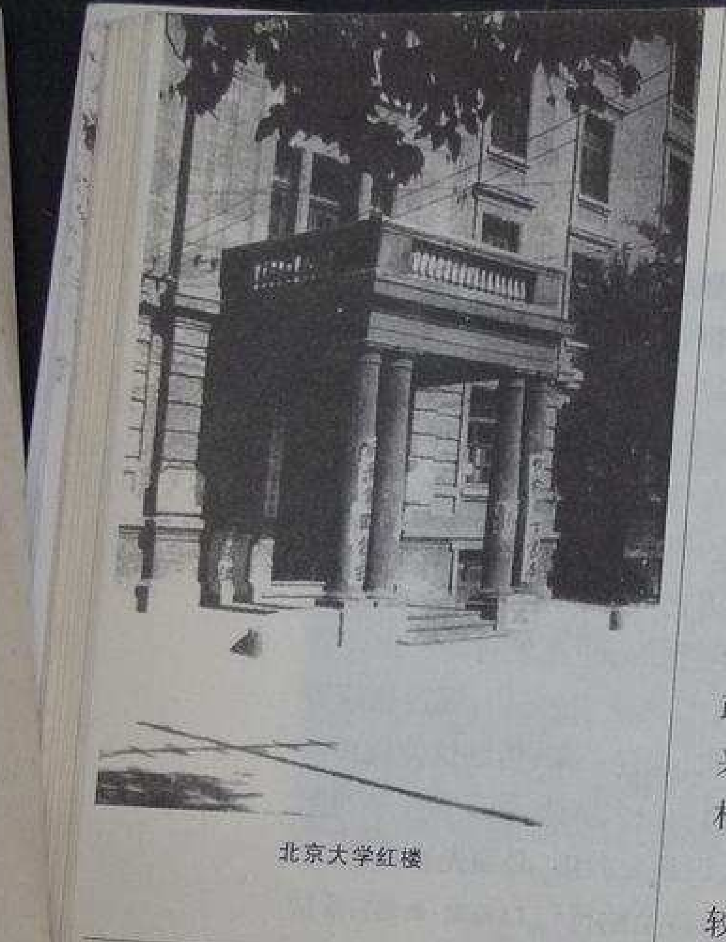
南洋公学对蒋梦麟的影响也很大。这所学校是交通大学的前身，

开办时采纳了美国传教士福开森的意见,一方面实行斯宾塞倡导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原则,一方面开设中学、西学课程。中学课程以四书和宋明理学为主,西学则包括西方的历史文化和新兴科学知识。蒋梦麟在这所学校不仅认识到研究学问必须有强健的体魄,还开始对中外道德进行比较研究。他说:“每当发现对某些问题的中西见解非常相似,甚至完全相同时,我总有难以形容的喜悦。如果中西贤哲都持同一见解,那么照着做自然就不会错。当发现歧见时,就加以研究,设法找出其中的原因。这样就不知不觉地做了一项东西道德行为标准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工作最重要的结果是……对于如何立身处世开始有了比较肯定、比较确切、也比较自信的见解,因为道德观念是指导行为的准绳。”他还说,通过比较研究,他开始学会思考,学会用自己的理智来判断是非,这样一来,传统信仰就再也不能左右他的思想行为了。他说这是自己“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像是脱下一身紧绷绷的衫裤那样舒服而自由”。从此,蒋梦麟开始认识到要救国,必须先救自己。于是他“决心努力读书,努力思考,努力锻炼身体,努力敦品励行”。(《西潮·新潮》,第67页)他觉得这才是儒家所谓修身的正确途径。

从蒋梦麟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发现思考是研究的起点,研究是思考的继续。好的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的思考和研究兴趣,但应试教育却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现成的知识,根本不需要他们怀疑、思考和研究。这其实是在扼杀学生的天赋与智慧。另外,许多人把研究看得过于神秘,以为那是学者、专家的事,也是认识上的一大误区。记得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长时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5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如果说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话,那么中学和小学研究点低级粗浅的学问总可以吧。有了这种认识,才能改变死记硬背的应试教育模式。

3、育物与育人

蒋梦麟22岁时曾经去日本参观,深感日本教育的普及是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的主要原因。第二年他赴美国留学,在“以农立国”思想的指导下选择了农学。一位朋友对他说:农学固然重要,但还有别的学科对中国更重要。换言之,“除非我们能参酌西方国家的近代发展来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否则农业问题也就无法解决。”这位朋友还说:如果不改学社会科学,你的“眼光可能就局限于实用科学的



北京大学红楼



北大前身京师大学堂匾额

小圈子，无法了解农业以外的重大问题。”(《西潮·新潮》第77页)蒋梦麟从小生活在农村，对大自然有浓厚的兴趣。但是听了这些话以后，他开始动摇了。正在这时，他下乡实习，看到一群活泼的孩子去上学。这情景也许触动了他童年的记忆，让他突然觉得与其研究如何培育植物，不如研究怎样培养人才。于是他决定放弃农学，改学教育。这样一来，他的兴趣也更加广泛，选读的书籍扩大到历史、哲学、文学、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许多方面。这种因为理想、兴趣而导致的专业改变，与鲁迅、胡适的情况颇为相似。

在美国，他的兴趣仍然集中在东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上。在研究过程中，他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欧美的东西，这使他发现希腊文化及其自由教育在西方现代文明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认为这种方法其实就是利用旧知识来获得新知识的过程。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举例说：如果一个孩子从来没有见过飞机，我们可以对他说飞机就像一只鸟，或者像一只长着翅膀的船。假如这个孩子连鸟和船也没见过，要让他了解飞机就困难了。同样的道理，要想让中国学生了解西方文明，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中国文化进行比较。因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根据这种推理，我觉得自己在国内求学时，常常为读经史子集而深夜不眠，这种苦功总算没有白费，我现在之所以能够吸收、消化西思想，完全是这些苦功的结果。”(同上，第81页)

说到这里，蒋梦麟想起小时候读过的《幼学琼林》。他说这是一本启蒙读物，它不仅押韵，内容也非常广泛，从天文、地理、草木虫鱼，到商业、农业、

科学发明，甚至政治哲学，几乎无所不包。记得胡适在《四十自述》中也提到这本书，说这本书很有意思。最近我在旧书市上也看到这本书，版本很多，可见它是100年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影响很大的一本书。

二、教育思想

1、体育与美育

蒋梦麟初到美国，就读于位于卜技利（伯克利）的加利弗尼亚大学。该校环境非常幽美，课余生活也很丰富。"离剧场不远是运动场，校际比赛和田径赛就在那里举行。青年运动员都竭其全力为他们母校争取荣誉。……'健全的心寓于健全的身'——这就是古希腊格言的实现。"另外，校园的一个大门上有许多栩栩如生的男性裸体雕像，图书馆阅览室里也有希腊女神的裸体塑像。蒋梦麟初次看到这些雕塑，心里非常疑惑，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当局竟把这些'猥亵'的东西摆在智慧的源泉"。后来他听到一位伦理学教授说，"让女学生们多看一些男人的裸体像，可以纠正她们扭怩作态的习惯"，才明白"完美的思想寓于完美的身体"。（同上，第82页）

在美国，他还逐渐认识到"美是希腊做人的中心点"，正因为这样，才产生了美学和许多伟大的美术作品，从而使希腊文明成为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础。因此，把体育和美育结合起来，让它们齐头并进，使受教育者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才是教育的真谛。从这个角度来看，把体育和美育当作一种"素质教育"，仍然带有功利主义的印记。这也是蔡元培主张用美育代替宗教的主要原因。

从加州大学毕业后，他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教授。关于实用主义，他记得老师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一件事若过于注重实用，就反为不切实用了。"（同上，第92页）哥伦比亚大学位于纽约市中心，因此他经常到乡下度假。他发现在乡下住久了，回到城市就有一种愉快；在城市住久后，到了乡下也会感到清新可爱。这

忠实，其可以言学术乎？对于行为不忠实，不可以为人。对于知识不忠实，不可以为学。对大对于金钱不忠实，不可以为商。对

——蒋梦麟

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

——蒋梦麟

是因为环境改变会引起心理变化，用现在的话说，大概就是所谓"审美疲劳"吧。

1917年蒋梦麟学成回国后，在商务印书馆担任《教育杂志》编辑和《新教育》杂志主编。在此期间，他发表过大量文章，集中阐述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天赋与秉性之中，教育的目的就是尊重这种价值，让每个人的特性发展到极致。智育、体育和美育的作用，就是要使"我能思，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思力至其极。我身体能发育，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体力至其极。我能好美术，则极我之能而培养我之美感至其极。我能爱人，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爱情至其极。"他还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类社会才有自由、平等、民权、共和、选举权、代议制和言论自由等制度设计。否则，统治者就会"视万民若群羊，用牧民政策足矣。何所用其'言论自由'？何所用其'选举权'乎？"（《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6-7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年版）

蒋梦麟认为，蔡元培之所以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是因为"蔡先生的思想中融合着中国学者对自然的传统爱好和希腊人对美的敏感，结果产生对西洋雕塑和中国雕刻的爱好；他喜爱中国的山水画，也喜爱西洋油画；对中西建筑和中西音乐都一样喜欢。他对宗教的看法基本上是中国人的传统见解；认为宗教不过是道德的一部分。他希望以爱美的习惯来提高青年的道德观念。这也就是古语所谓'移风易俗莫大于乐'的传统信念。高尚的道德基于七情调和，要做到七情调和则必须透过艺术和音乐或与音乐有密切关系的诗歌"。（《西潮·新潮》第119-120页）

2、教育与和平

蒋梦麟留美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此他对战争与和平有过深入的思考和体会。回国后曾于1919年撰写《和平与教育》，其中涉及到教育的本质等问题，可以视为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

文章开门见山说，所谓和平，是正义的同义词。有正义就有和平，倘若正义扫地，虽然没有战争，也不是和平，而是一种苟且偷安。统治者标榜的我国人民素以爱好和平著称，其实是为"所谓牧民政治"开脱。因为在专制制度下，老百姓仅仅是一群羊：羊肥了，牧人就会杀而食之，于是就出现暴政；暴政日久，必然会导致羊瘦，于是牧人就继续放牧，推行仁政。这就是中国历史一治一乱的根本原因。

蒋梦麟认为，要改变这种"羊肥而食"、"羊瘠而牧"的循环，就必须推行民主政

治。他指出，牧民政治的反面是平民主义政治或曰民权主义政治。这种政治的目的是要增进平民的能力和知识，使每一个人都养成健全的人格。只有这样，社会才能不断进步，和平才有真正保障。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能打败中国和俄国，和当时中俄两国没有平民主义的民主政治分不开。德国向世界宣战，最终归于失败，也是因为他们的政治制度没有美国和其他协约国优越。因此他认为："强国之道，不在强兵，而在强民。强民之道，惟在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所谓教育，就是为了"达此和平目的之方法也"。(《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 9–10 页)

紧接着他指出：中国的教育，是牧民政治的教育；要改为平民主义教育，必须从三个方面去努力：第一，要"养成独立不移之精神"，改变过去那种萎靡不振、依赖成性的恶习。第二，要"养成健全之人格"，改变以往"好学者读书，读书愈多，而身体愈弱"的传统。第三，要"养成精确明晰之思考力"，改变平时"凡遇一事，或出于武断，或奴于成见，或出于感情"的毛病和喜欢用"差不多"来判断事物的习惯。(同上，第 11–13 页)

在这篇文章中，蒋梦麟还分析了中国社会进步应该采取的三项措施：一要改良起居，二要修筑道路，振兴实业，三要奖励并推进学术。他认为前两项属于物质方面的改良，比如生活在臭水沟和猪圈的孩子，只能是"皮黄骨瘦，精神疲倦，做事萎靡"；后一项则属于精神领域的进步。他说："学术者，一国精神之所寄。学术衰，则精神怠；精神怠，则文明进步失主动力矣。故学术者，社会进化之基础也。"(同上，第 15–16 页)但是，由于我国在学术方面历来有漫无系统、重视应用、专重古文等三大弊病，致使学术研究不是出于兴趣，而是为了应用。这种主次颠倒、源流混淆的做法，遏制了学术的创新能力。

为了进一步说明如何才能推动学术进步，他还用经商和做人作比："夫对于金钱不忠实，不可以为商。对于行为不忠实，不可以为人。对于知识不忠实，其可以言学术乎？"(同上，第 17 页)因此，"欲求学术之发达，必先养成知识的忠实。"养成对知识的忠实，是做学问的最基本的要求。胡适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也是这个意思。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蒋梦麟总结道："……以正义为先导，以养成健全之个人进化的社会为后盾，张旗鸣鼓，勇猛前进，此即所谓为和平而战也。战而胜，则平民主义由是而生存，真正和平由是而永保。和平与教育之关系，如是如是。"(同上，第 17–18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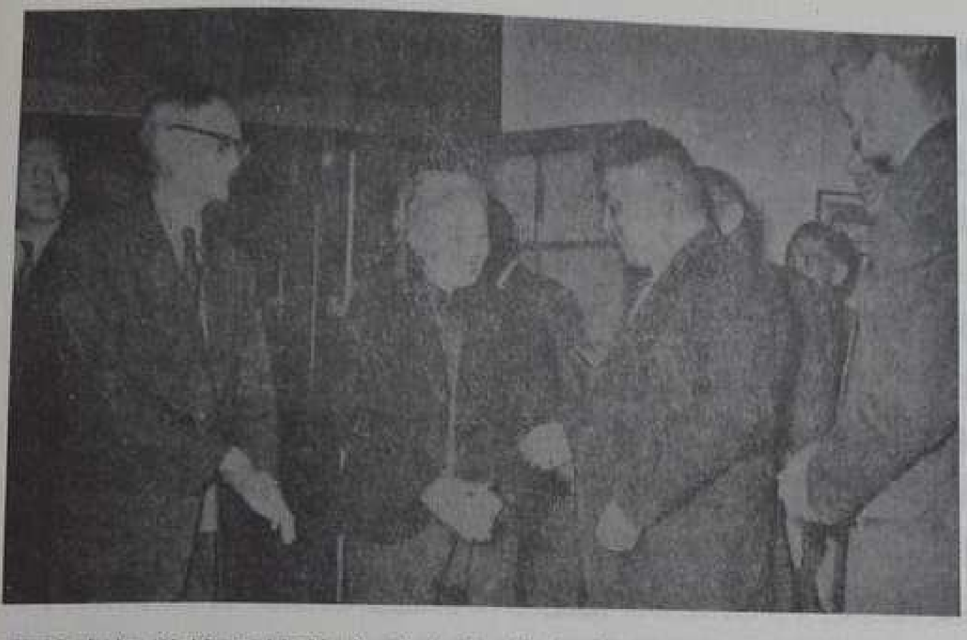
3、职业与文化

蒋梦麟留学归来，遇到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倡导职业教育是当时很有影响的社会时潮之一，面对这一思潮，蒋梦麟非常冷静。他认为职业教育固然需要，但如果以为除了职业教育之外就没有其他教育，或者说所谓教育就是职业教育，那就大错特错了。

为了纠正这种错误认识，他写了《教育与职业》、《职业教育与自动主义》等文章。他指出：教育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国家有问题，故有国家教育。社会有问题，故有社会教育。个人有问题，故有个人教育。职业有问题，故有职业教育”。如果有关问题不能解决，那就是教育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职业教育，不过是教人“操一技之长而藉以求适当之生活也”。但是，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在职业问题之外还有许多问题，它最终还需要通过文化教育来解决，这就是普通学校应该承担的功能。因此职业教育并不是教育的全部，而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他认为，“学校非专为职业而设，举学校而尽讲职业教育，则偏矣”。（同上，第22-23页）

对于类似偏颇，蔡元培也多有提醒。比如1920年10月，蔡先生应《法政学报》的邀请，为该学报创刊一周年致词时说：“从前法政大学，大抵都是用一种官僚教育、职业教育。他们的旨趣，就是要学生不请假、把讲义背得熟、分数考得好，毕业后可以谋生便罢了。”这种“职业学校，是专为毕业以后得饭碗的，确无研究学理之必要。如今你们办《法政学报》至少有三个好处：第一，可以提高学生研究学理的兴趣；第二，可以引发学生求新的思想；第三，可以使学生养成“非自利的公德心”。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摆脱“职业教育的恶习”。（《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462-463页）随后，他赴欧洲考察，途经新加坡参观一所中学时，又做了题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讲演。他说，职业教育好比房屋，普通教育好比地基，倘若等到高屋建成，才发现地基不稳，就来不及了。他认为，普通教育的宗旨，并不仅仅是让学生变得“有用”，而是要让他们“(一)养成健全的人格，(二)发展共和的精神”。（同上，第474页）由此可见，蒋梦麟和蔡元培对教育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蒋梦麟还把职业界分为“自动的”和“机械的”两种人才。前者具有远大的目光，进取的精神和“事事图改良，著著求进步”的作风；后者则是只“具一艺之长，精部分之事。人先提倡，我能随之”的人。（《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25页）他提出



蒋梦麟夫妇与学术界人士在一起

高等专门学校要培养自动人才，使之成为工业社会的领袖，中等职业学校则应该培养机械人才，为工业社会培养优秀工人。

学校非专为职业而设，举学校而尽讲职业教育，则偏矣。

——蒋梦麟

4、个人与社会

蒋梦麟认为：共和国的作用，就是尊重并保护个人价值；教育的目的，则是为了发展个性，培养特长，进一步增加个人价值。为此，就必须对教育学有所研究。他指出，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教育学分为“个人”与“社会”两大部分：就个人而言，为了满足“发展个性”的需要，它要涉及生理学、遗传学、卫生学、心理学、论理（逻辑）学、美学等诸多学科；从社会来看，为了满足“发展人群”的需要，它又涉及人种学、历史学、地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群学等许多领域；此外，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离不开自然界，因此教育学还涉及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和物理、化学等其他科学。因此他说：“有真学术，而后始有真教育，有真学问家，而后始有真教育家。……无大教育家出，而欲解决中国教育之根本问题，是亦终不可能也。”这里所谓大教育家，显然是通晓各门学科的通博之士，“不通博乎此，则不可以研究教育。”（同上，第32页）

北大这么大的一个学校，研究学问，注重品行的件件都有，就是缺少团体的生活。所以我希望大家，一方各谋个人的发达，一方也须兼谋团体的发达。

——蒋梦麟

蒋梦麟晚年在回忆北大的学术自由以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和

鲁迅兄弟以后，曾谦虚地说："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一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因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艺发展的历史，稍有空闲时，也读他们的作品，同时常听他们的谈论。古语所谓'家近通衢，不问而多知。'我在大学多年，虽对各种学问都知道一些，但总是博而不专，就是这个道理。"（《西潮·新潮》第344页）其实，像蒋梦麟这样"一无所长"却"什么都知道一点"的人，才可能是真正的大教育家。相反，让那些"学有所长"而不广博的专家当校长，恐怕未必合适。

蒋梦麟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每一个人"享受人生所赐予之完满幸福"，要享受这种幸福，还需要社会的开明和进步。因此他说：一方面个人生活的丰富程度与社会的开明进步成正比，"社会愈开明，则个人之生活愈丰富"；另一方面，健全的社会又需要健全的个人来组成。他主张社会进步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社会的文明能天天增加；二是社会的"肚量"能包容新学说新思想；三是大多数人民，能具有享受文化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又来自教育的普及。与此同时，他认为社会的进步与每一个人密切相关。个人要推动社会进步，首先要有负责任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基础有二："一曰能行，二曰能思。所谓能思者，养成清楚之头脑，并有肝胆说出其思想。所谓能行者，做事担得起责任，把肩膀直起来，万斤肩(担?)子我来当。夫如是，始能增加文化，生出新思想。致使大多数人民能享文化之权利"。（《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28页）记得傅斯年在回忆蔡元培的时候，曾披露过一个细节。当年他曾写过一份匿名揭贴（小字报）挖苦一位同学，蔡先生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胡适一直主张用真名发表文章，也是为了表示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可见能不能负责任，是检验人与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

三、主持北大

1、学潮与学风

五四爱国运动爆发时，蒋梦麟还在上海，陪同他的老师杜威进行访问。五四之后，蔡元培因发生如此大事，悄然离开北大，委托蒋梦麟主持北大校务。当时蔡先生对他说：大学生是有自治能力的，你可以代表我到学校执行校务。我把一切权力交给你，但是责任由我来负。蔡元培还嘱咐说："自今以后，须负极重大之责任，使

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同上，第 145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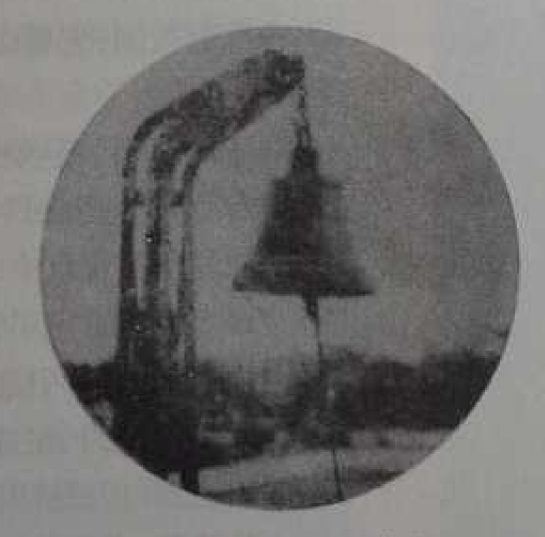
与此同时，蔡元培对于学生在运动以后的状态忧心忡忡。蒋梦麟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写道：“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中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西潮·新潮》第 125-126 页）

蒋梦麟接受蔡元培委托后，北大学生会负责人段锡朋、张国焘等人曾拜访过他。据张国焘回忆：“我到达上海后，……和段锡朋等到江苏教育会去访问住在那里的蒋梦麟先生，向他表示我们代表北大同学欢迎他去北大代理校长的职务。于是蒋先生也即到达北大，代理校长，肩负起这一艰巨的任务。”（《我的回忆》第一册，第 65 页，东方出版社 1980 年版）不久，蒋梦麟与张国焘等人一同乘火车到达北京。顺便说一句，张国焘离开北大后所选择的道路，也证明蔡元培的判断无误。

蒋梦麟抵京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蒋梦麟代办北大校务启事》：“元培因各方面督促，不能不回校任事。惟胃病未瘳，一时不能到京。今请蒋梦麟教授代表，已以公事图章交与蒋教授。嗣后一切公牍，均由蒋教授代为签行。校中事务，请诸君均与蒋教授接洽办理。”（《蔡元培全集》第三卷，第 311 页）

初到北大时，蒋梦麟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评价这场举世闻名、影响深远的学生运动。

7 月 22 日，北大学生集会欢迎蒋梦麟。因为蒋梦麟深知蔡元培“‘为学问而学问’的信仰，植根于对古希腊文化的透彻了解，这种信仰与中国‘学以致用’的思想适成强烈的对照”，（《西潮·新潮》，第 119 页）因此他在即席讲中介绍了蔡元培的近况后，又说：蔡先生的美德和他集中西文化于一身精神是“怎么得来



北大的“文化之钟”



蒋梦麟(前排左四)、胡适(三排左二)与北大国学研究所同人

的呢?是从学问中得来的。故诸君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蒋梦麟还说,西方先进国家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是多少年来文化积累的结果。"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几"?讲话结束时,他告诫大家:"如果是今天反对这个,明天反对那个,……终不是根本办法。吾人若真要救国,先要谋文化之增进。"(《蒋梦麟文化学术随笔》第145-146页)

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蒋梦麟与胡适共同发表《我们对学生的希望》。我注意到,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就对学生运动有看法。在这篇由他起草的文章中,进一步表达了他们对学生运动的意见。

该文首先肯定了学生运动的贡献有五个方面:一是"引起学生的自动精神";二是"引起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兴趣";三是"引出学生的作文演说的能力、组织的能力、办事的能力";四是"使学生增加团体生活的经验";五是"引起许多学生求知识的欲望"。

紧接着,文章分析了学生运动的起源。作者认为,学生运动起源



北大校徽

于变态社会，因为常态社会的政治比较清明，许多社会问题有成年人处理，学生可以安心求学，用不着在其他方面操心。但是在变态社会中，“许多事被一班成年人或老年的人弄坏了，别的阶级又都不肯出来干涉纠正，于是这种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简单一句话：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汉末的太学生，宋代太学生，明末的结社，戊戌政变以前的公车上书，辛亥以前的留学生革命党，俄国从前的革命党，德国革命前的学生运动，印度和朝鲜现在的运动，中国去年的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都是同一个道理”。所以他们认为：“荒唐的中老年人闹下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而动不动就使用罢课手段，更是他们所不以为然的。(同上，第166—168页)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不仅是因为“罢课与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还因为它容易让学生养成依赖群众的心理，同时养成逃学和盲目从众等习惯。文章说：“现在的学生很像忘了个人自己有许多事情可做，他们很像以为不全体罢课便无事可做。个人自己不肯牺牲，不敢做事，却要全体罢了课来呐喊助威，自己却躲在大众群里跟着呐喊，这种依赖群众的心理是懦夫的心理！”(同上，第168页)

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希望和意志可以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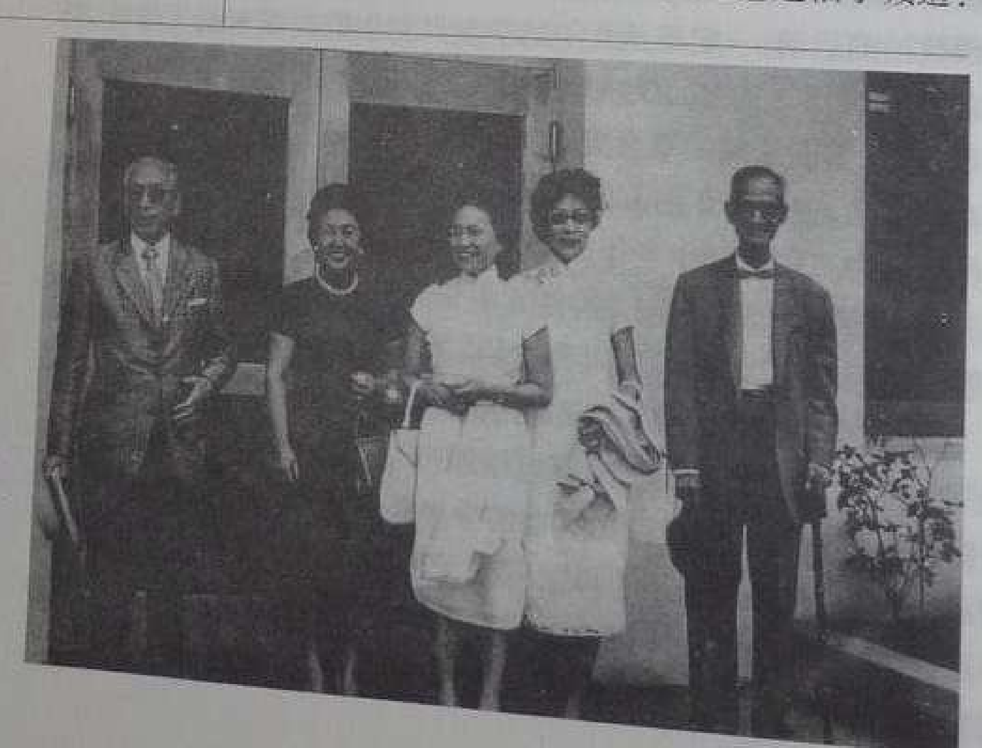
——蒋梦麟



1920年北京大学授予美国著名学者杜威、芮恩施名誉博士学位

在指出学生运动弊病的同时，蒋梦麟和胡适还向大家指出：今后要注重真正的学生活动，这种学生活动包括学问生活、团体生活和社会服务三个方面。在学问生活上，一要学好外文，二要注重观察与调查，三要促进学校的改良，四要注重自修。在团体生活上，除了要开展学术活动、体育活动、游艺活动、社交活动外，还要弥补各种组织活动中不完善的地方，其中包括开会的法定人数、提案手续、发言顺序、表决方法、复决程序、讨论时间等内容，以及容纳反对党的意见和人人要负责任的精神。在社会服务上，要注意普及科学常识和公民常识、开展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活动。这一切，都是民主社会不可缺少的内容。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尽管这篇文章说理透辟，但是在那变态社会向常态社会转轨的时代，大大小小的学潮还是此起彼伏，一个接着一个。有一次，学校要收讲义费，学生马上举行集会表示反对。当时蔡元培已经回校，他赶到现场，气愤地卷起袖子喊道："你



蒋梦麟（右）与外交及政治学家顾维钧（左）等合影



蔡元培（左二）与蒋梦麟（左一）、胡适（左三）、李大钊（左四）在一起

们这班懦夫！……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西潮·新潮》，第132页）后来蒋梦麟也经历了多次围攻，甚至在办公室里被关了几个小时。

为什么“学生势力这样强大而且这样嚣张跋扈”呢？蒋梦麟认为这与他们的出身有关。他说：“这些学生多半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子女。学生的反抗运动，也可以说等于子女对父母的反抗。”另外，“学生运动在校内享有教师的同情，在校外又有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支持，因此势力更见强大。”（《西潮·新潮》，第136页）蒋梦麟还说：许多事例“足以说明学生运动中包含各式各样的分子。那些能对奋斗的目标深信不疑，不论这些目标事实上是否正确，而且愿意对他们的行为负责的人，结果总证明是好公民，而那些鬼头鬼脑的家伙，却多半成了社会的不良分子。”（同上，第133页）

尽管如此，蒋梦麟对于当时的学生爱国运动还是给予热情支持。比如“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蒋梦麟多次出席“北京国立九校校务讨论

國立清華大學二十週紀念
心理建設
蔣夢麟題

会”,处理善后问题,并严厉谴责政府屠杀学生的暴行。

2、自治与“治自”

蒋梦麟的一生，始终把教育与改变人生态度、培养合格公民联系在一起。他虽然对学潮多有批评，但还是把五四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希望以此为起点,“把中国萎靡不振的社会，糊糊涂涂的思想,畏畏缩缩的感情,都一一扫除”使每一个都成为一个活泼泼的公民(《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48-49页)1919年北大发生林德扬自杀事件，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罗家伦认为这是恶劣的社会造成的悲剧。蒋梦麟认为，除了社会外,这也是中国人心气薄弱的表现。为此他撰文说:“中国之社会，一罪过之社会也。中国之家庭,一罪过之家庭也。以罪过之社会,建神圣之国家,犹设天堂于地狱”,因此“泛言改革政治,其效必浅。泛言改革社会，其祸必巨。欲图积极之进行，必须有一入手之的实办法。此法为何,曰建设新国家于学校之中。”(同上,第112页)

蒋梦麟第一次代理北大校务只有两个月左右。1919年9月蔡元培返回北大,聘他为教育学教授兼总务长。他说



台湾当局为蒋梦麟颁发“当代儒宗”匾额

蔡先生回来后，“北大再度改组，基础益臻健全。新设总务处，由总务长处理校中庶务。原有处室也有所调整，使成为一个系统化的有机体，教务长负责教务。校中最高立法机构是评议会，会员由教授互选；教务长、总务长，以及各院院长为当然会员。评议会有权制订各项规程，授予学位，并维持学生风纪。各行政委员会则负责行政工作。北大于是走上教授治校的道路。学生自治会受到鼓励，以实现民主精神。”（《西潮·新潮》，第127页）可见要“建设新国家于学校之中”，除了教育独立、学术自由、教授治校等要素之外，学生自治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关于学生自治，蒋梦麟的两个演讲谈得非常透彻。第一次是1919年10月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庆纪念会上。五四运动以后，学生自治会即学生会纷纷成立，因此蒋梦麟首先指出：我们讲学生自治，要研究三个要点。第一是学生自治的精神，第二是学生自治的责任，第三是学生自治带来的问题。所谓精神，是一种公共意志。一个团体有了公共意志，大家就会不知不觉地受其感染，否则这个团体就无法存在。所以学生社团结合的要素，不是在章程，而是在养成一个公共的意志。换一句话说，就是养成一种精神。他还说，学生自治不是一种时髦，也不是要反对教师，而是一种移风易俗的爱国运动。因此大家应该有一颗移风易俗的爱国心，来培养这种自治精神。关于学生自治的责任，蒋梦麟认为应该表现在四个方面：一要提高学校的学术水平，二要建立公共服务的观点，三要生产更多的文化，四要为改良社会做出榜样。至于学生自治可能带来的问题，比如学生个人的行为该不该管，学生团体与教师以及教师团体产生矛盾怎么办，蒋梦麟也做了很好的解答。

第二次是1920年9月在北京大学的开学典礼上。如果说蒋梦麟在北高师的演讲偏重于学理的话，那么这次讲话则比较侧重于现实。他说：“我近来学生认识得不少，据各方面的闻见，觉得最可惜的就是学生会总没有好好的组织；开会时秩序亦不甚整齐。我们时常说国会省会如何捣乱，其实像这样子，叫学生去办国会省会，又何尝不会捣乱呢！所以开会时必须注重议会法才好。学生会章程，上半年已经订好，采取委员制，现在已经付印。希望新旧同学平心静气地讨论确定

> 和平与教育之关系，如是如是。由是而永保。战而胜，则平民主义由是而生存，真正和平前进，此即所谓为和平而战也。以正义为先导，以养成健全之个人进化的社会为后盾，张旗鸣鼓，勇猛
>
> ——蒋梦麟

以后就大家遵守。本校的特色，即在人人都抱个性主义。我尝说，东西文明的不同，即在个性主义。比如希腊的文化，即以个性为基础，再加以社会的发达，方能造成今日的西方文明。”在演讲结束时，蒋梦麟殷切地说：“北大这么大的一个学校，研究学问，注重品行的件件都有，就是缺少团体的生活。所以我希望大家，一方各谋个人的发达，一方也须兼谋团体的发达。从前严厉办学的时代，是‘治而不自’，现在又成杜威先生所说的‘自而不治’，这都不好。我们要‘治’同‘自’双方并重才好。因为办学校用法律，决计不行的，只可以用感情化导，使得大家互以良好的情感相联络。这就是我最后的希望。”（《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 148-149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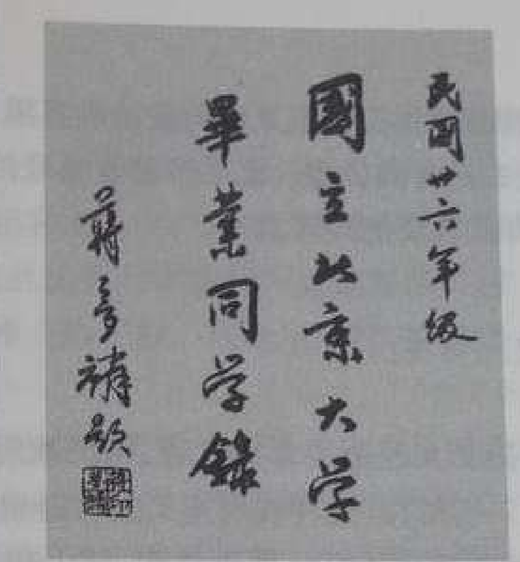
让学生自治而不是“治自”，学校要依靠感情化导而不是严格的法纪，这是蒋梦麟办学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

3、学术与政治

1920 年 10 月，蔡元培出国考察，蒋梦麟再次代理北大校务。1923 年，蔡元培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蹂躏人权而羞与为伍、愤然辞职，蒋梦麟第三次担任代理校长职务，直到 1926 年“三一八惨案”爆发后，蒋梦麟被北洋军阀列入黑名单，他只好离开北大逃到东交民巷。当年秋天，他脱离魔掌抵达上海，结束了将近 7 年的北大生涯。

作为蔡元培的继承人，蒋梦麟认为北大精神既是一种公共意志，又是一种学风。但是如何建立良好的学风，让北大精神发扬光大，却不是容易的事情。1922 年，他在《学风与提高学术》一文中表达了自己的苦闷。该文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办教育的人，近来真觉得日暮途穷了。从前我们以为政治不良，要从教育上用功夫，养成人材，去改良政治。近年以来，政治愈趋纷乱，教育界经济上和心理上，都因此受莫大打击，不但经济破产，精神上破产的征象，也渐渐暴露了。于是数年前‘只讲教育，不谈政治’的迷信，渐渐儿打破。”（《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第 77 页）

他还说：由于政治腐败，大家不能不谈政治。但是要谈政治，又会受到腐败政治的仇视、摧残或利用，无奈之下只好不谈政治。但是面对一个缺乏公平和正义的社会，大家又到哪里去讨个公道呢？想来想去，他认为“现在我们所能勉强提出的一个办法，就是‘提高学术’。”但由于人才不足，经费不能保证，因此要通过“‘提高学术’来唤起精神，养成一个学术化的学风，谈何容易。”（同上，第 78 页）



蒋梦麟荣获菲律宾麦格塞塞学术奖

1924年11月，蒋梦麟在《晨报》发表《知识阶级的责任问题》，进一步讨论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文章首先指出：知识界是否能成为一个阶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社会上要有相当势力，二是本身要有一个团结的组织。然而现在的中国知识界，人数既少，组织也流于形式，根本无法形成一个阶级。

蒋梦麟分析说，全社会对知识界的期望是解决目前的政治问题，以减少贪官污吏给他们造成的“切肤之痛”。但是知识界却认为，要改良政治，就要先改良社会；要改良社会，就要先从学术、思想、文化上下功夫，否则就会陷入治标不治本的误区。对于知识界的这种看法，蒋梦麟觉得就好比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一样，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答案。因此“我们只好说，鸡是蛋所生的，蛋亦是鸡所生的。有了好鸡，自然能生好蛋；有了好蛋，自然能生好鸡”。基于同一道理，他认为“社会能影响到政治，政治也能影响到社会；社会能影响到学术，学术也能影响到社会。无论哪一方面做起，都是有效的”。（同上，第67–68页）

他还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看见实际问题解决的困难，知道唱几句社会和学术的高调，最容易缴卷，就把学术和社会的研究，作为避世的桃源。或者钻进学术和社会的研究里面，忘了应世的目的”。结果，不是“养成万恶的政治”，就是产生“一班不切世务的迂儒”。（同上，第69页）这对学术和社会，都有害无益。

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几？

——蒋梦麟

此外，蒋梦麟提出知识界参与政治的界限和条件。主要是不可忘记本职工作，否则就会失去自身的价值，也不可能改良政治。蒋梦麟80多年前发表的这些意见，至今仍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4、孔子与"鬼子"

蒋梦麟在北大经历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初期）和抗日战争三个时期，每个时期又恰好7年左右。北洋政府拖欠教育经费是常有的事，但是蒋梦麟说，在第一个"7年中，虽然政治上狂风暴雨迭起，北大却在有勇气、有远见的人士主持下，引满帆篷，安稳前进。图书馆的藏书大量增加，实验设备也大见改善。国际知名学者如杜威和罗素，相继应邀担任客座教授"。（《西潮·新潮》，第127页）可见他当时多不容易。

蒋梦麟离开后，北大进入一个相对黑暗的时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梦麟曾担任浙江省教育厅长、第三中山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等职。1930年底，国民政府为了振兴北大，任命蒋梦麟为北京大学校长，但是他却回了杭州。

这是为什么呢？据胡适说："他不肯回北大，是因为那个时候北平的高等教育已差不多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他回去也无法整顿大学。北京大学本来在北伐刚完成的时期已被贬作为'北平大学'的一个部门，到最近才恢复独立，校长是陈百年先生（大齐）。那时候，北京改成了北平，已不是向来人才集中的文化中心了，各方面的学人都纷纷南下了。一个大学教授的最高俸给还是每月300元，还比不上政府各部的一个科长。北平的国立各校无法向外延揽人才，只好请那一班留在北平的教员尽量的兼课。几位最好的教员兼课也最多。例如，温源宁先生当时就'有身兼三主任，五教授'的流言。结果是这班教员到处兼课，往往有一个人每星期兼课到40小时的！也有排定时间表，有计划的在各校轮流锻课的！这班教员不但'生意兴隆'，并且'饭碗稳固'。不但外面人才不肯来同他们抢饭碗，他们还立了种种法制，保障他们自己的饭碗。例如，北京大学的评议会就曾通过一个议决案，规定'辞退教授须经评议会通过'。在这种情形之下，孟邻迟疑不肯北来做北大校长，是我们一班朋友都能谅解的。"（《胡适全集》第19卷，第500页）

在这里，所谓教师兼课的问题需要澄清一下。记得潘光旦在《教授待遇与今日流行之兼任讲师制》中说：为什么大学需要专职教授呢？这是因为大学教授不仅要

向学生传授知识，还应该在日常接触用自己的人格来影响学生。因此，过去的大学是不主张教授兼课的。如果你为了多挣钱非要兼课，那就只能担任讲师。我想当年的鲁迅在教育部供职时，同时兼任大学课程，大概就是这样。基于此，潘光旦认为大学教授一方面要享有较高的待遇，另一方面也必须拥有精神上的宁静。精神不宁静，其人格魅力就会大打折扣。

胡适还说："那时有两个朋友最热心于北大的革新。一个是傅孟真，一个是美国人顾临(Roger S. Greene)。顾临是协和医学院的院长，也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董事。他们找我商量，如何可以帮助孟邻先生改革北大，如何可以从北大的改革影响到整个北平高等教育的革新。最主要的问题是：从哪儿捐一笔钱做改革北大的经费？"(同上)

由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由蔡元培、蒋梦麟、胡适、任鸿隽、赵元任和顾临、孟禄等人组成，因此胡适和傅斯年最后拟出一个具体方案，提请中基会讨论通过。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中基会与北大每年各提出20万元，以5年为期，双方共提出200万元，作为合作特别款项，专作设立研究讲座及专任教授及购置图书仪器之用"。胡适解释说："这个合作办法的一个主要项目是设立'研究教授'若干名，其人选'以对于所治学术有所贡献，见于著述，为标准'，其年俸'自4800元至9000元不等，此外每一教授应有1500元以内之设备费'。研究教授每周至少授课6小时，并担任学术研究及指导学生之研究工作。研究教授不得兼任校外教务或事务。"(同上，第501页)

据胡适日记记载，经过半年左右的反复商讨，最后决定聘请15人为研究教授。他们是：汪敬熙(心理学)，王守竞(物理学)，曾昭抡(化学)，刘树杞(化学)，冯祖荀(数学)，许骧(生物学)，丁文江(地质学)，李四光(地质学)，刘志扬(法学)，赵乃抟(经济学)，周作人(文学)，刘复(文学)，陈受颐(史学)，徐志摩(文学)，汤用彤(哲学)。

1948年北大50周年校庆时，胡适对蒋梦麟有过这样的评价："话说民国二十年一月，蒋梦麟先生受了政府的新任命，回到北大来做校长。他有中兴北大的决心，又得到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

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荒唐的中老年人闹下乱子，却要未成年

——蒋梦麟

进化的社会。强民之道，惟在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强国之道，不在强兵，而在强民。

——蒋梦麟

研究合作费国币100万元的援助，所以他能放手做去。向全国去挑选教授与研究人才。他是一个理想的校长，有魄力、有担当，他对我们三个院长说：辞退旧人，我去做；选聘新人，你们去做。”(《胡适全集》第20卷，第271页)

辞退旧人是得罪人的事情。蒋梦麟勇于承担此事，除了职责之外，还与他的人格追求有关。蒋复璁说：蒋梦麟是“以儒立身，以道处世，以墨治学，以西办事。”(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卷，第二期第46页)专门收集学者趣闻轶事的《学林散叶》有类似记录：“抗战中蒋梦麟当北大校长，曾说自己平生做事全凭三子：‘以孔子作人，以老子处世，以鬼子办事’。所谓鬼子者，洋鬼子也。指以科学精神办事。”(《学林散叶》第36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这里除了“抗战中”三字尚可存疑外，其他内容无大出入。另外陈雪屏也说，蒋梦麟“尊重个人自由：凡个人行为之不涉及公众权益者，他绝不过问或批评；凡他的同事在分层负责的范围内所决定的事项，他从不挑剔或干预。他信服老庄的道理，对于屑细的是非之争与成亏之辨看得很淡。因此他能够超脱于复杂的人事纠纷之上”。(台湾《传记文学》第五卷，第一期第11页)难怪胡适要说，蒋梦麟是一个“有魄力、有担当”的理想的校长。

5、大学与抗战

不幸的是，就在蒋梦麟组建的“新北大”刚刚开学之际，就爆发了震惊世界的



美国学者杜威夫妇在上海。前排自左至右：史量才、杜威夫人、杜威；后排自左至右：胡适、蒋梦麟、陶知行、张作平

"九一八"事变。不久，日本侵略者又攻占山海关和承德等地，平津一带炮声隆隆，战云密布。为了救护受伤的抗日将士，北大师生成立了一所伤兵医院，蒋梦麟夫人亲自担任院长，组织教职员夫人和女学生充当看护。通过抢救伤兵，蒋梦麟进一步看到中国军队虽然缺乏现代武器，却勇于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抵抗外来侵略。他认为："国军以血肉筑成长城抗御敌人的弹雨火海，主要的凭藉就是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中国在漫长痛苦的8年之中愈战愈勇，虽然千千万万的人受伤死亡，中国却能始终连哼都不哼一声。我们虽然节节失利，却终于赢得战争。"(《西潮·新潮》第201页)

除了愈战愈勇的中国军队之外，中国的大学堪称抗战胜利的精神堡垒，大学校长则是大家的精神领袖。在这方面，蒋梦麟的表现可圈可点，令人钦佩。比如1935年11月，蒋梦麟与北平各大学校长教授联名发表宣言，斥责冀东伪政府，反对华北"自治运动"。为此日本宪兵找上门来，"请"蒋梦麟去位于东交民巷的日本兵营进行解释。蒋梦麟毫无畏惧地深入虎穴之后，一个日军大佐居然想把他挟持到大连。面对这种危险局面，蒋梦麟冷静地说："如果你们要强迫我去，那就请便吧——我已经在你们掌握之中了。不过我劝你们不要强迫我。如果全世界人士，包括东京在内，知道日本军队绑架了北京大学的校长，那你们可就要成为笑柄了。"(同上，第203页)

在这位大义凛然的北大校长面前，无计可施的敌人只好把他放了。事后，宋哲元将军因无法保护他而劝他离开北平，蒋介石也派陈诚前来表示慰问，但他还是留了下来。他说："从民国十九年到二十六年的七年内，我一直把握着北大之舵，竭智尽能，希望把这学问之舟平稳渡过中日冲突中的惊涛骇浪。在许多朋友尤其是胡适之、丁在君(文江)和傅孟真(斯年)协助之下，北大幸能平稳前进，仅仅偶尔调整帆篷而已。"他还说：在这种情况下，"科学教学和学术研究的水准提高了。对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也在认真进行。教授们有充裕的时间从事研究，同时诱导学生集中精力追求学问，一度曾是革命活动和学生运动漩涡的北大，已经逐渐变为学术中心了。"(同上，第199-200页)

另外，曾经在北大法学院任教的陶希圣回忆说，当时北大"师生

泛言改革社会，其祸必巨。泛言改革政治，其效必浅。欲图积极之进行，必须有一入手之的实办法。此法为何，曰建设新国家于学校之中。

——蒋梦麟

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

——蒋梦麟

们的口号是‘在北平一天，当作20年来做’。”(台湾《传记文学》第5卷，第1期第10页)北平在上世纪30年代的文化繁荣和社会进步，就是这样换来的。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北大、清华与南开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三校校长同时担任常务委员，共同领导学校。为此，蒋梦麟一方面组织广大师生南下，一方面嘱托不便南下的周作人、孟森、冯祖荀、马裕藻留下来照料北大，这四人被称为“留平四教授”。谙熟中国历史的周作人曾托人给蒋梦麟带话：“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蒋梦麟年表》，《蒋梦麟教育思想研究》第296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汉奸罪入狱，曾希望蒋梦麟出庭作证。蒋也有此打算，但是终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

蒋梦麟的纯正厚道是大家公认的。叶公超说：“我的朋友中，脾气好的人也不少，但对于仆役等最客气，而且从来不发脾气的，我想只有梦邻一个人。记得我们初到长沙去组织临时大学的时候，我们合用一个宝庆的老兵，因为语言关系，往往词不达意，我是一个性急的人，孟邻先生看见那位宝庆的同胞做错了事，或者是所做的刚好与我们的意愿相反的时候，他的反应总是发笑，我却在着急。纯厚，同情，宽容是他的本性。”

不过，在大是大非上，蒋梦麟却是另外一种模样。叶公超说，他们到长沙后，南开的张伯苓和清华的梅贻琦还没有到。有人怕三所大学在一起会产生同床异梦的矛盾；有人甚至说：“假使张、梅两位校长不来，我们就拆伙好了。”听到这话，蒋梦麟声色俱厉地说：“你们这种主张要不得，政府决定要办一个临时大学，是要把平津几个重要的学府在后方继续下去。我们既然来了，不管有什么困难，一定要办起来，不能够因为张伯苓先生不来，我们就不办了。这样一点决心没有，还谈什么长期抗战。”(台湾《传记文学》第5卷，第2期第39页)

不久，长沙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在抗日战争中，三所大学长期合作，为中华民族保存了文化学术的火种，谱写了弦歌不绝的佳话。冯友兰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有言：“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昔人所言，今有同慨。三校有不同之历史，各异之学风，8年之久，合作无间。同无妨异，异不害同，……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总览卷，第284页，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这一切，如果没有蒋梦麟的努力和坚持，是不可能的。这也正如叶公超所说：“整个抗战期间，大后方的高等教育没有间断，而能继续


晚年蒋梦麟

为政府培植人才，孟邻先生个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值得一提的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知识分子表现出来的不畏艰苦的精神令人感动。费正清在战前就是与蒋廷黻和梁思成夫妇结下深厚的友谊，战争中他再度来华，发现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况极其恶劣，便想通过官方渠道请求美国政府援助。于是，一个叫做“中国救济联合会”的组织于 1943 年秋开始实行一项计划，其中包括以 500—1000 美元的现款帮助一部分有前途和有声望的学者去美国访问。“然而蒋介石获悉这一计划后，大概是以中国学者不应接受美国施舍为由，实际上予以否决了”。(《费正清看中国》第 87 页，1995 年版)

费正清认为，这是“蒋介石开始丧失民心”的一个原因，也导致“许多知识分子感到心灰意懒，一部分人将会死去，其余的人将会变成革命分子”。(《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 295 页，上海知识出版社 1994 年版)

对于这种状况，蒋梦麟非常担忧。费正清说，有一天“蒋梦麟于午

社会进化之基础也。故学术者，一国精神之所寄。学术衰，则精神怠；精神怠，则文明进步失主动力矣。

——蒋梦麟

饭前到我这儿来，我告诉他联合援华会遭受惨败之事。从外表看，他颇像梅贻琦——个子很高，身材消瘦，举止优雅，不过，他是个理智胜过情感的人。他们作为昆明高校的两位领袖，都是以其苦行僧形象著称的，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蒋梦麟近来没有为北大做什么。他已困难到山穷水尽、唯靠典卖仅剩的衣物书籍而维持生活，他的夫人现在正在设法寻找工作而他自己则回到昆明去担任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跟梅贻琦相比，蒋梦麟的经济境况还稍胜一筹。梅夫人化名找到一个工作，结果被发觉，只得中辍。”

他还说：“当蒋梦麟博士向联大教授们宣布美国联合援华会支援中国高校教授生活费用计划不能实施时，遭到了听众们的强烈抗议。他们认为，鉴于‘租借法案’和他们自己的极端贫困，接受美国援助根本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他煞费苦心，竭尽全力阻止教授们发表抗议文字。蒋梦麟说，真正的核心问题是中国高等教育的骨干力量究竟能不能为了将来而被保存下来，中国究竟会不会在战争时期失去培育英才的教师队伍，从而陷于更大的混乱。他认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所受到的损害已经极其严重了。”(同上，第271页)

这些话既表现出蒋梦麟睿智，同时也透露了他的无奈。也许正因为这种无奈，他才不得不把部分精力放在学校之外。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他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从此离开了他服务多年的北大。

胡适：两次当校长



(1891—1962)

胡适的一生，当过两次校长。第一次在他的母校——上海中国公学，第二次在被他视为母校的北京大学。有意思的是，两次当校长都为政治原因而离任，这与颇具中国特色的政局有关。从表面上看，他是失败了；但是他所坚持的办学模式、教育理念、思想原则、文化追求，却是一笔丰富的遗产，值得仔细清理研究、不断学习继承。

执掌中国公学

胡适就任中国公学校长，是在 1928 年春天。这所学校成立于 1905 年，是由中国留日学生创办的。当时日本文部省公布了《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引起中国留学生强烈抗议，陈天华愤而蹈海，大批留学生退回上海，自行筹办了这所学校。1906 年至 1909 年，胡适曾在这里读书，从他的《四十自述》中可以看出，该校对他的成长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

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后，以庚款留学生身份赴美国留学。学成回国后，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1926 年 7 月，他借出席伦敦“中英庚款委员会议”之机，做环球旅行。没想到 1927 年 4 月即将回国的时候，中国政局发生了翻天地覆的变化。

从许多朋友的来信中，可以看出这种变化对胡适非常不利。

张慰慈说：“现在北京一般人的口都已封闭，什么话都不能说，每天的日报、晚报甚而至于周报，都是充满了空白的地位，这期的《现代评论》也被删去两篇论文，这种怪现象是中国报纸的历史上第一次看见。同时一切书信与电报都受到严格的


胡适在中国公学

检查,听说被截留的甚多,并且无故被捕的人也不少。上海的情形也与北京相同。”(《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23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

高梦旦也说:“时局混乱已极,国共与北方鼎足而三,兵祸党狱,几成恐怖世界,言论尤不能自由。吾兄性好发表意见,处此时势,甚易招忌,如在日本有讲授机会或可研究哲学史材料,少住数月,实为最好之事。”(同上,第429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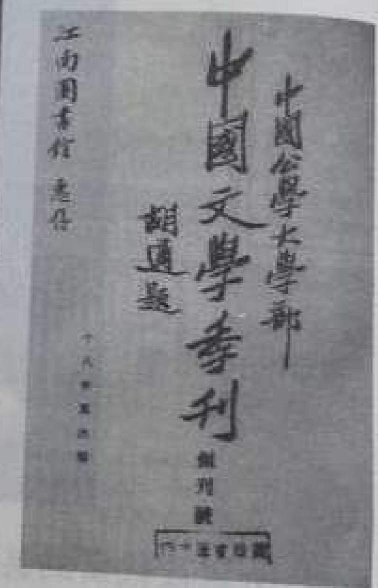
面对这种局面,胡适在日本稍事停留后还是回到上海。因无法返回北京大学,他只好就任光华大学教授并在东吴大学兼课。第二年春天,中国公学爆发学潮,学校董事会先后推举于右任、蔡元培出任校长,都被学生拒绝,理由是“于、蔡二人道德学问虽好,可惜兼职太多,恐不能专心办学”。(白吉庵《胡适传》第272页,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无奈之下,关心公学命运的王云五、朱经农等人找到胡适,请他出山,以解

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不能独立,仍然是作奴隶。
——胡适

我们是爱自由的人,我们要我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胡适



中国公学校友会欢迎胡适先生



胡适为中国公学刊物题词

危难。

在朋友劝说下，他答应维持两个月，到本学期结束后就辞职。即便如此，他也有点后悔，认为这是给自己“套上一件镣铐”。（《胡适日记全编·5》第64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两月后胡适提出辞职，校董会为了挽留他，特设副校长处理行政事务，让他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学术研究。

主张无为而治

胡适上任后，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他发现学校连一本正式校规都没有，便首先召开校务会议，通过“校务会议组织大纲”、“教务会议组织大纲”和“学校章程起草委员会”等议案。他说：“我想从组织与法律两方入手，不知有效否？”（同上，第7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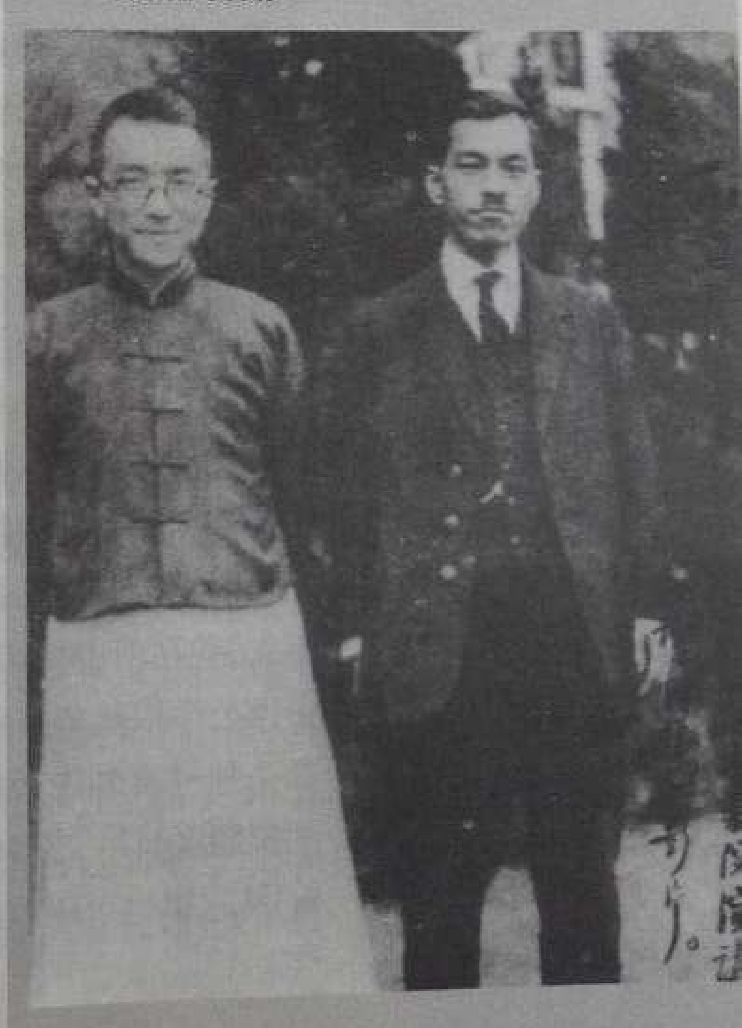
有了规章制度以后，胡适对学校事务便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副校长杨亮功说：“胡先生对于学校行政常以‘无为而治’自嘲，实际上他是以无为而为，与自然主义教育家卢梭以不教而教同是一样的态度。胡先生只注意于学校的重要问题，付与各主管以事权，并为之排除困难，因此养成各人自动自发的工作精神。”(《追忆胡适》第 250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与杨先生的评价相比，一位名叫陈咸森的学生讲得更透彻。他说：胡先生一贯主张无为而治，“这在当年我们做学生时还不大了解，直到 30 年后在台湾看到胡先生的一篇‘无为而治’的文章，那篇文内说到艾森豪做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和做总统时两件故事，方才明了胡先生的‘无为而治’的深厚道理。”(同上，第 255 页）

艾森豪就是艾森豪威尔。为了弄清楚所谓“深厚道理”，我们先看看这两个故事讲了些什么。第一个故事说的是艾森豪威尔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时，各部门领导都要前来拜访，谈谈各自的工作。于是他每天要接见两三位院长或部门负责人。几天以后，他问副校长，像这样的人一共有多少，对方说共有 63 位。艾森豪威尔两手举过头顶高声喊道：“天啊！太多了！太多了！我当盟军统帅的时候，只接见三位将领。我完全相信这三个人。他们手下的将领，我从来不用过问。想不到我当一个大学校长，竟要接见 63 位负责人，他们谈的我不大懂，又说不到点子上，这对学校实在没有好处。”

今日的苦痛，都是我们大家努力不够的结果。

——胡适

1927 年，胡适受聘于上海私立光华大学，曾应邀在东亚同文书院演讲，并与日语翻译合影





胡适(左)在 1946 年“制宪”大会上提出将教育经费列入宪法专条的提案

另一个故事是说艾森豪威尔当总统时爱打高尔夫球，有一天白宫送来一份急件，助手替他准备了两份批示，一份“表示同意”，一份“表示不同意”。没想到他居然在两份文件上都签了字，并交代说，请副总统尼克松替我挑一个吧。

在许多人眼里，这两个故事是嘲笑艾森豪威尔的，但是胡适却从中看出民主的真谛。当时他讲这两个故事，是为蒋介石祝寿的。他的意思是要蒋介石学一学人家的风度，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人，只有这样，才能乘众势，御众智。(《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 2551-2553 页，台湾经联出版事业公司 1884 年版)

胡适的这个观点对于那些一旦大权在握或负点责任，就想要搞出些名堂来的人来说是不好理解的。他们不懂得一个人智力和认识有限，“不轻易做一件好事，正如不轻易做一件坏事”一样，是富有积极意义的一条警示性戒律。这也是胡适初次与蒋介石见面，就把自己写的阐述这个道理的《淮南王书》送给对方的原因。

因为不能天天在学校，胡适每月只领 100 元车马费。朱经农过意不去，曾在信中关切地询问：“兄近日个人经济问题如何解决？闻兄在中国公学依然每月只领车马费 100 元，似不够用。上学期所定车马费是一种过渡办法，似不应永远如此。今年你未在他校教书，仅此 100 元安能度日？”(《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 488 页，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1983 年版)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胡适做人做事的原则。

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適

胡适手迹

沟通文理学科

所谓“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干。胡适上任时,全校共有300多学生,分散于四个学院17个系,致使学校经费异常困难。为此,他大刀阔斧地裁掉工学院、法学院和经济系,只设文理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以及中文系、外语系、哲学系、数理系等7个系。为了沟通文理,他亲自兼任文理学院院长,让有志于数理的人学点文史知识,有志于文史的人学点自然科学。事实证明,胡适的这一做法效果很好,比如吴健雄当年是数理系的学生,却肯在文科方面下很大功夫。有一次她还在胡适指导的作文课上获得100分,这件事不仅对吴健雄的影响很大,也成为胡适津津乐道的话题。

沟通文理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质,而且还是涉及到教育的目的何在。简单说,过早接受专才教育,不仅会因为知识面狭窄而难成大器,还容易成为会说话的工具,不会思考的奴隶。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胡适请来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前来任教,其中有人们熟悉的高一涵、张慰慈、杨亮功、罗隆基、梁实秋、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全增嘏、叶公超、饶孟侃、黄白薇等。这里特别要指出的胡适用人不仅看学历,更注重学力。比如他当时延聘沈从文,人们就有非议,觉得沈仅仅是小学毕业,又没有学术论文,怎能到大学上课?何况沈从文还不擅言词,第一次登台就因为胆怯,在讲台上站了10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搞得非常尴尬。但是胡适却坚信自己的眼力,后来沈从文也的确是深受学生的欢迎。这在今天简直是天方夜谭,是不可思议的事。

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胡适

生命本没有意义，你要能给他什么意义，他就有什么意义。

——胡适

在胡适的努力下，中国公学很快改变了过去的形象。一年间，学生由300多人猛增至1300。后来，一位学生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中国公学我不敢说它好，但我可以说它奇特，为什么呢？思想自由，教职员同心协力，有向上的精神，没腐化的趋势，就凭这点，在全中国可说是找不到的。”他还说，我的进步应该“感谢您和陆先生（侃如）、沈先生（从文）的思想言论”。（白著《胡适传》，第274页）

抵制国民党“党化教育”

这种局面的形成，首先与胡适对“党化教育”的抵制有关。推行“党化教育”是国民党掌握政权后的基本国策。1929年4月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指出：“各级学校之三民主义教育，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贯连，……以收笃信力行之效。”（《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第45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随后公布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在大学设立党义课程的目的是：“一、应以阐扬孙中山先生全部遗教及本党政纲、政策及重要宣言为主要任务。二、应以理论事实，证明三民主义为完成国民革命，促进世界大同之唯一的革命原理。三、应依据三民主义，比较批判其他社会主义学说。”此外，大学生还要“一律参加孙总理纪念周及其他革命纪念日，以增进爱护党国之精神。”（同上，第53-54页）

把一个人或一种思想神化，是专制制度的重要特征。对此，胡适采取了抵制的态度。罗尔纲回忆说，在中国公学读书时，“进了学校，首先使我痛快的，是不挂国民党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国民党纪念周”。（《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第89页，三联书店1995年版）

胡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只要看看任鸿隽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就明白了。他说：“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因此当人的利益与组织利益冲突的时候，自然要牺牲人的利益了。（《独立评论》第三号）在这方面，胡适有自己的理念和坚持。

树立良好学风

胡适担任校长后，同事们办了个《吴淞月刊》，“目的在于鼓励我们自己做点文


胡适在学生反内战集会上讲话

字。”为此，他在发刊词中立了“两条戒约”：第一要小题大做，不要大题小做；第二“要注重证据，跟着事实走，切忌一切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胡适全集》第3卷，第70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胡适还在1928年写过一篇《治学的方法和材料》，其中谈到治学既要有科学的方法，又要有鲜活的材料。所谓科学的方法，就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即“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所谓鲜活的材料，则是要摆脱纸上的学问，从故纸堆中走出来，到科学试验室里去寻找材料。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良好的学风。后来，他在学校以“怎样医治浪漫病”为题举办讲座，也谈的是这个问题。他告诫学生：浪漫病就是懒病，懒人没有做学问的兴趣；只有打破浪漫病，才能研究学问。（白著《胡适传》第354页）

重视同等学力

胡适重视同等学力，不仅表现在聘请教授方面，还表现在招收学生上。他虽然不管具体事务，却对许多事情非常留心。比如每年招生结束以后，教务处总要发出大批公函，向考生所在学生查询文凭真伪，如果发现假文凭，便照章开除。但这件事操作起来十分不便。有的学校根本不存在，发出的公函只能石沉大海；有的学校回信后，学生已经上了半个学期的课。他不忍心开除这些学生，便建议教务处看看

过去的北大，所以能占领导地位者，就是因为不专研究过去历史上的死问题，已经解决的问题；而是注重活的问题，当代人社会、人生、政治……所未解决的问题，来研究他，来解决他！望诸位同学，仍要照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胡适



胡适印章

他们开学后的成绩，对学习好的从宽发落。然而教务处的人却不愿开此先例，"所以我们只好硬起心肠来干那'挥泪斩马谡'的苦戏"。(《胡适全集》第20卷，第18页)后来，胡适还发现在学生遗弃多年的杂物中，有一个大学的公章和一枚校长的私章。这显然是伪造证件的证据，然而作伪者早已毕业。

另外，他还听说四川有位校长每次外出，都要带些空白毕业证送人。起初他还不相信，1929年他在北平，一位本家居然同他商量，让他的侄子去考清华。他听了很吃惊，说自己的侄子初中刚毕业，怎么可能去考清华？对方说，一位朋友是中学校长，他可以办一张高中毕业证。胡适气愤地说："我们家的子弟怎么好用假文凭！"气愤归气愤，但面对这种情况，胡适知道这种文凭的确是"真"的，无论怎样去查，也不能证明其假。

胡适认为，这种状况从根子上说与教育部有关。当年教育部废除具有同等学力者可以报考大学的规定，才使假文凭泛滥起来。如果不能容许具有同等力者报考大学，就等于"政府引诱青年犯罪"，(同上，第188页)就不会从根本上消灭假文凭现象。

重视同等学力，是胡适的一贯主张。1934年，他在《大公报》发表《谁教青年学生造假文凭的》一文，把上述事实和想法写了进去。1937年7月，他在庐山谈话会讨论教育问题时，又提出承认同等学力是"救济天才，以阻止作伪犯罪"(《胡适日记全编.6》第694页)的好办法。

提倡体育精神

胡适在中国公学任职时间很短，满打满算才20个月，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却可

圈可点。别的不说，单说他对学校运动会的认识，就让人振聋发聩。

胡适从小体弱多病，不大喜欢运动。到美国后第一次观看橄榄球比赛，在队员的厮杀和拉拉队助威声中，他有些不习惯。心想：“这真是罗马时代的角抵和斗兽的遗风，很不人道的。”（同上，第20卷，第89页）随着对西方文明的深入了解，他认识到体育不仅可以锻炼身体，对人格的养成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大约在1930年春季，中国公学要召开学校运动会，为了让同学们踊跃参加，正确对待竞赛中的胜败，他亲自撰写运动会会歌。这首歌的歌词如下：

健儿们大家向前，
只一人第一，
要个个争先。
胜固然可喜，
败亦欣然，
健儿们大家上前。

健儿们大家齐来。
全体的光荣，要我们担戴。
要光荣的胜，
光荣的败，
健儿们大家齐来。

在运动会开幕式上，他还致词说：“运动会是一种教育，是一种训练，不是一种游戏。”他还说，大家都在跑，而得奖的只有一人。假如按照平时的成绩，已经知道某人一定会夺得锦标，难道我们就不参加了吗？不，大家还应该参加。有了我们的加入，他才会有第一；没有我们的陪衬，他一个人算不得第一。正确的态度是：他得他的第一，我们搞我们的训练；他的光荣，也是我们的光荣。这才是真正的体育精神。”幕词结束时，他还说：“祝诸君人人有光荣的胜，人人有光荣的败！”

学校的自由风气不能结晶于自治能力的发展，是一大危机。
——胡适

今日中国教育的一切毛病，都由于我们对教育太没有信心，太不注意，太不肯花钱。教育所以“破产”，都因为教育太少了，太不够了。教育的失败，正因为我们今日还不曾真正有教育。
——胡适

（白著《胡适传》第279页）

胡适倡导的体育精神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适用于体育比赛，也适用于其他领域。1948年初，胡适得知李宗仁准备参加副总统竞选，认为这是实行宪政后的第一次大选，要多些人参加，才能充分表现民主精神。他给李宗仁写了一封信，信中抄录《中国公学运动会歌》的第一段，并且说："第一虽只有一个，还要大家加入赛跑，那个第一才是第一。"（《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013页）在他看来，无论是体育还是政治，都要提倡"重在参与"，不应该唱独角戏。

寄语毕业同学

1929年7月，中国公学18级学生毕业，胡适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讲了一番话——

> 诸位毕业同学：
>
> 你们现在要离开母校了，我没有什么礼物送给你们，只好送你们一句话罢。
>
> 这一句话是："不要抛弃学问。"以前的功课也许有一大部分是为了这张毕业文凭，不得已而做的，从今以后，你们可以依自己的心愿去自由研究了。趁现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努力做一种专门学问。少年是一去不复返的，等到精力衰时，要做学问也来不及了。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到那时候再想做点学问来补救，恐怕已太晚了。

接下来，胡适针对一些人的想法，谈到所谓没有时间、不具备条件，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你对自己负不负责任。在此基础上他告诫自己的学生："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们自己。"（《胡适全集》第3卷，第825-826页）

胡适认为，生命的意义是每个人赋予它的。"人生固然如梦，但一生只有这一场做梦的机会"。因此，要想"努力做一个轰轰烈烈像个样子的梦"，而不是"糊糊涂涂懵懵懂懂混过这几十年"光阴（《胡适全集》第3卷，第818页），唯一的选择就是不要抛弃学问。



1948 年胡适（中）参加第一届国民大会时与朋友合影留念，左二朱家骅，右二胡先骕

为争人权、争自由而去职

胡适在办好大学的同时，还关注社会动向，参预社会活动。

1929 年 3 月 10 日，《新月》第二卷第一号《编辑后言》中，提到要办一个思想性刊物。这是由于《新月》是“专载长篇创作和论著的”，因此“我们几个朋友”决定在这个月刊以外再办一个周刊或旬刊，取名《平论》，由“平论社”发行，无非是想说几句平正的话，表示一些平正的观点而已。

3 月 23 日，徐志摩、梁实秋、罗隆基等人造访胡适，劝他担任《平论》主编，胡推辞不掉，只好答应，并商定于 4 月 1 日出报。3 月 25 日，胡适为《平论》撰写一千六七百字的发刊词。这篇文章被收入最近出版的《胡适全集》第 21 卷中，题目是《我们要我们的自由》。

文章说：“近两年来，国人都感觉舆论的不自由。在‘训政’的旗帜之下，在‘维持共信’的口号之下，一切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得受种种的钳制。异己便是反动，批评便是反革命。报纸的新闻和议论至今还受检查。稍不如意，轻的便停止邮寄，重的便遭封闭。所以今日全国之大，无一家报纸杂志敢于有翔实的记载或善意的批评。”

接下来，文章分析了没有言论自由的严重后果，指出这是一个民族的最大耻辱。然后又明确表示：

我们国家受外侮，到此地步，究竟是什么缘故，直截了当的说，就是学术不如人。

——胡适

学问便是铸器的工具，抛弃了学问便是毁了你们自己。

——胡适

我们是爱自由的人，我们要我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我们不用说，这几种自由是一国学术思想进步的必要条件，也是一国社会政治发达的必要条件。

我们现在要说，我们深深感觉国家前途的危险，所以不忍放弃我们的思想言论自由。

我们的政府至今还在一班没有现代学识没有现代训练的军人政客的手里。这是不可讳的事实……

胡适强调："争自由的方法在于负责任的人说负责任的话。"

随后，他又在题为《我们对于政治的主张》的文章中说：

我们都没有党籍，也都没有政治派别。我们的唯一目的是对国家尽一点忠心。所以我们的政治主张不用任何党义作出发点。我们的出发点是中国的实在需要，我们的根据是中国的实在情况。

我们不想组织政党，不想取什么政党而代之，故对现在已得中国政治权的国民党，我们只有善意的期望与善意的批评。我们期望它努力做的好。因为我们期望它做的好，故愿意时时批评它的主张，组织，和实际的行为。批评的目的是希望它自身改善。

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还谈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党的地位应该同民治国家的议会相仿；第二，各级党部的经费应该靠党费支付，党的机关应该大大裁减；第三，除了行政独立外，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也必须独立，不受党和行政机关的牵制……

1929年3月29日，胡适与徐志摩等人为《平论》再次碰头，因稿子的份量不够，遂决定推迟到4月10日出刊，但不知什么原因未能如期面世。到了4月21日，平社在胡适家第一次聚餐，参加者除梁实秋、徐志摩、罗隆基外，还有丁西林、叶公超、吴泽霖。随后，平社每周聚餐一次，并增加潘光旦、张禹九、唐庆增、刘英士、任鸿隽等人。然而不知为什么，这份刊物始终没有问世。

我猜测，这可能与当时的"争人权"有关。1929年4月20日，正好是平社举行第一次聚餐会的前一天，国民政府下达保障人权的命令。第二天，胡适从报上看到

这个命令，当即表示怀疑。半个月以后，胡适草成《人权与约法》一文，对这一命令提出严正质疑：

第一，命令认为人权由“身体、自由、财产”组成，却对这三项没有明确规定，这是很严重的缺点。

第二，命令只是禁止“个人或团体”侵犯人权，却回避了政府和党部对人权的侵犯。

第三，命令中所谓依法惩办，不知道依的是什么法。

文章说，事实上中国的人权从来就没有法律保障，因此要保障人权，首先应该制定一部宪法或约法，否则，保障人权就是一句空话。

随后，他又写几篇文章，掀起一场关于人权问题的大讨论。在《知难，行亦不易》中，他公开批评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中，又对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提出质疑；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中，更是直截了当指出：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所以他们天天摧残思想自由，企图以压迫言论自由来达到思想的统一。

这些文章在《新月》和《吴淞月刊》发表后，立刻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蔡元培称“大著《人权与约法》，振聋发聩，不胜佩服”（《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17页）；张謇之子张孝若说：“先生在《新月》所发表的那篇文字，说的义正词严，毫无假借，真佩服先生有识见有胆量！这种浩然之气，替老百姓喊几句，打一个抱不平，不问有效无效，国民人格上的安慰，关系也极大。试问现在国中，还有几位人格资望够得上说两句教训政府的话？”（同上，第525页）他还写了一首诗赠予胡适，表达了自己的感想与担忧，并嘱咐不要发表。（同上，第546页）该诗可以在1929年9月10日的胡适日记中找到：

许久不相见，异常想念你。
我昨读你文，浩然气满纸。
义正词自严，鞭辟真入里。
中山即再生，定说你有理。
他们哪懂得？反放无的矢。

中国公学我不敢说它好，但我可以说它奇特，为什么呢？思想自由，教职员同心协力，有向上的精神，没腐化的趋势，就凭这点，在全中国可说是找不到的。
——胡适

我们的出发点是中国的实在需要，我们的根据是中国的实在情况。
——胡适

一党说你非，万人说你是。

忠言不入耳，劝你就此止。

这些文章能够问世，表明当时社会还是有一定言论空间的；但上海、北平、天津、江苏、青岛等地的国民党党部坐不住了。他们纷纷召开会议，认为"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公然侮辱本党总理，并诋毁本党主义，背叛政府，煽惑民众，应请中央转令国府，严予惩办"。（《胡适日记.5》，第489页）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根据这些无理要求，也认为胡适文章"超出学术研究范围，泛言空论，错误甚多"，有失大学校长尊严，并损害了党政形象，要求教育部严加警告。（同上，第521页）

9月下旬，教育部根据上面指示，向中国公学发出训令，要求对胡适提出警告。对此，胡适在写给老朋友、教育部长蒋梦麟的信中，义正词严地说："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同上，第538页）不过，另一位老朋友张元济却劝他应置之不答，以保我尊严。张还说，如果在"前清康雍之朝，此事又不知闹成何等矣。毕竟民国政府程度不同。"（同上，第541页）

尽管张元济的说法不无道理，但问题是国民党地方组织为什么会如此嚣张？对此，一些外国媒体道出其中奥妙。《新时代》指出：由于中国国民党"是至高无上的政治团体，不容忍敌对党派"，再加上胡适的批评被认为是"公然侮辱本党领袖孙中山先生"，而去世的孙中山已经被神化，因此他们要严惩胡适。（同上，第544-545页）《纽约时报》也指出，胡适是"现代中国最英明的、最有建设性的领袖之一，……他正致力于中国思想和教育的现代化过程。现在他受到谴责，并不是因为其个人的政治抱负，而是因为他的那种直言不讳的习惯使他敢于提意见：在国民党人的统治下，一切并不像外界所相信的那么美好。尤其，他对以已故孙中山博士的名义提出的一些经济学说的正确性提出质疑。他的罪责不在于他不同意如此多的观点，而在于他道明了几分真理。"（同上，第553页）

尽管《平论》未能问世，但是平社的活动一直在进行。1930年4月，胡适为他的那篇著名文章《我们走那条路》撰写"缘起"时说："我们几个朋友在这一两年中常常聚谈中国的问题，各人随他的专门研究，选定一个问题，提出论文，供大家的讨论。去年我们讨论的总题是'中国的现状'，……今年我们讨论的总题是'我们怎么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篇文章就是第二个问题的引论。在这篇文章中，胡适提出

中国的真正问题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解决这些问题不能靠制造专制的暴力革命，而应该采用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一步一步地进行改革。(《胡适全集》第 4 卷，第 455-470 页)

鉴于当局的压力，特别是在立案问题上有意刁难，胡适终于辞去校长职务。1930 年初，他正式提出辞呈，学校董事会几经挽留，终于接受他的请求，并决定由公学的第一任总教习马君武继任。遗憾的是，胡适去职后，中国公学风潮又起，为此马先生也被迫离去。在此期间，学校总务长丁某被指控有贪污行为，胡适还为丁辩诬，体现他“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人格追求。

即为吃饭计，学问决不会辜负人的。吃饭而不求学问，三年五年之后，你们都要被后进少年淘汰掉的。

——胡适

十五年后执掌北京大学

胡适离开中国公学后，曾就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为振兴北大立下汗马功劳。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临危受命，担任中国驻美大使，为争取美国援助、建立国际反法西斯联盟做出重大贡献。抗战胜利后，蒋梦麟因为担任行政院秘书长，按照《大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胡适



胡适（右三）接待外国友人（1948 年）



胡适(中)返回北大担任校长,受到傅斯年(左)等人热烈欢迎

学组织法》必须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于是,远在美国的胡适就成了北大校长的最佳人选。1945 年 9 月 3 日,教育部长朱家骅致电胡适,表示北大校长"非兄莫属",在他回来就任之前,由傅斯年暂时代理校务。



校友会欢迎胡适担任北大校长

9 月 6 日,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下达后,著名学者张其昀、丁声树、贺麟、罗常培、许宝騄等人都在信中表达了内心的喜悦。

张说:"30 年来北大是中国新思想的策源地,为中外所公认,今后在先生领导之下,确立学院自由的尊严,料想异卉争妍,烂漫向荣,其盛况定属空前。"(《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 38 页)

丁说:"北大的使命在新中国的建设,将更重大而艰难,于此何幸得先生的伟大领导,教人如何能不感奋,能不高兴!先生的学风,先生的襟度,其肫笃伟大只有蔡先生可以比拟"。(同上,第 39 页)

贺说："先生长北大之消息传出后，众望所归，群情欢悦，不仅为北大之复兴庆幸，且为整个中国教育学术之光明进步庆幸。"在这封信中，他还就国内政局谈了自己的看法："日本投降，中国已走上和平建国之途。政治民主化亦为必然之趋势，但仍须教育、思想、言论各方面积极努力，基础方巩固。"(同上，第 40－41 页)

当时还在国外的罗常培也表示："如果北大复员，特别是由先生主持，我义不容辞地应该早回国。"他还说："先生去国后，北大事实上已失去学术重心，要想复兴，须恢复民 8 至 13 以前，或 20 年至战前的学术空气。"(同上，第 41－43 页)

由此可见，北大的复兴、中国学术的进步，与胡适密切相关。

1946 年 6 月初，胡适忙完国外事务后，由纽约启程，经过大约一个月行程，才抵达上海。回国后，胡适受到各方面的热烈欢迎。

在此之前，傅斯年已经为他完成北大的复员任务，并处理了许多棘手的事情。吴相湘在一篇文章中说：当年"傅斯年在北平，为北京大学保持优良传统，对排除伪北大教职员及整顿校风纪律，毫不瞻徇。同时更将北大原有文、理、法三院扩展为文理法农工医六院。"他认为，没有傅斯年的伟大魄力，这些事是办不成的。(《傅斯年印象》第 185 页，学林出版社 1997 年版)傅斯年卸任时，胡适对他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

胡适归国之前，曾考虑过发展尖端科学的问题。为此，他与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商量，准备聘请张文裕、彭桓武、马仕骏、张宗燧、李四光、钱学森、汪敬熙、黄昆等学者来北大任教。饶还建议钱学森可以担任工学院院长，后因故未能实现。1947 年他还在写给白崇禧、陈诚的信中建议，北大应集中全国第一流物理学家，专门从事原子能研究。其中还提到钱三强、何泽慧夫妇，袁家骝、吴健雄夫妇以及胡宁、吴大猷等人。

乃在乎制定种种防弊的制度。故救济之道不在乎妄想人心大变，道德日高，人性是不容易改变的，公德也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

——胡适

读书可以帮助解决困难，应付环境，供给思想材料。

——胡适

"善未易明、理未易察"

1946 年 10 月 10 日，胡适出席上任的第一个开学典礼，并发表

我注意到，在最近出版的《胡适全集》第20卷中，收有这篇演说。据全集编者介绍，这篇演说原载于当年的《经世日报》，后来收入白吉庵等编的《胡适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但是细读该文，其中有“最后胡适谈到”和“胡氏讲话，历时70分钟”等语，好像是记者的通讯稿。《经世日报》不大好找，白吉庵在《胡适传》中，结合《大公报》报道对演说内容有详细介绍。从这些材料中，可以看出胡适的风采和当时他讲了些什么。

据说开学典礼在位于城南国会街的北大第四院举行。当时胡适穿着长袍马褂，他首先把北大48年的历史分为6个阶段：1898年至1916年为“开办时期”，北大被世人讥为“官僚养成所”；1916年至1927年为“革新时期”，在此期间，北大领导了中国的文学革命、思想革新和五四运动；1928年至1931年为“过渡时期”，北大曾经遭受歧视，一度成为北平大学的一个学院；1931年至1937年“中兴时期”，虽然困难很大，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和日本的侵略，使学生不能安心读书，但北大在蒋梦麟校长领导下，仍取得很大成就；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5年抗战胜利，是“流亡时期”，北大与清南开合组西南联大，在最艰苦的环境中继续从事学术教育工作；抗战胜利后，北大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为此他“希望教授、同学都能在学术思想、文化上尽最大的努力做最大的贡献，把北大作成一个像样的大学；更希望同学们都能‘独立研究’”，而不要以他人的思想为思想，他人的信仰为信仰。(《胡适全集》第20卷，第224页)

在演讲的结束时，他特别强调做一个能独立思考、独立研究的人有多么重要。他说：“你们大门上贴着欢迎我的标语，要求自由思想、自由研究，为什么我要你们独立，而不说自由呢？要知道自由是对外面的束缚而言，不受外面势力的限制与压迫，这一向正是北大的精神。而独立是你们自己的事，不能独立，仍然是作奴隶。”

他还说：“学校当然要给你们以自由，但是学校不能给你们独立，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我是一个没有党派的人，我希望学校里没有党派，即使有，也如同有各种不同的宗教思想一样。大家有信仰自由，但切不可毁了学校，不要毁了这个再过多少年不容易重建的学术机关。”最后他用南宋思想家吕祖谦的名言“善未易明、理未易察”告诫大家：“善”是不容易明白的，“真理”也是不容易弄清楚的。(白著《胡适传》第422页)

学术独立的两层含义

作为北京大学的校长，胡适在学术界负有重要的责任。他不仅关心学术的发展，更关心学术的独立。学术独立有两层含义：一是学者要坚持独立人格，二是学界要有独立地位。

1946年“制宪”国民大会结束以后，蒋介石希望胡适能够以社会贤达的身份担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长，他认为这是给他帮忙，给国家和政府“撑面子”。对此，胡适的看法是：“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他说，我们这些人在野，“是国家的，政府的一种力量，对外国，对国内，都可以帮政府的忙，支持他，替他说公平话，给他做面子。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30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结果是连我们说公平话的地位也取消了。——用一句通行的话，‘成了政府的尾巴’！”（《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175页）

后来，胡适在致蒋介石电稿中又重申：“北大此时尚在风雨飘摇

读书先要会疑，学者须于无疑中寻找疑处，方为有得。

——胡适

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

——胡适



胡适（中）为北大学生主婚



1947 年胡适（前排右四）与张伯苓（前排右五）、梅贻琦（前排右六）等人发起平津民治促进会

之中，决不许适离开，道义上适亦不愿离开北大。万一命下之日，学校人心解体，不但北大蒙其害，亦甚非国家之福。故只有恳请我公许适不参加国府委员会，许适以超然地位继续为国家社会尽其绵力。”（同上，第 194 页）1948 年召开“行宪”国民大会，蒋介石又想让他竞选总统，自己担任行政院长。尽管胡适认为蒋是真诚的，但他还是不愿意放弃学术研究。后来，这件事因国民党内部意见不一致，遂不了了之。

除了保持学者个人的独立地位外，就整个学界而言，也有个能否独立的问题。1947 年 9 月，胡适利用赴南京出席中央研究院院士选举筹委会之机，向蒋介石提出“十年教育计划”，其主要内容有两点：第一，要选择 10 所大学，在 10 年内分两批给予充足的经费，办成国际上第一流大学；第二，反对花大宗外汇派人出国留学。他说与其拿这些钱送学生出国留学，不如用来发展国内大学。他认为，如果若干年以后，中国还“有成千成万的学生去日本留学，那是极可耻”的事。（《胡适日记全编.7》第 667 页）胡适还提议中央在教育文化方面的投资不得少于政府预算的 15%，各省不得少于 25%，市县不得少于 35%，私立学校与国立学校应该有同等机会，大学教育应该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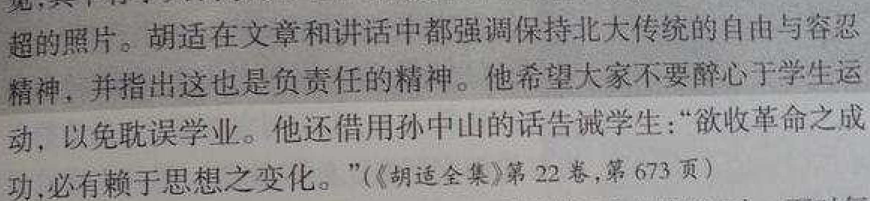
这个计划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当年年底，胡适在中基会第二十次年会上，为北京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和武汉大学争到一笔经费，他决定把这10万美金用于物理系。后来这一计划因为内战的爆发而未能实现。



胡适夫妇

师长和朋友

1947年5月4日前后，北大举行“五四”运动28周年纪念周活动。不仅有科学、文艺、历史、经济、戏剧等晚会以及各种体育比赛，图书馆还举办校史展览，其中有李大钊事迹、毛泽东故事和周恩来、邓颖超的照片。胡适在文章和讲话中都强调保持北大传统的自由与容忍精神，并指出这也是负责任的精神。他希望大家不要醉心于学生运动，以免耽误学业。他还借用孙中山的话告诫学生：“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胡适全集》第22卷，第673页)



在此期间，北大学生卷入了全国性“反饥饿、反内战”运动。面对复杂的局面，胡适一方面指出：“没有真正代表民意的机关替人民说话时，干预政治，提倡政治改革的责任，一定落在青年肩头”；一方面又表示，只有潜心研究政治科学，才能解决问题，“罢课是最愚笨而最不易收效的武器”。(《胡适日记全编.7》，第655-656页)

就在“反饥饿、反内战”游行进入高潮的时候，北大一年级学生邓世华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向他诉说自己的苦闷。邓说，按理说学生应该埋头读书，但现实却让他无法安心。面对物价的暴涨和残酷的内战，他甚至产生自杀念头。为此，他向胡适提出“内战会不会停止”、“国家是否还有救”等7个问题。胡适收到邓世华的信以后，非常感动，马上给他写了回信。胡适首先指出：“今日的苦痛，都是我们大家努力不够的结果。科学不如人，工业生产不如人，学问知识不如人，技术不如人，故经过8年的苦战，大破坏之后，恢复不容易。”

接下来他针对所谓苦闷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青年人的苦闷，

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继续保持追求学问的热心。

——胡适



胡适40岁时，二儿子思杜10岁，这是胡适夫妇与思杜当时的留影。胡思杜50年代在大陆身亡

都是因为你们前几年太乐观了，梦想'天亮'之后就会'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了！殊不知道战争是比较容易的事，和平善后是最困难的事。试看世界的二三强国，战胜了，都还不能享受和平的清福，都还有饥饿的问题。"随后他以自己在英国的所见所闻，说明英国人民能够谅解国家的困难，知道在战后必须"束紧裤带，挺起脊梁，埋头苦干"，才有出路。可见悲观不能救国，叫喊不能救国，不努力也不能救国。"我们的将来全靠我们今后如何努力。"(《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第201-205页)

胡适对人循循善诱，在交往中从来不会摆谱。据说他的办公室大门常开，随时可以进去。因此"胡校长的办公室"被誉为"世界最民主的俱乐部"。邓嗣禹在《胡适之先生何以能与青年人交朋友》一文中说："他能礼贤下士，无学阀官僚架子；他爱护青年，想与他们交朋友；他很健谈，能与人真诚相待。"(《追忆胡适》第478-489页)可谓胡适的真实写照。

呼唤民主自由

二战以后，世界的两极分化日趋明显，有人甚至鼓吹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面对新的世界格局和专制主义的扩张，胡适于1947年5月邀集北大、清华等学校的部分教授，组成"时论社"，希望对国内外重大时事政治问题，发表独立公正的评论。于是，他不仅写了许多文章，还在许多场合发表演讲，呼唤民主和自由。

5月18日，他在《眼前"两个世界"的明朗化》中明确指出，由于苏俄与美国根据自己的切身利

益，都不愿破坏来之不易的世界和平，因此"至少在最近10年内，大概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胡适全集》第22卷，第689-680页）

8月1日，他在中央电台以《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为题发表演说，在介绍了文化自由选择、自然交流之后，提出世界文化的理想目标：

第一，用科学的成绩解除人类的痛苦，增进人生的幸福。

第二，用社会化的经济制度来提高人类的生活，提高人类生活的程度。

第三，用民主的政治制度来解放人类的思想，发展人类的才能，造成自由独立的人格。

他指出：民主自由是人类社会300年来的大潮流，大方向，而苏俄用极权主义压抑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不幸的事。这种反自由、不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不好的，所以必须依靠暴力强力来维持它，结果是30年很残忍的压迫与消灭反对党，终于从一党的专制走上一个人的专制。"他的结论是："所谓'两个世界'的对垒，其实不过是那个反自由不容忍的专制集团，自己害怕自己气馁的表现。这个集团至今不敢和世界上别的国家自由交通，这就是害怕的铁证！……要造成自由独立的国民人格，只有民主的政治可以满足"。（同上，第



担任北大校长后的胡适


上世纪 30 年代
胡适重返北大任教

687-694 页）这篇演说还被《大公报》等多家报刊转载。

一年以后，正是内战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胡适从反对人民解放战争的立场出发，发表《自由主义是什么？》的文章，并在北平电台发表广播稿继续鼓吹自由主义，主张和平的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

后来，他还应周鲠生、竺可桢两位校长之邀，分别去武汉大学、浙江大学讲演。在武汉住了三天，他讲演 10 次，嗓子都哑了。当地报纸说："他的讲演和他的清畅的文体，都可以表现出他的超人智慧和朴实笃学来，在今天中国我们有一个胡适，这是值得骄傲的。"（《胡适日记全编.7》，第 718-719 页）在浙大，胡适的讲演也是盛况空前。竺可桢在日记中说："二点约适之在体育馆演讲，题为《自由主义》，听者八九百人。听者大部均驻足而立，但终一小时二十分，鲜有退者，亦可知适之演讲之魔力也。"（《竺可桢日记》，第 1183 页，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自然，这只是社会反响的一面，另一面则是左翼人士和进步学生对他猛烈的批评，认为他鼓吹自由主义的实质是在帮当时已陷入四面楚歌中的国民党顽固派的忙。

不寻常的校庆

1948 年 12 月 17 日，是北大 50 周年校庆，也是胡适 58 岁生日。这本来是个大喜的日子，然而这时的北平，已经是兵临城下，被人民解放军围得水泄不通，谁都知道政权易手是早晚的事了。

这时，蒋介石派人劝胡适早点离开北平，但是他一直犹豫。12 月 13 日，胡适还惦记着北大校庆，他写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其中说："在世界大学的发达史上，刚满 50 岁的北京大学真是一个小弟弟，……这个小弟弟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他指出，北大是"戊戌新政"的产儿，早年经历义和团动乱和民国初

年的变局，后来在蔡元培、蒋梦麟的主持下，经过30年努力，才成为一个持续发展的学术中心。然而，30年代初正值北大复兴的时候，日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当时，由于大家“都打定主意，不顾一切，要努力把这个学校办好，努力给北大打下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所以北大在那最初6年的国难之中，工作最勤，从来没有间断”。在文章最后，他心情十分复杂地说：“现在我们又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做50岁生日”，“我讲这段故事，是要说明北大这个多灾多难的孩子实在有点志气，能够在很危险、很艰苦的情形之下努力做工，努力奋斗。”（《胡适全集》第20卷，第269-272页）这段话，就成了胡适与北大的临别赠言。

第二天，南京方面打来电话、发来电报，说飞机即将到达，请他“即日登程”。他将校务托付给汤用彤、郑天挺之后，才决定南下，然而飞机并没有如期到达。直到15日下午，他才与妻子以及陈寅恪等人登上飞机直飞南京。12月17日北大举行50周年校



1947年胡适（左二）参加清华校庆活动，与校长梅贻琦（右二）等人合影留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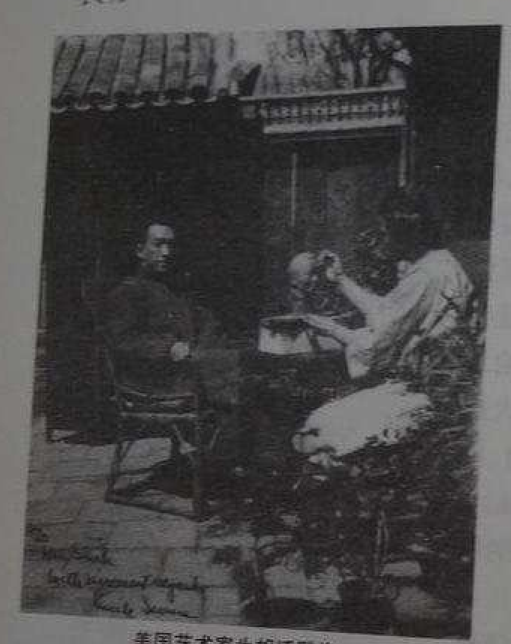
有骨子就是有奋斗精神，认为是真理，虽死不畏，都要去说去做。不以我看见我知道而已，还要使一班人都认识，都知道。由少数变为多数，由多数变为大多数，使一班人都承认这个真理。

——胡适

教育是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睛，能明白观察；不是给人穿一件锦绣的衣服，在人前夸耀。

——胡适

庆的时候，胡适已经不可能参加了。不过，这一天下午，胡适还是在中央研究院礼堂参加了北大同学会举办的校庆大会。会上，他称自己是一名逃兵。并失声痛哭地说：我不能与多灾多难的学校同度艰危，实在没有面子在这里说话。这时，"会场凄然断绝"。（《胡适年谱》第702页）



美国艺术家为胡适雕像

写到这里，再回过头来比较一下胡适两次当校长的遭遇，是很有意思的。20年代末，胡适在中国公学当校长，正是国民党刚刚夺得政权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因为批评国民党而被迫离职；到了40年代末，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眼看大势已去的时候，他却跟着国民党走了。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如果进一步了解他的思想见识，就可以看出他为什么会这样。不过这已经是另一篇文章的任务了。

这里我只是记录胡适两任大学校长的大致过程和有关理念和做法，作我们今日改进大学教育的某种研究和参考。

梅贻琦怎样做人做事



（1889—1962）

办好一所大学，除了现代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之外，还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充足的经费，二是称职的校长。有了充足的经费，才有可能聘请优秀教师、购置先进设备、资助困难学生、提高教学质量、活跃校园生活……有了称职的校长，才会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位好校长，再多的经费也不会花到正经地方，弄不好还会落入私人腰包。

所谓称职，除了懂行之外，更重要的是人格高尚。人格修养与制度建设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前者属于自律，后者属于他律。在制度还不健全尚不完善的时候，人格修养就显得特别重要。当年清华大学能够成为人们心目中最好的学校，就是因为具备这样两个条件——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为它提供了充足的经费，梅贻琦校长的人格风范为它步入辉煌提供了可能。

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说起来比较复杂；但是梅贻琦先生的人格风范，却是有口皆碑的事实，他的所作对我们今天办大学办教育，还是一面明亮的镜子，一份珍贵的遗产和资源。

梅贻琦字月涵，1989年生于天津。据说其先祖是朱元璋的驸马，受命驻防天津卫。从此，"天津梅氏"成为当地望族，并享有"以忠厚积德为家法……子姓繁衍，书香继美，一门之内，孝友著闻"（《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401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第2版）的声誉。清朝末年，梅家开始衰败，梅贻琦的父亲虽然是个秀才，却在店铺谋生，后来又因为庚子之乱失业，全家生活陷入困境。1904年，15岁的梅贻琦以世交之谊进入南开学堂，因成绩优异，颇受张伯苓赏识。1908年，他被保送到保定高等学堂。第二年，清政府成立"游美学务处"与"游美肄业馆"（清华大学前身），招

收第一批庚款留学生，他以第六名的成绩被录取，赴美国吴士脱工业大学攻读电机专业。1915 年，梅贻琦获得工学士学位后回国，先在天津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半年，后应清华邀请前去任教，从此，他以毕生经历贡献于自己的母校。所以，他经常用“生斯长斯，吾爱吾庐”来形容他与清华的关系以及他对清华的热爱。

1925 年，清华增设大学部，梅贻琦担任物理系首席教授。第二年四月，他被全体教授推选为教务长。1928 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清华正式改为国立大学。不久，清华留美学生监督处财务混乱，他被派往美国担任该处监督。1931 年，在清华校长连续易人、局势动荡不定的情况下，他奉调回国担任校长，终于稳住局面，开创了清华大学的黄金时代。


在美国留学时的梅贻琦

一句名言的来历

梅贻琦担任教务长以后，曾拟定《清华发展计划》和《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等文献。前者认为，清华发展的根本问题是根据财政状况来聘请好教员，增加新设备，至于行政部门则不要继续扩充；后者则提出培养人才的各项方针，其中特别强调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之重要。此外，他还参与制定了《清华学校


担任清华教务长时的梅贻琦

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他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

——梅贻琦



抗日战争前的清华大学校长宿舍

接任清华大学校长时的梅贻琦

组织大纲》和《国立清华大学规程》等制度。

担任校长后，梅贻琦在就职典礼上明确指出，办大学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材。为此，他提出"学术造诣，是不能以数量计较的"观点。(《梅贻琦教育论著选》，第 10 页，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3 年出版）用这个观点来对照一下如今在大学校园流行的量化考核制度，真是发人深思，令人长叹。

在这个简短的就职演说中，梅贻琦还说了一句非常精辟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虽然广为流传，但许多人未必知道其来历。根据追随梅贻琦多年的赵赓扬回忆，当年梅先生回国担任校长时，正是美金升值、学校经费绰绰有余的时候。为此，各院系除了大量购买图书仪器外，校园内还有一股大兴土木之风。因此，他在就职典礼上说这句话，是要强调大学的好坏取决于大师的多少，而不是大楼有多高。后来施嘉炀教授也说，抗战胜利后，梅先生还在《校友通讯》中写道："纵使新旧院系设备尚多欠缺，而师资必须蔚然可观，则他日校友重返故园时，勿徒注视大树又高几许，大楼又添几座，应致其仰慕于吾校大师又添几人，此大学之所以

为大学，而吾清华最应致力者也。”(《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289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95年2月第2版)看到这里也许有人会问：倘若梅先生知道如今建筑市场的潜规则也在校园里大行其道，而广大教师在各种压力下也很难提高教学研究水平时，他会作何感想、有何议论呢？

教授治校的管理模式

当然，如今一些学校也有重金聘请名师和留洋博士的举措，但那往往是为了争取经费、争夺课题、申报博士点等需要。相比之下，梅贻琦聘请教授，却不仅是为了教书育人，还为了群策群力，共同管理好这所学校。

这就涉及到清华的一个传统——“教授治校”了。近年来，大家都觉得教授治校是一种很好的管理模式，但是如果不解决操作问题，教授治校就可能流于形式，甚至成为一个空头口号。据一些当事人回忆，大约在1925年以后，清华有一个没有校长或者有校长也不起作用的阶段，学校事务由校务会议决定。为了保证学校行政独立、学术思想自由，抵制上面派来的校长独揽大权，清华教授们经常召开教授会议讨论学校大事。这一点，从1926年的吴宓日记和其他一些材料中可以看出。教授会之外，还有一个由教授会推选的评议会。那么校务会、教授会、评议会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近年来关于清华北大的书出了不少，但其中大多数在制度方面都言之不详。我查了一下民国十五年(1926)梅贻琦参与制定的《清华学校组织大纲》，才知道评议会由校长、教务长以及7名评议员组成。其职权如下：

一、规定全校教育方针；

二、议决各学系之设立、废止及变更；

三、议决校内各机关之设立、废止及变更；

四、制定校内各种规则；

五、委任下列各种常任委员会(委员会名称从略)；

六、审定预算决算；

七、授予学位；

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

——梅贻琦

如今我們回来了，你們請看，要換个樣子了！

當英國牛津運動初起時紐曼和他的同志們取荷馬此句題他們的詩集，我現在也用這句話來祝清華二十周年紀念　胡適

胡适为清华大学题词

八、议决教授、讲师与行政部门主任之任免；

九、议决其他重要条件。

教授会职权如下：

一、选举评议员及教务长；

二、审定全校课程；

三、议决向评议会建议事件；

四、议决其他教务上公共事项。

从这里可以看出，评议会在学校里权力很大，其成员除校长之外，都由教授会选举产生。也就是说，由梅贻琦参与制定的《清华学校组织大纲》，为教授治校奠定了颇具操作性的制度基础。



20世纪30年代的清华校门

然而，要让这一制度付诸实现也有个过程。据陈岱孙回忆，当年蒋梦麟由教育部长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曾非常明确地说："我不赞成教授治校，我的口号是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但是梅贻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后，却极力支持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并把它带到西南联大。

老清华的校长住宅



陈岱孙还说，在这一体制确立的过程中，清华大学教授们也起了很大作用。早在1929年，清华大学就成立了文、理、法三个学院，由于院长是评议会当然人选，所以院长如何产生，就成为摆在大家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按照教育部颁布的《大学组织法》的规定，院长应该由校长任命，但教授们认为校长可以任命教务长、秘书长等行政人员，却没有资格任命学院院长，因为院长是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的负责人。幸亏当时的校长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因此经过协商，双方做出让步：教授会对每个学院公推两名候选人，让校长从中选择一位。这样一来，除了校长由教育部任命外，评议会其他成员依然要通过教授会才能产生。（参见《梅贻琦先生纪念集·陈序》）陈先生所说的情况，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讲得很详细。

经过大家努力，清华大学教授会和评议会的地位大大提高，因此冯友兰说，当年清华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他还说，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其实是清华的"三级会议"——评议会好像是教授会的常务委员会，校务会议又是评议会的常务委员会。三级会议不仅权限分明，各司其职，还有严格的议事规则，以免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参见《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314-318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行之有效的操作性，为教授治校的实现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

大家在初入校时，可不必即决定入何系，最好在此一年内细细体察自己志趣所在，性之所近，究习何科较为适当，然后再决定。

——梅贻琦

"吾从众"的民主作风

清华大学是国民党推翻北洋政府以后才改为国立大学的。根据国民党的说法，中国人素质低下，不具备公民资格，只有经过训政，才能实行宪政。所谓"训政"，就是把国民党"党义"定于一尊，在文化上推行"党化教育"，在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这对于清华大学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在人们印象中，梅贻琦是个文弱书生。他不爱说话，被称为"寡言君子"。按规定，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都要由校长主持。凡是学校规章制度、年度预算、新增项目、建筑设计……都要由教授会和评

第五级毕业同学年刊

内充外腓

梅贻琦题

梅贻琦题词

议会讨论决定。据说，开会时梅校长很少说话，而是仔细听取别人意见。这是博采众议、无为而治的典型。梅贻琦说，他就像京剧中的"王帽"一样，看似重要，却不大开口，主戏要让别人来唱。有人说他有一种忘我的人格，只知有事，不知有"我"；他待人以诚，遇事都要公开讨论；如果大家意见不一，争论不休，他能用简明扼要的话指出症结所在，使问题顺利得到解决。在具体事务上，他也非常尊重大家的意见，当年数学大师熊庆来要破格录取华罗庚，他完全支持。因此朱自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清华的民主制度，……究竟还是很脆弱的，若是没有一位同情的校长支持"就不可能确立，而梅贻琦"便是难得的这样一位同情的校长"。（《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22页）

这些年来，有些人也承认大学需要大师，但是如何才能把大师请进来、留得住，却未必清楚。他们以为只要有钱，有优厚的报酬和优越的环境就能罗致人才；殊不知真正的学者更需要人格尊严、教学独立、思想自由。因此，大学校园里的民主空气非常重要。最近看到陈丹青要退出清华大学的报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陈先生是2000年被清华大学以特聘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从美国请回来的。但是回来后他却无法适应学校的招生制度、量化考核和行政化管理，多次呼吁、建言都无济于事，只好提出离去。



20世纪20年代中期，梅贻琦（右一）是清华童子军总部成员之一

蒋廷黻说，当年梅贻琦主持评议会时，通过一个教师待遇条例，其中一条规定要减少授课时间，为教师研究提供方便。蒋认为当时清华与其他国立大学的薪水相同，如果教师只看重收入，就不必到清华；如果他们看重研究的便利，就会来清华任教。这只是谈到问题的一个方面，相比之下，还是傅任敢说得好。傅先生毕业于清华大学教育系，是很有成就的教育家，担任过重庆和长沙两所清华中学的校长，解放后在今首都师大前身北京师范学院任教。他在梅贻琦诞辰60周年之际撰文说："一个大学仅仅有钱有设备是办不好的，它得有好的风气，好的教授。风气如何才能好，好教授如何才肯来呢？这是由于清华的校务真正公开，校长绝不独断独行。因为一切集思广益，进步自然愈来愈大；因为分工负责，人人均觉清华自己也有一份，所以大家工作都有兴致。……在清华，一切没有私，一切是公开。因此，学术的风气才能增进，出色的教授才肯前去。在这方面，以身作则的就是梅校长。"（《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59页）

除了奉行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原则外，梅贻琦在学校管理上还主张精兵简政。吴泽霖在上世纪80年代回忆说，当年教育部对国立大学人事编制有具体规定，但是梅先生嫌其机构重叠，人员繁多，并没有完全执行。因此清华大学从校长到教务长、训导长、秘书长、院长、系主任、图书馆馆长、体育部主任以及各级行政部门，都没有设立副职。查南京国民政府制定的《大学组织法》（1929年颁布，1934年修订），其中规定大学校长、学院院长和系主任都是只设一人。我想，吴先生的回忆之所以有误，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他对该组织法不大了解；二是有感于后来的大学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状况过于严重。

什么是体育精神

曾经担任过北大教务长的樊际昌说，梅贻琦是个只知有事，不知有我的人。他服务于清华近50年，非常关心爱护学生，先后培养出数以万计的优秀人才，这些人为学术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

梅贻琦对学生的关爱，主要体现在他的通才教育思想上。关于这

——梅贻琦

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

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

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

——梅贻琦

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

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

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



清华大学男子网球队
(20世纪30年代中期)



清华大学男子篮球队
(20世纪30年代中期)



清华大学体育活动一瞥

个问题，我在《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中做过介绍。这里我只想强调，通才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根本区别，用爱因斯坦的话来说，就是前者是要培养"和谐发展的人"，后者是想把人变成"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或者一台"会说话的机器"。陈丹青先生感叹说，如今的学生是"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我看这与多年来社会不重视通才教育有关。

除此之外，梅贻琦对学生的关爱还表现在许多方面。翻开《梅贻琦教育论著选》，有不少是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或其他活动上的讲话。比如当选教务长之后，梅贻琦对即将留美的学生说，你们到美国后，只有保持科学的态度，才能对美国有充分的了解，才能获得真正的学问。他认为所谓科学的态度是："第一不预存成见；第二要探究事实；第三要根据事实，推求真理；第四要对于真理忠诚信守。"(《梅贻琦

教育论著选》，第 4 页）这些话朴实无华，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

我注意到，在这本书中，涉及体育的内容很多。早在民国初年周诒春担任校长的时候，清华的体育活动就非常活跃。绝大多数人认为，所谓体育主要有两个功能：一是锻炼身体、磨练意志，二是夺取奖牌、为国增光。但这种认识是不够全面的。梅贻琦担任教务长以后，就明确告诉学生："须知体育之目标，不单是造就几个跑多快，跳多高，臂腿多粗的选手，不单是要得若干银盾、锦标，除此之外，也许可以说在此之上，还有发展全人格的一个目标"。（同上，第 8 页）1934 年，他担任校长后又对同学们说："青年对于学问研究，精神修养各方面，均须有人领导提倡，而体育的主旨，不在练成粗腕壮腿，重在团体道德的培养。我国古人重六艺，其中射、御二者，即习劳作，练体气，修养进德。后人讲究明心见性，对劳动上不甚留意，是以国势寝弱。吾们在今日提倡体育，不仅在操练个人的身体，更要藉此养成团体合作的精神。吾们要藉团体运动的机会，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故运动比赛，其目的不在能任选手，取胜争荣；在能各尽其可尽的能力，使本队精神有有效的表现，胜固大佳，败亦无愧。倘遇比赛，事先觉得无取胜可能，遂避不参加，忘其为团体中应尽的任务，是为根本错误。"（同上，第 62 页）

用通俗易懂的话来介绍西方成功经验，并希望现代文明的种子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是梅贻琦那一代自由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拿这些话与储安平早年写的《英国采风录》对照一下，可以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什么是真正的体育精神。



清华在体育比赛中获得的奖杯、奖状

纵使新旧院系设备尚多欠缺，而师资必须蔚然可观，则他日校友重返故园时，勿徒注视大树又高几许，大楼又添几座，应致其仰慕于吾校大师又添几人，此大学之所以为大学，而吾清华最应致力者也。

——梅贻琦

储安平说他写这本小册子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比较一下中英两国人民的性格，看看他们在做人做事方面有何异同；二是想探讨一下英国强大，中国衰弱的原因何在。书中有一章专门写英国人的个性和风度。据储安平介绍，从个性上看，英国人有许多优点，比如注重实际、不尚空谈、正直无私、含蓄幽默、讲究礼貌，坚韧勇敢等等，但是最让人受启发的还是书中对费厄泼赖精神的解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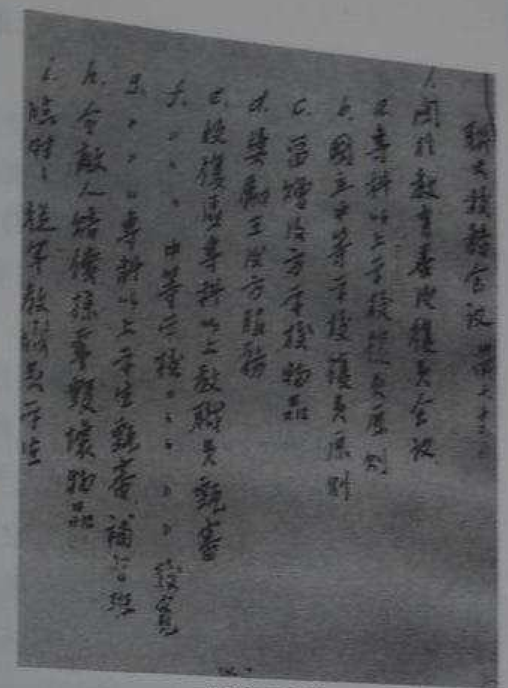

清华大学女子乒乓球队(20世纪30年代中期)

“费厄泼赖”这个词自从被鲁迅当作一篇文章的标题并入选中学语文教材之后，大家就对它产生严重的误解，这实在是莫大的遗憾。储安平说：费厄泼赖(Fair play)这个词很难翻译，它本来是体育术语，意思是说任何体育比赛都是一个整体，一场游戏(game)。因此运动员既是比赛的合作者，也是游戏的参与者，大家不仅要尊重队友的人格和存在，也要尊重对手的人格和存在，否则比赛就无法进行，游戏也玩不起来。把这种理念推而广之，就形成对英国人的一种处世哲学。储安平认为，费厄泼赖与孔子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点类似，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偏于消极，费厄泼赖却包含消极和积极两个方面。显而易见，储安平介绍的费厄泼赖精神，在足球比赛中表现得最明显。当今的中国足球落后，距离世界水平甚远，除了体制问题外，显然与运动员缺乏费厄泼赖精神有关。


清华大学女子排球队(20世纪30年代中期)

写到这里，正好看到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社会记录”专栏介绍清华跳水队的问题。该队虽然冠以清华大学四字，招收的却都10来岁

的孩子，没有一名本校学生。这样做的目的，据说是为了从娃娃抓起，以便出成绩夺金牌。然而由于政策的变化，这些成绩优秀的娃娃们丧失了参加国际大赛的机会，于是大家纷纷离去，跳水队难以为继。可见当初成立跳水队的动机就不对。然而人们谈论这件事的时候，只是就事论事，似乎并没有明白问题的根源何在。



梅贻琦手稿

储安平还说，因为有了费厄泼赖精神，英国人才能在政治上主张改革渐进，反对破坏性革命；有了费厄泼赖精神，他们才能制定一系列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让执政党和反对党在全社会监督下共同完成一场“政治游戏”；有了费厄泼赖精神，他们做人做事才会坚韧、刚毅、勇敢、平和，才不会作伪、取巧、走极端，施诡计，才有宽容异己的雅量和勇气。这也是英国人在大学里特别重视体育，并把足球当作国球的原因所在。

抗日战争中，李长之在文章中表示，梅先生说“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这句话让他非常感动。梅贻琦还对学生说：现在教书的想做官，做官的想发财；但大家要看得远一点，要有赤子之心，做一个平凡的人。由此可见，面对当今社会表现出来的以官为本、崇尚金钱、弄虚作假、轻视生命等问题，应该追究教育的责任。

廉洁奉公　两袖清风

梅贻琦被视为做人的楷模和清华精神的化身，不仅是因为他有正确的教育理念、集思广益的民主作风，更因为他有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美德。担任校长后，他主动放弃了前任校长享受的几项“特权”，其中包括免交电话费、免费雇佣家庭帮工和免费拉两吨煤等待遇。他说：“虽然款项有限，但这是个观念和制度的问题。”

直到晚年，他都要用自己的钱买办公室需要的火柴、茶叶、肥皂等物品，绝不公款私用。

清华因为环境幽雅、经费充足、设施一流，素有贵族学校之称。因此他在就职演说中除了提出著名的“大师论”之外，还告诫大家：“清华向来有一种俭朴好学的风气，这种良好的校风，我希望今后仍然保持着。”他还要求同学们平时要穿布衣布鞋，不要沾染纨绔子弟的恶习。

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初到中国时，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以及蒋廷黻、金岳霖等人交往很深。1942年他再度来到中国，为中国知识分子有抗日战争中面临的艰难生活所震惊。他在回忆录中说：“获得食物和住房，以及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成了联大教职员工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我的朋友，哲学家金岳霖，经济学家陈岱孙，英语系的夏威夷美籍华裔教授陈福田都刚刚搬到美国领事馆隔壁的老剧场露台上住，搭起了临时的活动房屋。”接下来他描述了这些活动房屋的情景：“大老鼠在纸糊的天花板上面跑来跑去，几乎从上面掉下来，于是我们谈论到买一只猫，但一只猫时价为银洋200元。”(《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19页，上海知识出版社1991年出版)在谈到蒋梦麟和梅贻琦时，作者是这样写的：“他们作为昆明高校的两位



老清华校友合影。前排右起：周象贤、梅贻琦、李鸣稣，后排右起：杨锡仁、赵元任、胡适、陈伯庄、程远帆



1941年清华30年校庆合影。右起：叶企孙、冯友兰、吴政之、梅贻琦、陈岱孙、潘光旦、施嘉炀

领袖，都是以其苦行僧形象著称的，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人物。蒋梦麟近来没为北大做什么。他已困难到山穷水尽，唯靠典卖仅剩的衣物书籍而维持生活，他的夫人现在正在设法寻找工作，而他自己则回到昆明去担任中国最高学府的校长。跟梅贻琦相比，蒋梦麟的经济境况还稍胜一筹。梅夫人化名找到一个工作，结果被发觉，只得中辍。”(同上，第271页)

费正清毕竟是外国人，尽管他的回忆大体不错，但某些字句还是与事实稍有出入。相比之下，梅夫人韩咏华有更准确的回忆。她说：

> 1938年我们把家搬到昆明。那时清华已与北大、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大。梅先生和蒋梦麟先生(北大校长)、张伯苓先生(南开校长)组成联大常委会。在昆明这一段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学校给教职工谋的福利没有三位常委的份，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先人后己吧。为了补贴家用，联大有很多教授的夫人要做一些零活。我也和潘光旦夫人、袁复礼夫人组织了一个“互助组”，自制一种名叫“定胜糕”的上海点心。糕是粉红色、形状像银锭，由潘夫人在乡下磨米粉、煮豆沙，并准备其他原料，我和袁夫人负责做成糕，再由我送到冠生园食品店去卖。冠生园离家很远，为了省钱，我总是步行，来往路程需要一个半小时。又舍不得穿袜子，光脚穿一双破旧皮鞋，把脚都磨破了，腿肿得好粗。这段日子

须知体育之目标，不单是造就几个跑多快，跳多高，臂腿多粗的选手，不单是要得若干银盾、锦标，除此之外，也许可以说在此之上，还有发展全人格的一个目标。

——梅贻琦

青年对于学问研究，精神修养各方面，均须有人领导提倡，而体育的主旨，不在练成粗腕壮腿，重在团体道德的培养。

——梅贻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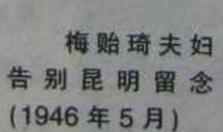
梅贻琦全家

是够苦的。但是我们选了"定胜糕"做我们生产品的名字,以表达对抗战胜利的希望和信念。(《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259页)

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前现做现卖,我碍于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夫人挎篮子卖定胜糕的事。……

月涵一向忙于校务,家里人怎样生活,是否挨饿,他全然不知。直到看见我这样狼狈,看到教授的太太们这样疲于奔命地维持生活,他才着了急,向重庆政府教育部为大家申请了一些补助。还有一次教育部给了些补助金,补助联大学生,我们当时有四个子女在联大读书,月涵却不让领取补助金。(同上,第27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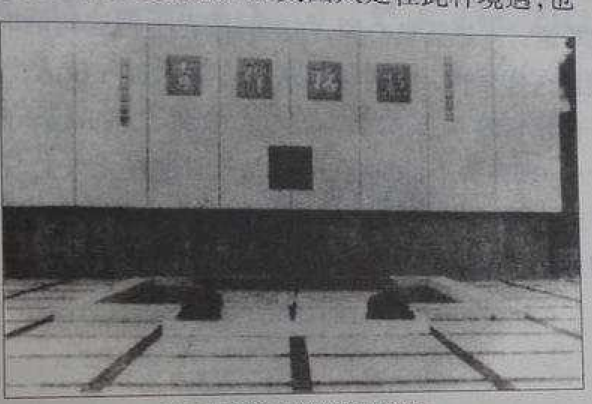




梅贻琦夫妇
告别昆明留念
(1946年5月)

此外，梅夫人还谈到她两次摆地摊的事情。

引述这些往事，是觉得抗日战争中虽然有孔二小姐带着爱犬坐飞机逃难的丑闻，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被艰苦的环境所吓倒，他们竭尽全力地维护着学术的尊严、文化的命脉和民族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征服的主要原因。正因为如此，费正清才感慨地说："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们承担的社会责任，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如果我的朋友们打破这种观念，为了改善生活而用业余时间去做木工、泥水工或铅管工，他们就会搞乱社会秩序，很快会丧失社会地位，即使不被人辱骂，也会面为人们非议的对象。"（《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69页）



位于台湾新竹的梅贻琦墓园

1948年12月北平被围困的时候，梅贻琦是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的。他走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清华基金。梅贻琦去了美国后，生活非常艰难，年过花甲的梅夫人不得不再次出去打工。后来，梅夫人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梅先生晚年病重的时候，胡适想劝他写遗嘱，好对公事私事有个交待。但是梅先生不爱听，直到去世也没有写。不过在他的病床下有一个皮包，皮包里放着什么，连梅夫人也不知道。梅先生去世后，秘书先把这个皮包封存好，然后在一个公开场合打开，大家

吾们在今日提倡体育，不仅在操练个人的身体，更要藉此养成团体合作的精神。吾们要藉团体运动的机会，去练习舍己从人，因公忘私的习惯。

——梅贻琦

学生没有坏的，坏学生都是教坏的。

——梅贻琦

一看，里面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丝毫不差。(《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318-319页)

对于这件事情,孙汉观谈得更透彻。孙先生说,当年他从美国回到台湾,曾与担任台湾清华大学教务长(后任校长)的陈可忠闲谈,陈盛赞梅先生的伟大。陈说这些年来,"清华庞大的美金收入,全由梅先生一人管理和支用,无人监督,而到今梅先生还是'两袖清风',真是了不起可钦可佩的廉洁!之后梅先生病故,一无遗产留下,更证实此语之不虚也!"

许多人听了这些故事,也许会认为梅先生确实伟大,但是孙先生却有另外一番感慨。他写道:"不过凭良心说,在当时作者听到这句话时,心中非常难过。因为那时刚从美国久住回台,在美国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位大学校长可把校款私用,公款公用是一位校长的本分,如果一位校长做到了,他只是守公守法,没有什么可特别褒扬的。……现在看来,……梅先生能长时期在无人监督的情形下不随污逐流,真是黑暗中的一颗明星。陈可忠先生认为梅先生的'两袖清风',是最高的美德,诚有极深刻的意义!也影射着我们社会美德的堕落也!"

张伯苓：
中国私立大学的拓荒者



（1876—1951）

张伯苓

中国私立大学的拓荒者

现代大学在中国只有100多年的历史。当初的大学，主要有国立（包括省立）、教会、私立三种形式。办大学需要大量资金，而学校又不能以赢利为目的，因此私立大学要比国立大学、教会大学难办得多。在这方面，张伯苓创办的私立南开大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对此，国内外有过许多评论。比如上世纪40年代后期，美国友好人士为纪念张伯苓先生70寿辰，出版过一本书，名叫《另一个中国》（应译为《这里是另一个中国》）。司徒雷登在该书《导言》中说："作为燕京大学校长，在美国我有一批潜在的赞助者。美国人习惯于响应国内和国外在教育和宗教方面的呼吁。他们了解传教士呼吁的目的。他们有相当的财富。而张伯苓没有这些优越条件。在中国，高等教育一向是由国家办理的，大学的经费是由中央政府或省政府提供的。办私立大学，张伯苓是一个拓荒者。"（《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第270–271页，山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司徒雷登毕竟是个中国通。他的比较非常准确，评价也恰如其分。

"弃武从教"的原因

张伯苓祖籍山东，1876年清明节出生于天津。据说他的祖辈曾在大运河上贩运粮油杂货，稍有积蓄后在天津开了一个店铺。因生意兴旺，其祖父和父亲都选择了弃商习儒的科举之路。不幸的是，两人多次应考都屡试不中，张家也因此走向衰落。尽管如此，张伯苓的父亲张久庵却酷爱音乐，因擅长琵琶，有"琵琶张"之誉。许多人谈到这一点，都说"张家的家道，随着张久庵的弹拨声，逐渐破落下来"。（同上，

第11页）但是胡适不这样看。他颇为同情地说：张的父亲“是一位很有成就的弹琵琶名家，又是一位精通骑术的射箭好手。把一份不小的家业消耗在生活享乐之后，张老先生迫不得已去教小学生维持生活”。（同上，第94页）到张伯苓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穷到需要母亲帮人做针线活才能度日的地步。

张伯苓从小性情刚直，聪明过人，但因为交不起学费，只能报考免费的北洋水师学堂。学堂总教习是著名思想家严复。学堂里面楼台掩映，花木参差，环境幽雅，是个读书的好地方。在北洋水师学堂的几年，是张伯苓无忧无虑、奋发学习的时候。他是学校的高才生，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在那里，他学到许多科学文化知识，接受了西方思想的熏陶，受到严格的注重实用技术的训练。可以说，这是他世界观形成的重要阶段。

按照水师学堂规定，学生修业期满，要上船实习一年。然而当张伯苓将要实习的时候，突然爆发了甲午中日战争。在此期间，他看到北洋舰队的实力虽然比日本海军要强，却被对方打得一败涂地，就连实习的军舰也没有留下一艘。无奈之下，他只好在家等候。战争结束后，他以一名下级军官的身份到通济轮服务。通济轮是战后幸存的一艘练习船，经过甲午海战，船上官兵士气低落，官不管兵、兵不管舰的状况非常严重。一些老兵给他讲述黄海大战的情景，再加上自己的所见所闻，使他对清朝海军非常失望。




敬业中学堂教室



抗日战争前夕的张伯苓

1898年，英国借日本从威海卫撤军之机，与清政府签订《威海卫租借专条》，其中规定，将威海卫一带的陆地和海岛租给英国使用。为此，张伯苓所在的通济轮奉命去刘公岛办理接收、转让手续。刘公岛是水师提督衙门所在地。在那里，张伯苓亲眼目睹了这一涉及国家主权的接收、转让全过程。所谓接收，就是从日本侵略军手中收回刘公岛等地，因而要降下日本国旗，升起清朝的龙旗；所谓转让，则是把刘公岛一带租借给英国，因而要降下清朝的龙旗，升起英国国旗。两天之内在中国的土地上"三易国帜"，使他感到极大的屈辱，并进一步看到清政府的腐败。这使他对洋务派"求强求富"的所谓现代化道路产生怀疑，也使他原有的军事救国思想被彻底粉碎。他开始思考中国落后的原因所在。后来他多次对人们说："悲楚和愤怒使我深思，我得到一种坚强的信念：中国想在现代世界生存，唯有依赖一种能够制造一代新国民的新教育，我决心把我的生命用在教育救国的事业上。"（同上，第95页）

几年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在《怀念张伯苓校长》一文中说："这屈辱的一幕使他义愤填膺，深感再不救亡图存，行将亡国灭种。他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得出结论：救国之道，不在于买船造炮，重建海军与列强周旋，而在于兴办新式学校，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所以立志终身从事教育，造就新的人才。于是他弃武从教，先在严范孙先生的家馆里教授西学，然后1904年与严范孙先生在天津南开创办新式学校，取名'南开学校'。"（《吴敬琏自选集》，第615-616页，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吴敬琏是张伯苓晚年的学生，他听到老校长讲述这段经历，仍然感到非常震撼，可见受其影响者不在少数。

从“严氏家馆”到南开大学

我既无天才，又无特长，我终身努力小小的成就，无非因为我对教育有信仰，有兴趣而已。

——张伯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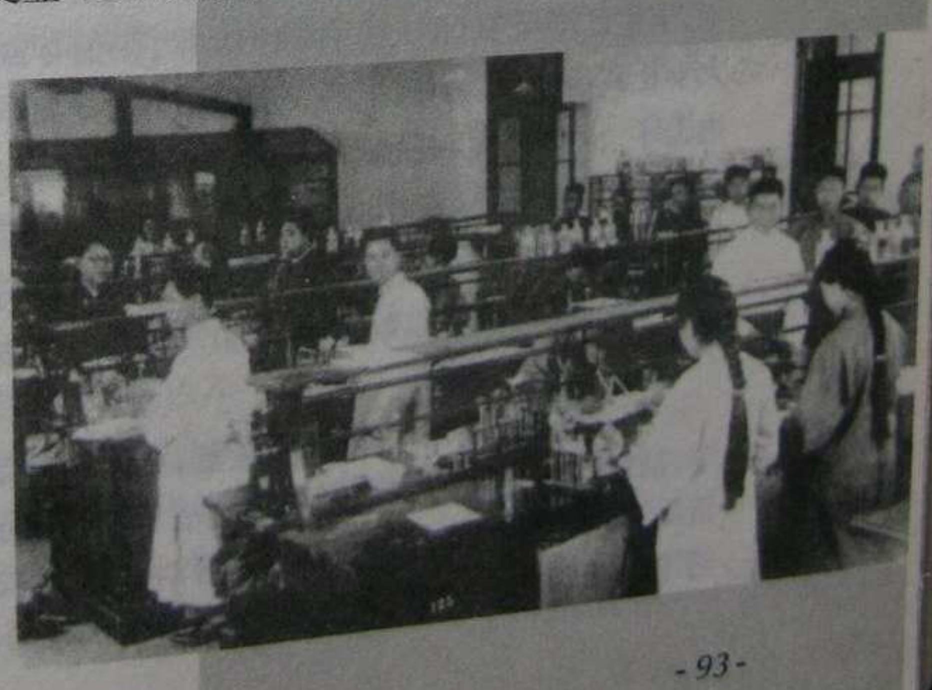
只知道压迫着学生读死书的学校，结果不过是造出一群“病鬼”来，一点用处也没有。

——张伯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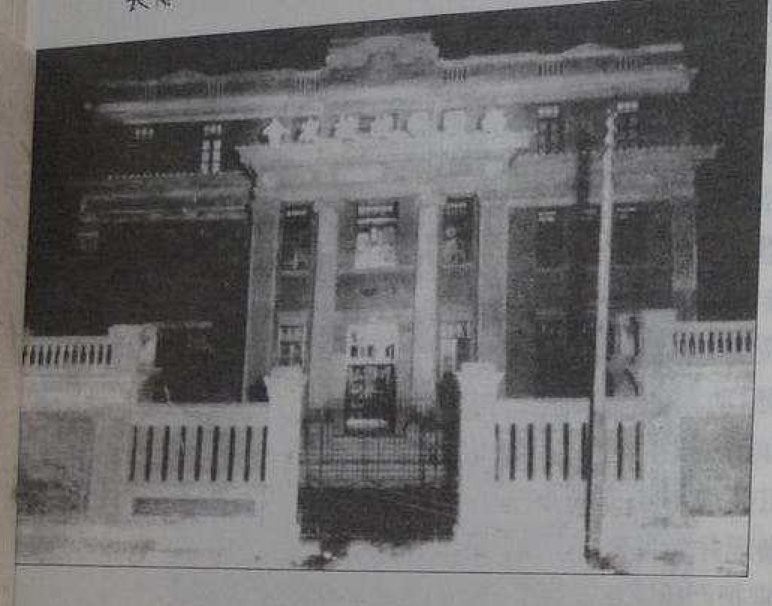
张伯苓离开北洋水师以后，遇到一位重要的人物，这就是吴敬琏所说的严范孙先生。严范孙名修，曾经担任过贵州学政，是著名的维新派人士，因提出废科举、开设经济特科等主张而享誉士林。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辞职还乡，潜心介绍新学，倡导教育事业。

为了教育自己的后代，严修在家中办了个教馆，即严氏家馆，请张伯苓前来任教。张应聘后，不是灌输四书五经，而是讲授英文、数学和自然科学等课程，并开展体育活动。最早在严氏家馆读书的只有五个人，其中就有五四时期北大的著名教授、中国社会学的奠基人陶孟和先生。1901 年，应天津绅士王奎章之聘，张伯苓同时还在王氏家馆兼课。1903 年，张伯苓赴日本参观并购买教学仪器。第二年，他与严修去日本考察教育。回国后决定把严氏家馆改为中学。

1904 年 10 月，拟议中的“私立中学堂”在严氏家馆和王氏家馆的基础上成立，张伯苓担任学堂监督（校长）。该学堂第一期招收 70 多人，其中有梅贻琦、张彭春、喻传鉴、金邦正等人。一开始，学堂设在严家偏院，三个大房间当教室，一个小房间当办公室，大厅供集会使用。学校经费由严、王两家分担，每月各出 100 两纹银。年底，私立中学堂改名为敬业中学堂，取“肃敬受业”之意。后因当局要求校名必须



南开大学思源堂



南开校友楼

表明经济来源，遂改为“天津第一私立中学堂”。为解决师资问题，学堂附设高级师范班，陶孟和等成绩优异者为师范班学生，同时在学校代课，实行半教半读。

1905 年，学生人数骤然增加，陈旧的院落不够用，当地绅士郑菊如为学校捐出城南“南开洼”10 亩土地。在张伯苓主持下，该校于 1907 年迁入新址，并改名为“私立南开中学堂”。辛亥革命后，又将“学堂”改为“学校”，学生人数也增至 500 多人。由于声誉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南开中学于 1915 年开设大专班，到 1917 年，学生已增至 1000 人左右。1918 年，张伯苓制订创办大学计划。翌年 9 月，南开大学正式成立，成为中国第一所正规的私立大学。一开始，南开大学只是在中学旁边盖了一座楼房，后来张伯苓在距南开不远的八里台购买土地 700 余亩，开始筹建大学校园。1923 年南开大学迁入八里台校园以后，开始步入正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这一年，张伯苓还创办了南开女子中学，1928 年又增设小学部，到 1932 年，南开各学校学生总数达到 3000 人左右。这时的张伯苓，真可以说是现代的孔夫子了。

1957 年被打成大右派的罗隆基，早年在一篇文章中说，他第一次听说南开中学，是在他刚从乡下来到北京，考入清华中等科的时候。他以为中国最好的学校是清华，但学校老师和同学在谈到南开时总是赞不绝口，便产生一个疑问：难道除了清华以外，在中国还有另外一个值得赞美的学校吗？他还说，第一次听到“张伯苓”

的名字，是出自一位外国女教师之口，因此他以为张伯苓是个外国人，后来才知道是个误会。因此他想："张伯苓先生这位中国人真特别。北平许多学校正欠薪欠得一塌糊涂，政府的学校都快要关门了，这位张伯苓先生有什么本事却要在这时候来办个私立大学？这不是自己对自己开玩笑吗？"（《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第106-108页）

经费的来源与使用

罗隆基的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早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大学欠薪现象就非常普遍，教师索薪风潮也时有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身无分文的张伯苓怎么敢办一所私立大学呢？也就是说，他的办学经费是从哪里来的呢？这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

从现有资料看，张伯苓的办学经费首先来自个人捐款，其次来自基金会赞助，最后才是政府补助。个人捐款是需要进行游说的，弄不好会十分难堪。在这方面，张伯苓的经历真是一言难尽。他曾经对学生说："你们大家缴付的学费，和我在外边捐来的款项，都不在少数，可是未有一文入了私囊。我虽然有时向人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同上，第153-154页）

正是这种"不觉难堪"的理念，才使他四处奔走，筹款兴学；才使不少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慷慨解囊，捐资助学。据张伯苓的儿子张锡祚说，为了办南开中学，除郑菊如先生捐赠土地外，还有"徐菊人（世昌）、卢木斋、严子均几位先生，共襄义举，集银2.6万两，建起新校舍，……转年，复得袁慰亭先生捐助，又修建了一座礼堂。到此，南开中学已初具规模"。这里所说的徐菊人、袁慰亭，就是后来当过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和袁世凯。当时他们的地位已经很高，他们的善举有很大号召力。张锡祚还说："南开中学建立后，以倡办新学，很有成效，一时社会上热心教育人士纷纷解囊捐助，因此校舍得以年年扩建，学生也年年增多。"（《张伯苓纪念文集》，第17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这是南开中学创办时的情况。

南开大学也是如此。据该校负责财务的华午晴和注册部主任伉乃如在《十六年来之南开大学》中介绍：为了筹建这所大学，张伯苓和严修征得徐世昌、黎元洪支持，又南下拜访南京督军李纯（字秀山）等军政要人和社会名流，共募集大洋8.5

万多元,作为开办费用,从而“开创了个人捐资兴办大学的新范例”。(司徒雷登语)有了这笔捐款,张伯苓于1919年在南开中学旁边盖了一座楼房作为大学校舍。第二年学校发展很快,经费问题又摆在面前。无奈之下,张伯苓只好再次南下。张组绅(又名张祖年)答应每年捐款三万元,作为矿科使用。张组绅是江苏武进人,民国初年担任过山西省财政厅厅长,当时已弃官还乡。张伯苓此行的又一收获,是得到李纯的重要承诺。这一次李纯虽然没有和张伯苓会面,却托人转话说:关于南开基金,我自有办法,请不必过虑。当时张伯苓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谁料张返回天津不到两周,李纯竟突然自杀(一说暴死),并在遗嘱中说,愿意将家产的四分之一捐给南开。有人说这笔捐赠为50万元,实际到位的只有10万元。但是据华、伉二人说,事后其家属以公债形式交付学校,南开大学“实收入87万元”。这些说法也许与当时的币值与公债的换算有关,但是无论如何,被人们视为军阀的李纯,还是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好事。因此,南开大学的“秀山堂”就是为了纪念这位将军而修建的。

1923年,南开大学要在八里台建校,美国罗氏基金团为科学馆捐助12.5万元,袁述之根据母亲意愿认捐7万。随后,罗氏基金团又多次捐助南开各项事业。1926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决定在三年内拨款10.5万元,作为扩充理科的专项经费。1927年,因经营房地产发财的卢木斋(名靖)捐资10万元修建“木斋图书馆”,于第二年落成。1929年,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再次拨款资助南开理科,南开校友总会成立后也募集8万元准备建“范孙楼”,以纪念刚刚去世的严修先生。1930年,天津绅士李典臣捐书350箱,价值50万元。同年,傅作义捐赠数百亩土地,每年可收租上万元。日本东京出版协会也捐赠两大箱图书。(参见《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第1-11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另外,从《南开大学历年捐款出入表》(1919-1935)中可以看出,当年捐款数额在5000元以上者,还有阎锡山、梁士诒、周自齐、王占元、靳云鹏、张学良、陈芝琴等人。(《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第40-44页)

胡适认为,“南开学校之所以能蓬勃发展,主要是由于张伯苓的卓越领导。他常说:教育机构的帐上应该是赤字。任何学校当局若在年终银行帐上有结余,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因为他没有能利用这些钱办件好事。张伯苓自办学那天起,个人一无所有,但他在办学上从来不怕预算超支。他的计划是向前发展。经费短缺并没有阻碍他的计划扩展。他对未来总是乐观的,他相信事情最终会成功。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能常常得到支援,使他的计划能以实现。”(《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第96页)



南开大学学生化学实验室

南开大学学生生物实验室

需要指出的是，南开虽然经费困难，但是从来没有依靠多收学生来解决经费问题。这是它与过去许多私立学校、如今许多公办学校的不同之处。

教师的延聘与培养

除办学经费之外，师资也是非常重要的办学因素。

为了延聘优秀教师，张伯苓让出身于南开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凌冰担任大学部主任。在凌冰主持下，先后来南开任教的有梅光迪（文学）、竺可桢（气象）、邱宗岳（化学）、应尚德（生物）、姜立夫（数学）、饶毓泰（物理学）、司徒月兰（英文）、蒋廷黻（历史）、薛桂轮（矿物学）、李济（人类学）、吴大猷（物理学）、杨石先（化学）、徐谟（政治学）、萧公权（政治学）、黄钰生（心理学）、何廉（经济学）、汤用彤（哲学）、萧蘧（经济学）、李继侗（生物学）、张忠绂（政治学）、陈序经（经济学）等人。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南开大学的实力。

平心而论，在声望、条件和经费等方面，南开不如清华、北大，但是与其他大学相比，南开大学还是相当有吸引力的。何廉说，1926 年他从美国学成回国，刚到日本，就收到南开大学的教授聘书，月薪

180元。在此之前，他还收到暨南大学的聘书，月薪300元。权衡之后，他还是选择了南开。他觉得，由于京津地区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教育水准比其他地方更胜一筹，因此他还是选择了薪水较低的南开。


张伯苓(后左)与父亲张文庵

说到教育水准，首先要看教师的水平。据说早在南开大学创办的时候，美国罗氏基金团前来参观，听了邱宗岳先生讲授的化学课以后惊叹不已，随即为拟议中的科学馆捐款12.5万元。南开的理科因为实力雄厚，也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支持。到1948年中央研究院举行第一届院士选举时，在81名院士中，出身于南开的就有姜立夫、饶毓泰、吴大猷、陈省身、殷宏章、汤用彤、李济、陶孟和、萧公权等9人。到了台湾后，又增加了萧公权、蒋廷黻、梅贻琦、钱思亮等人。

对于一所大学来说，要想组建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不外乎两种途径：一是重金聘请，二是自己培养。南开没有更多的钱聘请著名教授，只能选择第二种途径，这其实是一条更好的道路。后来担任过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著名物理学家吴大猷说："我以为一个优良的大学，其必需条件之一，自然系优良的学者教师，但更高一层

南开大学教职员住的百树村



的理想，是能予有才能的人以适宜的学术环境，使其发展他的才能。从这观点看，南开大学实有极高的成就。”（同上，第117页）他还说，上述许多人就是在南开成长起来的。南开大学不仅培养出一大批优秀学生，也造就了许多学术大师，这是它对中国教育的一大贡献，却被许多人忽略了。

对于南开的学术环境和人际关系，何廉有也比较详细的描述——

第一，张伯苓的人格魅力给了他很深的印象。他说，张先生高大魁梧，质朴真诚，认真负责，乐观热情。交谈中，他总是全神贯注地倾听对方说话，很少开口。熟悉之后，“我与他的交往发展到十分亲密的程度，……（他）成了鼓舞我工作的动力。”

第二，南开的人际关系令人神往。何廉说：“教员之间意气相投，关系十分融洽。除去讲授中文课和中国文学课的教师外，所有的教员都是从美国‘留学生’中延聘的。大家都很年轻，平均年龄30岁左右，其中大部分在美国就是朋友了。行政部门的人员大部分是张伯苓在南开中学的学生，是在长时期为学校服务中提拔起来的。他们对学校和校长都忠心耿耿，工作埋头苦干，极其自觉而且工作能力很强。”何廉就是在这种氛围中开始其学术生涯的。他认为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他是很好的激励。

第三，简朴而充实的生活让人感到满足。与其他大学相比，南开的工资是比较低的。但由于它从不拖欠教师工资，因此许多人愿意选择南开。另外，为了弥补工资较低的缺憾，南开的房租很低，再加上社交活动很少，不正当的消费几乎没有，因此何廉认为“校园的气氛可谓简朴、安定、满足”。（同上，第123-124页）

正因为如此，南开的教师都以一种全力以赴的献身精神在工作，他们用心专一，从来不到别处兼职挣钱，这符合潘光旦所谓“应当给教师一点宁静”的观点，也是南开取得成功的一个原因。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情况开始有所变化。当时罗家伦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把清华基金从外交部争取回来，用以改善教师待遇和教学环境，南开的许多著名教授因此去了清华。张伯苓深知南开虽然竞

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
——张伯苓

为国家，为南开，当再努力十二年，至八十岁再退休。
——张伯苓



张伯苓与教职员一起就餐

争不过清华、北大，但他坚信私立大学应该在教育界占有一席之地。他提出："我们有必要竞争吗？我们难道不应当决定停止竞争，争取互相合作，同心协力，取长补短吗？"（同上，第128页）经过认真研究，张伯苓决定发挥地处天津的优势，成立经济学院，并实行教学、研究并重的管理体制，经过几年努力，"学经济到南开"成为人们的共识，南开的声望也大大提高。

"允公允能"的教育思想

关于张伯苓的教育思想，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爱国教育、民主教育、实用教育、科学教育等等，真是见仁见智，五花八门。然而最能体现其教育思想的还是他在南开校训中提出的"允公允能"四个字（南开校训为"日新月异 允公允能"）。《诗经·鲁颂》中有"允文允武"句，"允公允能"显然脱胎于此。据孔颖达解释，"允文允武"是"既有文德，又有武功"的意思。因此用张伯苓的话来说，"允公允能"就是要培养学生"爱国爱群之公德，与夫服务社会之能力"。

对于张伯苓的教育思想以及"允公允能"的深刻含义，在台湾的南开校友雷法章有过精辟而精彩的解释。他说："'公'、'能'教育的内容可以说是熔社会教育与

个人教育于一炉的教育。前者是一种社会道德的培养，而后者则是一种个人能力的锻炼。因此它的宗旨是：不仅要求受教者能充实个体，同时它还进一步的要求个体的充实，不为己用，而应该为公为国，为人群服务。在以往，一般人常常指责政治风气贪污腐化，如果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了解贪污的由来，是不知有'公'；腐化的原因，不外无'能'。如果我们以往的教育都能切实注意到'公'、'能'并重观念的培养，那么，或许社会上依法腐化的风气，将可日见肃清。"这些话说得多好啊！贪污的由来，是不知有"公"；腐化的原因，不外无"能"。这就是张伯苓提倡"允公允能"的原因。换句话说，贪污腐败的盛行，除了制度不良外，也是教育的失败。张伯苓还有一句名言："一个人只有到死的时候，才会腐化，活人是不应当腐化的。"（同上，155-157 页）这话对于那些不知有"公"，不外无"能"之辈，应该是当头棒喝。

南开的管理非常严格。学校不仅重视基础知识的学习，还规定学生不许蓬头垢面，不许体态放荡，不许言语粗野，不许奇装异服，不许随地吐痰，更不许饮酒、吸烟、赌博、早婚、冶游，考试不许作弊。据说校内每幢楼的门厅内都有一面大镜子，上面都刻着这样的箴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纽必结；头重正，肩重平，胸重宽，背重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张伯苓认为，中国传统教育的最大缺陷是死读书。他反对把学校办成单纯灌输书本知识的场所，反对让学生成为知识的俘虏。他说："只知道压迫着学生读死书的学校，结果不过是造出一群'病鬼'来，一点用处也没有。"（同上，第 31 页）许多人在回忆张伯苓时都谈到两件小事：一是他不许学生吸烟，但自己却吸旱烟。当学生指出时，他将烟袋一折两段，从此不再吸烟。二是他年轻时留着胡子，为了给学生做表率，他的胡子越来越少，最后干脆全部剃掉。

在张伯苓的倡导下，南开的学生会（即学生自治会）非常活跃。学生会不是学校的御用组织，而是学生自己管理自己的机构。据 1948 年南开大学学生自治会编印的一份材料反映，当时这个组织已经趋于成熟，机构也比较完备。根据章程规定，该会最高权力机构是全体学生大会，立法机构是系级代表大会，执行机构是理事会。理事会从系级代表中提名，由全体学生普选产生。这份材料有一段话描述当时的选举盛况：

在每学期改选的时候，规定几天为提名日；提名截止后，接着便是竞选日了，为期大约四五天。这几天是每个学期最热闹、最紧张，也是最令人兴奋



张伯苓题签的《南开同学录》

的日子。竞选的方式不胜枚举。整个学校都被笼罩在民主活泼的空气里。无论你走哪一条甬道，你都会看见两边墙上贴满了数不清的竞选海报——大至几丈长的画像和标语，小至书签一样的传单，甚至在往来于东院、南院之间的校车上，你也能看见"请选某某同学一票"的红绿标语。在这些竞选广告上面，推荐的同学尽量告诉大家他们所推荐者的能力和才干，而自己出来竞选的同学也都真诚地倾吐出他们的抱负和理想。竞选最后的晚上，有一个竞选演说晚会，在那儿，同学们用演说、歌唱等方式来学习这民主的一课。(《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第 439-440 页)

这种情况与南开"允公允能"的教育宗旨是完全吻合的。因为南开大学的目标是要为现代社会培养公民，而不是为传统社会培养顺民。公民与顺民的最大区别是，前者要求自治，后者需要被治。张伯苓深知今天的学生就是明天的公民，如果他们在学校里没有养成独立的人格和自治的习惯，那么这个国家是不会有希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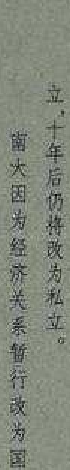
丰富而活跃的校园生活

除了学生自治会以外，各种各样的学生社团也非常活跃。早年的南开大学，属于研究学问的有文学会、教育研究会、政治学会、哲学会、科学会、经济学会、商学会、星会、寻光会、英文学会、国语演说会等等；属于服务类的有毕业同学会、校役夜校、平民学校、各省同乡会等等；属于文化娱乐型的有音乐会、唱歌会、新剧团、旧剧研究会和各种临时性游艺会。此外还有各种类型的运动会、考查团和旅行团等临时性组织。

成立这么多学生社团有什么作用呢？第一，它可以培



严修(二排右九),张伯苓(二排右七),黎元洪(二排右十),卢木斋(二排右十一)与学生合影




南大因为经济关系暂行改为国立，十年后仍将改为私立。

——张伯苓

养学生的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学校里有那么多社团，可以让学生在团体活动中找到各自的兴趣所在。曹禺小时候本来想学医学，考入南开大学后读的是政治学。但由于他在南开中学就受到话剧的熏陶，还是在话剧创作上取得巨大成就。第二，它可以抵制功利主义的影响，改变读死书、死读书的学风。1921 年科学会成立时，大学部主任凌冰到会祝贺。他说："本大学自开学以来，学生均忙于功课，是以课外组织颇少，今日诸君自动的组织之科学研究会，实胜庆幸。研究学问要自动的研究。研究科学，要为科学而研究科学。不可杂以实用的思想，研究科学要问'怎样'——How，不可问'为什么'——Why。因为研究科学若问'为什么'，一定引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而为科学进步的阻碍"。(同上，第 446 页)凌先生的意思，是说研究科学是没有理由的。如果事先设定一个堂而皇之的目的，反而容易把科学引上歧途。第三，它有利于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取长补短，增进友谊，从而培养一种合作向上不断进取的团体精神。

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南开事业是无止境的，发展是无限的。让我们拿出以往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同心协力，使南开在建设祖国的事业中，成为重要的一员。

——张伯苓

在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中，张伯苓的表现给同学们留下深刻印象。早在辛亥革命之前，张伯苓就把话剧当作练习演说、改良社会的

一种好形式。为此，他自编自导自演了南开公演的第一个话剧《用非所学》。该剧写了一个从欧美留学归来的贾有志，他本来抱着“工程救国”的理想，却在名利诱惑下混迹于官场，成为学非所用，用非所学的典型。多少年后，人们还是对它的现实意义给予高度评价，并说张伯苓“可谓我国话剧第一人”。（《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第58页）从此以后，每逢校庆南开都要上演话剧。另外，张伯苓的弟弟张彭春在戏剧理论和创作上贡献很大，也是南开出身的大师级人物。

张伯苓对体育极为重视。他曾经促成第一届远东运动会的召开，并担任在上海举办的第二届远东运动会总裁判。他还担任过华北体育运动会会长，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会长，国民政府教育部体育委员会委员以及许多大型运动会总裁判。至于学校运动会的总裁判，更是非他莫属。了解这些情况的人都说，张伯苓先生对中国现代体育运动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他的领导才能与精神感召力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南开的体育，在抗日战争前是很有名的。从校史资料看，在球类方面，它有“执全国牛耳”并号称“五虎”的篮球队，有“雄视华北”而且是“球输精神不输”的足球队，还有至今在许多公立大学都很少拥有的垒球队、棒球队、网球队。在田径方面，南开曾多次参加远东运动会、华北运动会等国际国内比赛，并获得许多锦标。这一切，与张伯苓对普及体育活动、弘扬体育精神的深刻理解分不开。他说：“我提倡运动目的，不仅在学校，而在社会；不仅在少数选手，而在全体学生。学生在校，固应有良好运动习惯；学生出校，亦应能促进社会运动风气。少数学生之运动技术，固应提高，全体学生之身体锻炼，尤应注意。最要者学校体育不仅在技术之专长，尤重在体德之兼进，体与育并重，庶不致发生流弊。”（同上，第65页）

为了让同学们在运动中获得身心的愉悦，张伯苓提倡“仁侠”的运动精神。“仁侠”精神的含义很丰富，简单说就是在运动中要有诚实公平的态度、光明磊落的行为、胜不骄败不馁的作风。他认为，在比赛中获胜固然重要，但千万不要使用不道德的手段。因此他反复告诫学生：“正当的失败比不正当的胜利更有价值”。（《南开大学校史资料选》第547页）这正是体育精神的真谛所在。

此外，南开的“壁报生活”也很活跃。据统计，1947年全校有20多个壁报社团，其中有系办的，也有社团办的。有三日刊，有周刊，也有旬刊。这些壁报为大家提供了寻求真理、发表意见的园地，“完全是青年人爱民主、爱真理之表现”。（同上，第466页）

“有中国，必有南开”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违背国际公约，公然派飞机轰炸南开大学。随后，日本兵又进入校园到处放火，使学校变成一片废墟。1937年7月31日，《中央日报》报道说：“两日来日机在天津投弹，惨炸各处，而全城视线，犹注意于八里台南开大学之烟火。缘日方因29日之轰炸，仅及两三处大楼，为全部毁灭计，乃于30日下午三时许，日方派骑兵百余名，汽车数辆，满载煤油到处放火，秀山堂、思源堂(以上两大厦均系该校之课堂)、图书馆、教授宿舍及邻近民房，尽在烟火之中，烟火10余处，红黑相接，黑白相同，烟火蔽天，翘首观火者，皆嗟叹不已。”(同上，第82页)

日本军队为什么对南开大学下此毒手呢？这与他们对南开的特殊忌恨有关。

早在1916年，张伯苓曾在沈阳作了题为《中国之希望》的演讲。出于好奇，张学良听了这次演讲。在谈到中国面临的危机时，张伯苓说：“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国就亡不了。我们必须有这么想的气概，不管人家怎么说，自己要有这种信念！”这些话使十几岁的张学良感到强烈的震撼。后来他谈到这一经历时说：我能有今天，全是张校长当年的话起了作用。

1927年，日本窥视东北的野心日益明显，张伯苓到沈阳、大连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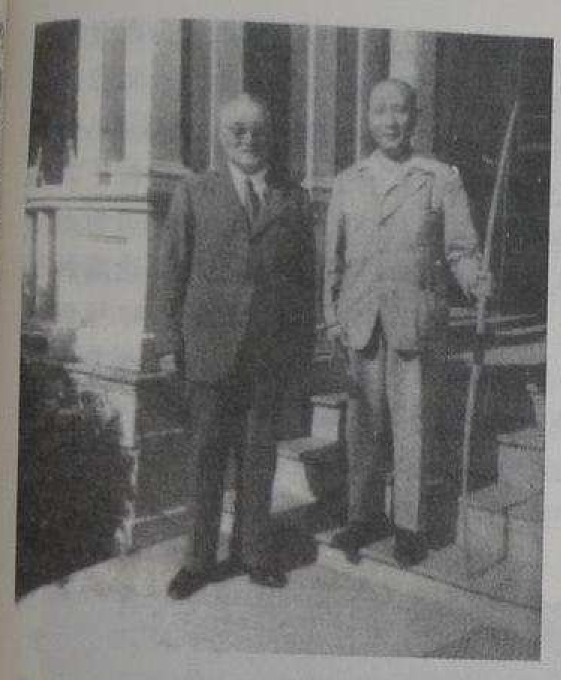
木斋图书馆

察后，在南开大学成立“满蒙研究会”（后改为东北研究会）。研究会的活动得到张学良的支持。毕业于南开中学的著名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在东北研究会主持下，编写了一本《东北经济地理》教材，非常系统地介绍了东三省的自然和人文地理。何先生认为：“这本教材无疑义地是当时国内有关东北地理有限著作之中最好的一部。……南开中学能如此爱国，编印出专门教材，开一专门新课——这个纪录，可以向近代世界各国所有的中学‘挑战’。”（同上，第 392 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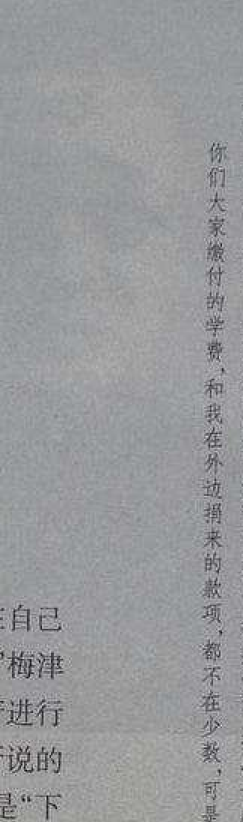
1930 年，张学良改组东北大学，张伯苓派出身于南开、后来又留学英国的宁恩承前去担任执行校长，这对张学良帮助很大。在这前后，张学良也捐赠土地、巨款，支持南开大学。“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大学迁入关内，南开大学接收该校不少学生。当时，张伯苓还出任天津抗日救国会领导职务，积极组织声援东北同胞的活动。长城抗战期间，他又多次派学生去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并亲自写信鼓励他们努力杀敌，为国争光。西安事变爆发后，张伯苓致信张学良，希望他以大局为重，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危机。

值得一提的是，1934 年第 18 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召开，“南开啦啦队”在看台上突然打出“勿忘国耻”、“收复失地”的标语，并发出激越的呼喊。全场三万多人为之震惊，并报以震天动地的掌声。当时日本驻天津的最高长官梅津美治郎就坐在主席台上，他当即向运动会

南开大学被日军炸成一片废墟



张伯苓与胞弟张彭春



你们大家缴付的学费，和我在外边捐来的款项，都不在少数，可是未有一文入了私囊。我虽然有时向人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

——张伯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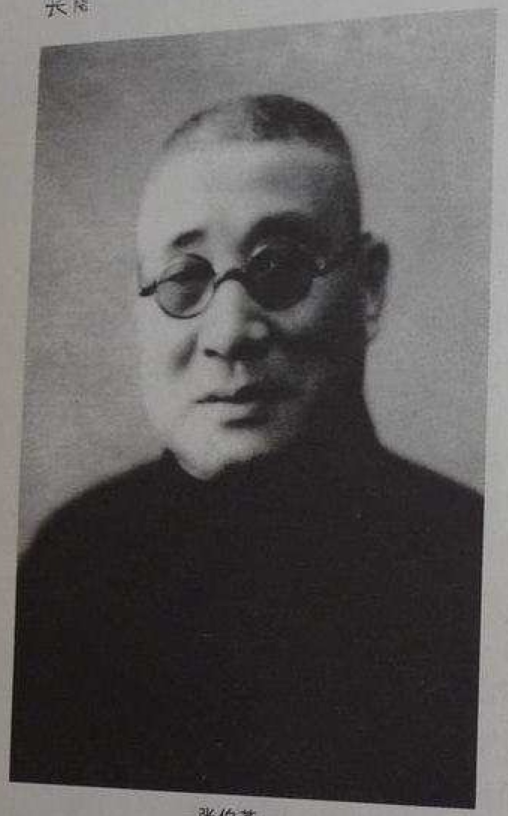
我们有必要竞争吗？我们难道不应当决定停止竞争，争取互相合作，同心协力，取长补短吗？

——张伯苓

副会长兼总裁判张伯苓提出抗议，但张伯苓反驳说："中国人在自己的国土上进行爱国活动，这是学生们的自由，外国人无权干涉。"梅津愤然退席后，向天津当局提出抗议。日本驻华使馆也向南京政府进行交涉。据说当局要张伯苓管束学生，于是张把学生领袖召来，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讨厌"；第二句话是"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是"下次还这么讨厌"，但"要更巧妙地讨厌"。(《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第 46 页)此外，驻扎在八里台附近的日本军队经常骚扰南开大学，双方还发生过较大冲突。这显然是日本侵略者对南开恨之入骨的原因。

对于南开面临的危险，张伯苓早有预料。1935 年他去南京，在南开校友聚会时说："'九一八'以后，尤其何梅协定签字以来，平津一带随时可有战局。同学们固应爱护母校，但尤应爱国。天津如被侵袭，早受日人嫉恨的南开学校，其遭遇破坏自属必然。但我们不可因此对抗日有所顾虑。南开学校与国家比，实不算顶重要。有中国在，则南开纵使遭到破坏，何患不能恢复。"(同上，第 302-303 页)南开校园被毁后，蒋介石对张伯苓说："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就有南开。"可见在抗日问题上，二人的意见多么一致。张伯苓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

"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张伯苓纪念文集》第 261 页)后来，蒋介石所说的"有中国就有南开"，曾经广为流传。这句话，他好像反复说过。南开校友黄贤可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每逢南开校庆，蒋介石都要亲临祝贺。1944 年校庆时，他看到蒋介石到重庆南开中学探望张伯苓，临走时，他清楚地听到蒋介石对张伯苓大声说："有中国就有南开在"。(《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第 264 页)



张伯苓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南开大学与北大、清华在长沙共同组建临时大学，随后又转移到云南，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为国家保存了学术文化命脉，谱写了中国人在抗日战争中弦歌不绝的佳话。在这方面，允公允能、愈挫愈奋的南开精神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办学五十年，美名传天下

其实，早在 1935 年张伯苓就因为华北形势紧张，想把南开迁往四川。当时他利用开会之机到重庆考察，决定在沙坪坝建立分校。第二年年初，张伯苓赴南京筹款，蒋介石表示支持，并认捐 5 万元。这样一来，各级官员如孔祥熙、张群、刘湘等政界要人以及社会名流都纷纷捐款资助。当年 8 月，重庆南渝中学(后改名重庆南开中学)正式建成，张伯苓自任校长，并成立

南渝中学董事会，张群、吴鼎昌、卢作孚、胡子昂等人担任董事。

1938年4月西南联大成立后，张伯苓与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担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共同负责学校工作。不过，自从当年7月张伯苓出任国民参政会副议长之后，他的主要精力就放在了国民参政会方面。国民参政会是抗战期间成立的一个具有战时国会性质的机构，其成员为社会各界的领袖人物。张伯苓以私人力量办学数十年，能够获此殊荣，可谓名至实归。尽管如此，他还是身在江湖，不忘教育。1940年，他在病中对南开同人说："我个人一生从事教育，此志不渝，虽近因参政会事和政治发生关系，但绝不忘掉本身事业。"1943年4月5日是他68岁（虚岁）寿辰，他还立下这样的誓言："为国家，为南开，当再努力12年，至80岁再退休。"（《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第306-307页）



张伯苓夫妇

这时的张伯苓，已经是誉满中外的教育家了。1942年10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派代表威尔基来中国访问，专门参观了重庆南开中学。他回国后撰写《天下一家》，高度评价了张伯苓的办学成就。

1944年月1月，国民政府为褒奖张伯苓终身从事教育所取得的成就，向他颁发一等景星勋章。

同年4月，著名教育家陶行知为张伯苓祝寿时，引用蒋介石的话写了一首贺诗："'有

中国必有南开'，满园桃李一手栽。从心所欲不逾矩，凯歌重上八里台。"从感人的诗句中不难看出，人们早已把张伯苓的奋斗精神与抗战必胜的信念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宣布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张伯苓仍然担任校长。但是张伯苓向蒋介石表示：南开大学"愿仍以人民社团立场，继续努力，以贯彻为国服务之初衷"。后来他还说："南大因为经济关系暂行改为国立，10年后仍将改为私立。"

人们对张伯苓不愿意把南开变为国立大学作过种种解释，比如说不愿意受蒋介石控制等等，实际上都有误读之嫌。一所大学由私立变成国立，不仅经费有了保障，而且地位大大提高；这本来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是为什么张伯苓却要坚持改为私立呢？这与他要通过自己的努力，以民间办学的方式，"贯彻为国服务之初衷"有关。事实上，不用说社会发展到今天，就是在古代，中国也有"学在民间"的传统。也就是说，如果无视民间的力量，什么事情都由政府包办，不但不会把事情办好，还会挫伤个人的爱国心和积极性。国外的许多私立大学，都办成世人仰慕的名牌大学，就是这个道理。因此张伯苓要走的也是这样一条道路。他希望大家都要对社会尽一份义务和责任，而不要把什么事情都推给国家，由政府来包办。对于这个问题，缺乏"允公允能"精神的人，以及没有现代社会理念之辈，是不会理解的。


张伯苓先生

1946年，张伯苓赴美国治病，被哥伦比亚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6月9日，南开旅美校友会70余人在纽约集会，为张伯苓补祝70周岁大寿。会上，老舍、曹禺朗诵亦庄亦谐的长诗一首，歌颂了老校长的伟业，表达了大家对他的钦佩——

知道有中国的，
便知道有个南开。
这不是吹，也不是嗙
真的，天下谁人不知，
南开有个张校长?!

不是胡吹，不是乱讲，
一提起我们的张校长，
就仿佛提到华盛顿，
或莎士比亚那个样。

虽然他并不稀罕作几任总统，
或写几部剧教人鼓掌。
可是他会把成千论万的小淘气儿，
用人格的薰陶，
与身心的教养，
造成华盛顿或不朽的写家，
把古老的中华，
变得比英美还更棒！
……

诗中还写到日本鬼子对张伯苓恨得要命，他们甚至说："有这老头子，我们吃天津萝卜也不消化！"但是，在南开校园被毁后，老校长"抹一抹鼻梁"说："哼！咱老子还有昆明和沙坪坝！"(《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第249-253页)

1947年1月，美国加利福尼亚某大学还授予张伯苓名誉法学博士学位，第二年，上述《另一个中国》在美国出版，胡适著文全面介绍了南开的诞生经过。在文章最后，他引用了张伯苓的一段话："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南开事业是无止境的，发展是无限的。让我们拿出以往的勇气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同心协力，使南开在建设祖国的事业中，

提倡运动目的，不仅在学校，而在社会；不仅在少数选手，而在全体学生。学生在校，固应有良好运动习惯；学生出校，亦应能促进社会运动风气。少数学生之运动技术，固应提高，全体学生之身体锻炼，尤应注意。

——张伯苓

每个人都要自强，只要人人有了自我，中国就亡不了。

——张伯苓



抗日战争时期,张伯苓与邓颖超(右一)等校友合影

成为重要的一员”。(同上,第 97 页)

晚景凄凉与遗嘱之争

然而,未来是否就像张伯苓希望的那样呢?

1948 年 3 月,张伯苓回到阔别多年的南开大学,还对未来充满希望。在巡视校园以后,他对记者发表谈话说:“49 年前,因感于帝国主义之压迫,而决心从事教育。初与严范孙先生办学,学生不过 5 人,今日南开学生已不可胜计,中国经此次抗战,不平等条约终获解除,此即为余数十年前办学之目的。”他还说,我深信中国前途非常光明,因为中国人有智慧,能吃苦,又有古老的文化传统。这个文化传统与各国比较虽然各有短长,但我们决不能丢弃。(同上,第 310 页)

正当张伯苓全力以赴重建南开的时候,蒋介石邀请他出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并辞去南开大学校长。考试院院长本来想请胡适担任,但胡适执意不肯。尽管张伯苓再三推辞,却还是拗不过蒋,只好勉强赴任。行前,他召集骨干教师嘱咐两点:其一,本校各院系聘请教师,素有和衷共济精神,今后也应该如此;其二,本校私立时代,节省人力,用人少而效率高,如今改为国立,也要保持这一传统。可见他念

兹在兹的还是“私立”二字。

前南開學校校長
張伯苓病逝
遺囑友好同學擁護人民政府

【本報訊】前南開學校校長張伯苓，於本月二十三日下午六時半病逝。張氏生前友好，將於日內召開追悼會。張氏臨終前，曾留有遺囑，茲錄全文如下：

一八九七年，余憤於帝國主義之侵略，因嚴範孫先生之啓發，從事教育，五十年來，矢志未渝。凡余所曾致力而未達之科學教育，體育教育，愛國教育，以充公共能，日新月異，與我同學共勉者，今皆在人民政府之下，一一見諸實施。余所致力之南開大學，南開中學，重慶南開中學，在人民政府之下，亦將[illegible]進步發展。今日之人民政府為中國前所未有之良好政府，其發展生產、友好[illegible]之政策，[illegible]英明正確之政策。凡我友好同學，尤宜[illegible]，合力團結，為公為國，擁護人民政府，以建設[illegible]之新中國。[illegible]民光明前途，余將含笑待之。友好同學，務共努力。

張伯苓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三日

大陆报纸报道张伯苓先生遗嘱

张伯苓是在 1948 年 6 月内战最激烈的时候出任考试院院长的。大概是由于时局和身体的双重原因吧，他在南京呆了不到半年，就飞往重庆养病。一年后，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追击下，先迁广州，再迁重庆，但还是难以立足。这时蒋介石父子多次动员张伯苓前往台湾或美国，张以衰老多病为由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据说，当时傅作义曾向周恩来反映张伯苓还在重庆，周便托人给张捎来“老同学飞飞不让老校长动”（同上，第 260 页）的书信，从而坚定了张伯苓留下来的决心。

1950 年 5 月，张伯苓从重庆返回天津时路过北京，他在老朋友傅作义家逗留好几个月。“之所以如此，是周恩来考虑到张伯苓即时返津，可能会遭到激进学生的斗争。”（《张伯苓的最后五年》，《逝去的大学》第 72 页，同心出版社 2005 年版）事实果然如此，当张伯苓于同年 9 月中旬返回南开时，南开大学的一些激进师生对他并不欢迎。有的人认为



张伯苓先生逝世

学校体育不仅在技术之专长，尤重在体德之兼进，体与育并重，庶不致发生流弊。

——张伯苓



1979 年举行的张伯苓先生骨灰安放仪式

他是战犯,没有按反革命分子去政府登记就已经是宽大处理了。张伯苓对于大家的态度似乎不大甘心,他提出想到校园里暂住一段时间,想见见自己的学生,但有关方面没有任何反应。

如果说这些遭遇对于"愈挫愈奋"的张伯苓还可以忍受的话,那么下面的情况对于这位古稀的老人来说,则是致命的一击。这年10月17日是南开46周年校庆,张伯苓很早就做好了参加校庆活动的准备。但是到了那一天,"南开中学不允许他进入,而南开大学也只安排他在相关活动中坐一般座席。自此,他变得沉默孤独,常常呆坐在居室,以手击头,神情颓丧,叹息不已,自感平生工作全被否定……"(同上)显而易见,在这种情况下,他的精神世界遭到了毁灭性打击。

经过一个凄凉而漫长的冬天,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与世长辞,享年75岁。前几年他立下的"为国家,为南开,当再努力12年,至80岁再退休"的誓言,也未能完全实现。

张伯苓去世后,有几件事非常蹊跷:一是国内媒体的反应十分冷淡,即使是周恩来亲临吊唁,也未公开报道;二是直到张伯苓逝世之后44天,追悼会才正式举行;三是在张伯苓身后,居然出现大陆版和台湾版两份遗嘱。

关于第一件事，媒体的反应说明它们的功能已经发生变化，《大公报》所代表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至于周恩来的活动为什么没有报道，还有待于相关档案公开后才能了解事情真相。

关于第二件事，显然与前一件事有关。有意思的是追悼会既不在南开大学，也不在南开中学，而是在南开女中的礼堂举行。悼词由多年担任南开大学秘书长的黄钰生宣读，也可以看出其规格已经降得很低。悼词开头有这样的话："这个追悼会，适应了许多人感情上的要求；这个追悼会，可以起团结和教育的作用。"(《张伯苓与南开大学》，第273页) 这些话似乎暗含着某种难言之隐。悼词还列举张伯苓读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之后的感悟，并且申辩道："有人说，张伯苓没有形式地向人民低头"，但是他已经"向人民意志的代表——毛主席低头了，在他的遗嘱里他已向人民政府低头了。"这些话显然是犯忌的，诚如下文所说，所谓没有"向人民低头"云云，至少是周恩来说过的话。因此这个悼词只能散发些油印品，直到30年以后才公开面世。

至于第三件事，则需要多说几句。据黄钰生介绍，大陆版的张伯苓遗嘱是由他执笔的。他说：张校长是1951年2月14日中风的，当时已经"口角歪斜，不能说话了，但神智还清楚"。有人提议应该为校长写一个遗嘱，"比较起来，我和张校长最接近，在南开的时间也较



张伯苓遗体于1951年3月4日下葬

久，所以大家推我起草”。他还说：“在伯苓先生逝世前三四天，我拿了遗嘱草稿，读给他听，那时他虽然不能说话，但听力还好，心里也很清楚。我一段一段地念，他一段一段地表示同意；念完全篇之后，他挑大姆指，表示赞赏。”（《张伯苓纪念论文集》第40-41页）当时在场的人，除了张伯苓的家属和黄钰生之外，没有其他人。

尽管遗嘱对新政权予以高度评价，说：“今日之人民政府为中国前所未有之廉洁的政府，其发展生产，友好苏联之政策，实为高瞻远瞩之政策。凡我同学，允宜竭尽所能，合群团结，为公为国，拥护人民政府，以建设富强康乐之新中国。无限光明远景，余将含笑九泉以待之。”但是对于这份遗嘱，周恩来在审读时还是表示遗憾。他说：“可惜少了两句话，即张伯苓应表示悔过，向人民低头。”这也许是追悼会迟迟不能召开的原因，同时也是悼词中着重申说的一个内容。

据说台湾版遗嘱的落款日期是“中华民国四十年二月二十二日”，即张伯苓逝世的前一天。黄钰生把这份遗嘱斥为伪造。他举例说，其中有些骈体排比的句子，比如“惟始皇阴狠，秦廷终于覆亡；巢闯跳梁，沐猴宁能成事？”显然“不是张伯苓先生的口吻和笔调”。但台湾方面也有人质疑大陆版的遗嘱是否张本人的意愿。

除了这些众说纷纭的历史之谜之外，唯一不用争论的是：张伯苓走了，连同造就他的那个时代。尽管今天的人们对张伯苓当年办学的理解还会有这样那样的差异，但老校长的杰出贡献和道德精神已经是世所公认的了。

竺可桢：
管天的人如何管大学



(1890—1974)

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先生一生的贡献主要有两个：一在科学领域，二在教育方面。关于前者，由于知识有限，我不敢妄加评论，但是对下面的传闻却印象很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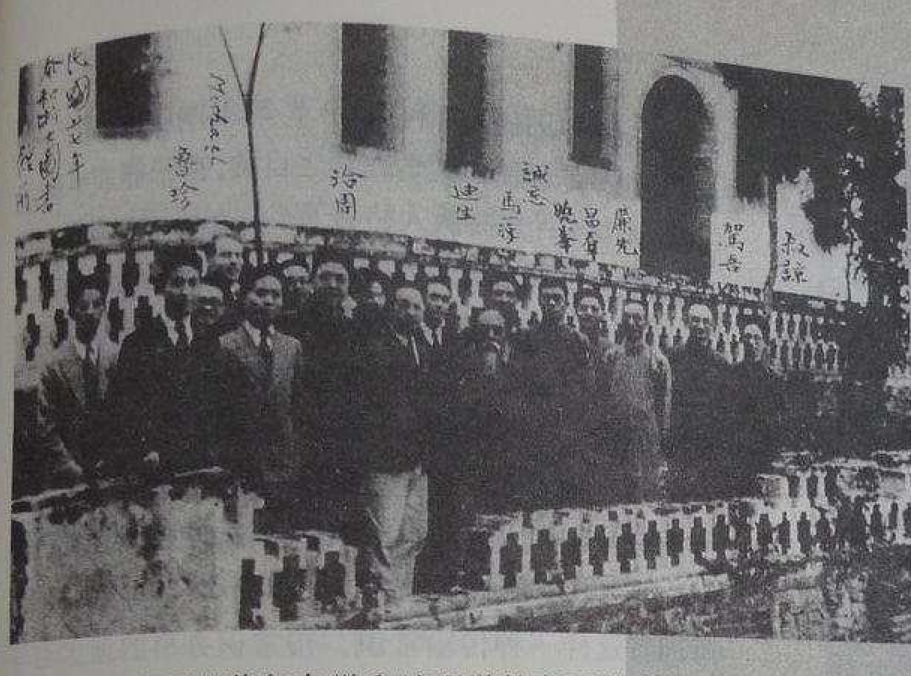
早在 1964 年，他写了一篇论文，通过分析阳光、温度、降雨对粮食的影响，提出了发展农业的许多设想。毛泽东看到后非常重视，专门把竺可桢请到中南海，对他说：“你的文章写得好啊！我们有个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只管地。你的文章管了天，弥补了八字宪法的不足。”竺可桢答道：“天有不测风云，不大好管呢！”但毛泽东却说：“我们两个人分工合作，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人民网《中共党史上的 80 位人物》第 50 条，转引自《北京青年报》2001 年 7 月 2 日）

第二天，远在广州的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专门打来电话，向竺可桢了解毛泽东谈话的重点，以便在科技工作中贯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裴丽生更是详细了解这次谈话的经过，并在党组内做了传达。（《竺可桢传》第 197 页，1990 年版）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没想到几年以后，这位“管天的人”也未能在“文革”中幸免于难。

提出当浙大校长的三个条件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上虞人。他 1910 年考取清华第二期庚款留美生，与胡适、赵元任等人赴美留学。在美国，他与任鸿隽等人创立中国科学社，并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前身）、南开大学任教，后来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



抗战初浙江大学迁至江西泰和，部分老师在校图书馆前合影

所所长，是我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

1936年初，浙江大学受"一二·九运动"影响，掀起驱逐校长郭任远的风潮，据说当年在该校读书的地下党员胡乔木，是这次学潮的组织者之一。(《浙江大学简史》第34页，浙江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郭是广东人，早年留学美国，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上颇有成就。他被迫辞职后，陈布雷向蒋介石推荐竺可桢。蒋认可后，委托行政院秘书长、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去做工作。竺可桢向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征求意见，蔡认为能不去最好，"但蒋处不能不去，婉言辞之可也。"(《竺可桢日记》第一册，第14页，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月21日，蒋介石在孔祥熙寓所约见竺可桢，竺推说要与蔡先生商量才能决定。他如此推托，除了怕影响研究工作外，还有三个顾虑：一是"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等，且不屑为之"；二是时局不宁，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三是即便答应下来，短时间内难见成效。事后，经翁文灏、陈布雷等人反复劝说，他才提出如果能满足三个条件，可以考虑。这三个条件是："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同上，第17-18页)其中第二条是教育独立的重要前提，他敢于直率地向当局提了出来。

这件事不知是否与竺可桢的一篇文章有关。文章的标题为《常识之重要》，是他在参加南京高等师范学校20周年校庆时的演讲纪录，

现在大学教育，注重各种专门知识之传授，而忽略品性德行之陶冶，积重难返，流弊甚深。社会道德与政治风气之败坏，此为要因。

——竺可桢

大学目的，不在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而在乎使他们吃起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

——竺可桢

后来刊登在《国风月刊》第 8 卷第 1 期(1936 年 1 月 1 日)上。文章说:"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养成一国之领导人材,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讨专门智识,而尤重于锻炼人之思想,使之正大精确,独立不阿,遇事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惟其能运用一己之思想,此所以曾受真正大学教育之富于常识也。"竺可桢还说,科学并不神秘,不过是有组织的常识而已;如今国事纷扰,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完全是政府和人民缺乏常识造成的。(《竺可桢全集》第 2 卷,第 244 页,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竺可桢就是抱着这样一种传输常识,按常识办事的理念走马上任浙大校长。


早年的浙江大学农学院


早年的浙江大学工学院

把"教授治校"当作主要目标

经过一番准备,竺可桢于 4 月 25 日正式来到浙江大学。完成交接手续后,他先与教职员工座谈,然后到体育馆与学生见面并发表讲话。他说:"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的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同上,第 334 页)


1949 年以前的浙大校园


浙江大学在遵义

在竺可桢看来,所谓教授并不是一个头衔、一个职称、一种待遇,也不是一种向上爬的阶梯;教授是一群"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的人们。


早年的浙江大学文理学院

为了充实教授队伍，竺可桢多次拜访邵裴之、马一浮等学界前辈，聘请胡刚复、梅光迪、张荫麟、王淦昌、王琎、卢守耕、周承佑等30多位著名学者前来任教，启用一批深孚众望的学者担任院长、系主任等职务。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实现“教授治校”的目标。这一点，从他的日记可以看出。


青年竺可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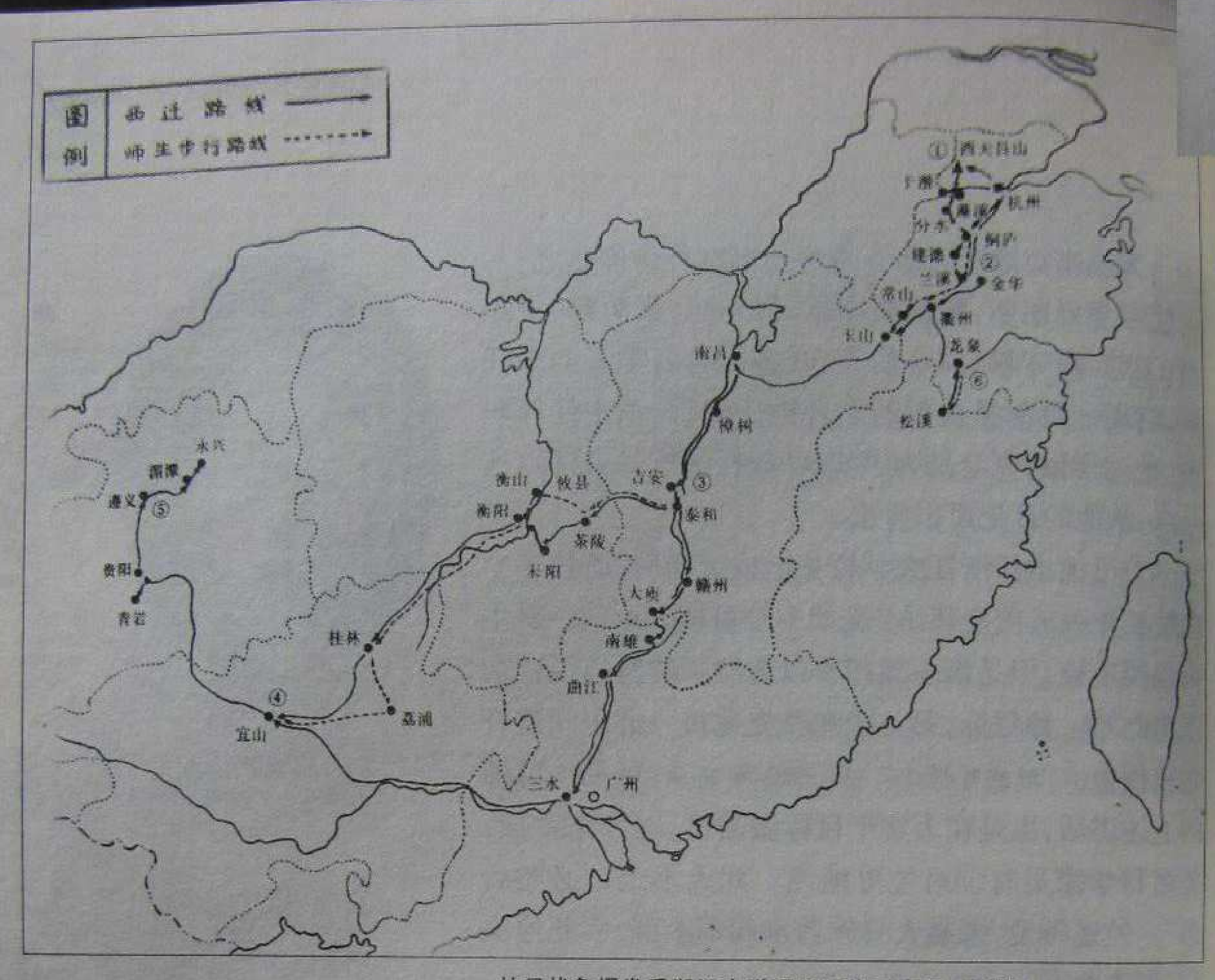
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已成定局后，该校工学院院长朱一成前来拜访。交谈中竺可桢表示他一贯主张教授治校，但是朱一成却不以为然。竺坚持说：“余以为此乃一种目标，第一步在首先觅得一群志同道合之教授也。”（《竺可桢日记》第一册，第26页）可见竺可桢的上述讲话，也是在为这个目标做铺垫。至于朱一成，著名科学家吴有训对竺可桢说：此人不走，“必贻后患”。竺还听说，朱某人只领薪水却不上课，因此他决定“彻查此事”。（同上，第29页）

大学教育的目标，决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竺可桢

如果说教授应该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书育人为无上职责的话，那么学生又应该如何努力呢？在这次讲话中，竺可桢对大学生的人格培养提出具体要求。他说：“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有了这种习惯，才不会害己累人，才能不负所学。（《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337页）

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竺可桢

但是，如何才能养成这种习惯呢？竺可桢说：大学教育的目的，应该让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开辟求知的途径，并通过研究学问来培养他们的反省意识和批判精神。只有这样，大学生才有能力对社会和自然进行精细的观察、慎重的考量，才不会被传统观念束缚，不会被少数人利用。但是，如今的大学却往往以传授知识为主，使学生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半年来的学生运动，固然热情可佩（少数



抗日战争爆发后浙江大学西迁路线示意图（原载上海科技教育版《竺可桢全集》第二卷，2004 年）

另有作用者是另一问题），但其方式之无当，实为可怜”。讲话结束时，他满怀期望地说：大家既然接受了高等教育，就不应该盲从；只有独立思考，才能应付艰难危险的环境。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十年廿年以后的诸君，都可成为社会的中坚分子，而中国今后正是最需要头脑清楚善用思想的人物”。（同上，338 页）

批评只“教”不“训”的教育制度

1936 年 5 月 18 日，已经上任的竺可桢补行就职典礼。典礼于上午 10 点半开始，先是新校长宣誓，其中有“决不妄费一钱，妄用一人，并决不营私舞弊，及接受贿赂”等内容；接着是监誓员蒋梦麟致词和来宾讲话；最后是新校长致答词。

在答词中，竺可桢首先根据浙江的历史对大家说，在此国难当头之际，我们应该学习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经验，既要



1958 年竺可桢(前排左三)、郭沫若(左一)
陪毛泽东参观中国科学院成果展览

"教",又要"训"。但是现行的教育制度却只重"教"而不重"训",许多教师上完课以后就再也不和学生见面了。这种只注重知识传授不重视人格熏陶的"教"而不"训"的教育制度,应该尽快改变。

紧接着他指出,如今的大学即使在"教"的方面也有很多问题:

第一是重视学分,忽视了导师。学分制的弊病在于教师与学生很少接触,学生只要读满学分就可以毕业。但是导师制却为学生接受教授的熏陶提供了保证,这对学生人格的形成非常重要。

第二是重视就业,忽视了学业。他说,大学生毕业即失业,与学校闭门造车有关。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但要改进大学管理,还要明确大学培养的目标。他引用美国著名学者罗威尔的话说:"大学的目的,不在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而在于使他吃起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基于这个道理,他强调大学是培养领袖人材的地方,大学生学成后不仅要自己有饭吃,还要让大家有饭吃。说到这里他解释道:"大家有饭吃"与"有饭大家吃"不一样,前者是生产教育制度,后者是分赃制度。由此可见,如果大学生只重视就业而忽视学业,就很可能堕落为分赃制度中的一员。

切勿做大官之后而发大财,如此之人没有不贪污的。

——竺可桢

大学生,是人生最快活的时期,没有直接的经济负担,没有谋生的问题。

——竺可桢

我们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

——竺可桢



竺可桢参加在意大利召开的第八次国际科学史大会

强调独立思考，注重人格修养，培养领袖人材，是竺可桢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抗日战争爆发后，竺可桢率领浙大师生到天目山禅源寺避难。刚到这里，正好是星期日，他看到师生们一群一伙地外出散步，感到这里真是实行“导师制之理想地点”。（《竺可桢日记》第一册，第157页）第二天，他对一年级新生发表谈话时说：自废科举办学校以来，我国教育在设备和师资方面，不能不算有进步，但是有个最大缺点，就是学校并没有照顾到学生品格的修养。这样一来，教师就把传授知识当作唯一任务，有的甚至“以授课为营业”。为了纠正这种倾向，浙大在全国率先实行了导师制。如今，我们虽然被迫离开校园，但是全校师生能在这里“融融一堂，通力合作”，却是可喜的事情。他还告诉大家，国家每年给你们花很多钱，为的是培养社会的栋梁，时代的砥柱，而不是让你们仅仅学习一点技术，为自己谋生找出路。这些话至今仍有深刻的警世作用。

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专业设置也越来越多，因此大学究竟是重视理论还是重视实用，是培养专才还是培养通才，就成了现代教育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浙江大学由求是学堂、浙江中等工业学堂和中等农业学堂演变而来，对实用技术教育非常重视；再加上无论是大清王朝、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统治，都把实用技术教育放在首位，因此要想改变这一传统，非常困难。然而竺可桢知道，如果仅仅是学习一种专业，掌握一门技术，就不会拥有清醒的头脑，也不会融会贯通，最后的结果是难成大器。因此他上任伊始，就把推行通才教育放在首



竺可桢一家

要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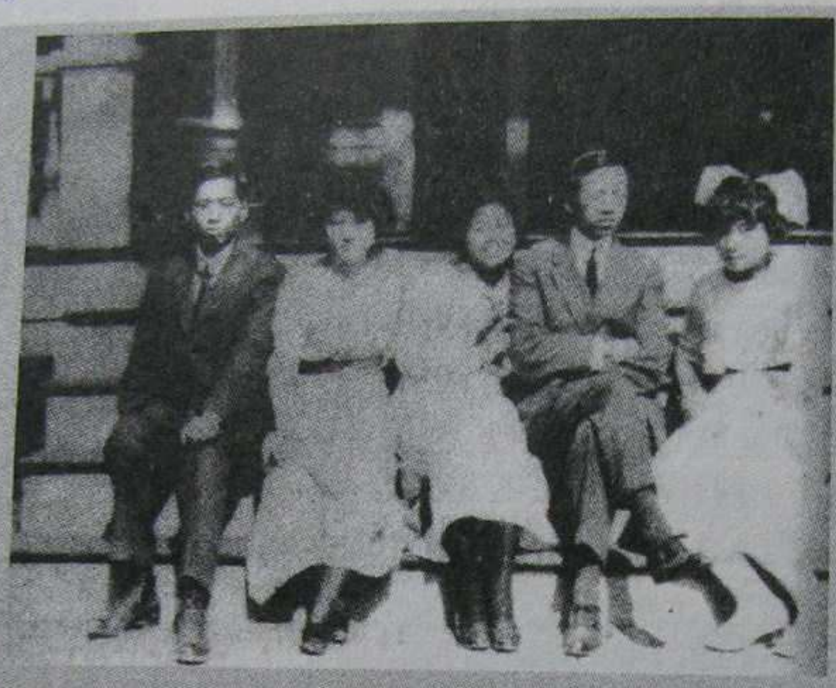
1936年5月9日，竺可桢主持第一次校务会议时提出要设立中国文学系、史地系和一年级不分系等议案。最后一项议案虽然讨论最久，但还是成立以郑晓沧、胡刚复、苏步青等人为首的公共科目分配委员会，将通才教育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前些年苏步青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时还说："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学林散叶》第25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作

一般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的一味盲从，尚无足怪，所可痛恨者，就是许多受过高等教育自命为知识阶级的人们也毫无常识地一唱百和，这是中华民族前途最危险的一桩事。

——竺可桢

专精一门技术的人，头脑未必清楚，反之，头脑清楚，做学问办事业统行。我们国家到这步田地，完全靠头脑清醒的人才有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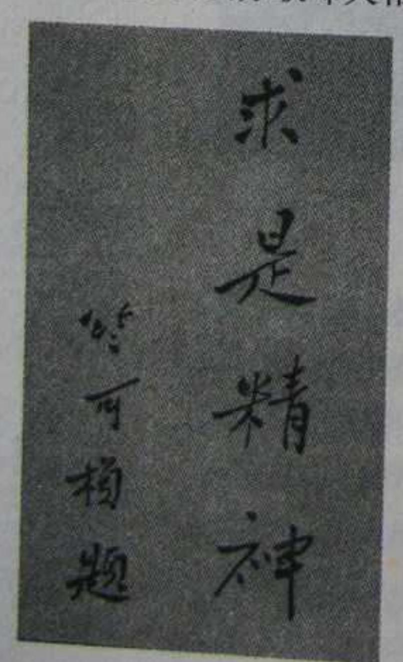
——竺可桢



竺可桢(右二)留美时与宋子文以及宋氏三姐妹

为数学家,他能够说这样的话,显然与竺可桢当年的主张有关。

1936年9月,是竺可桢上任后的第一个新学年,也是他的母校哈佛大学建校300周年纪念。17日晚上,他在哈佛大学同学会上发言说,哈佛大学的办学方针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主张思想自由,反对政党和教会干涉;二是学校的课程应该更重视理论,而不是只注重实用。他强调,这两点主张与英国大学基本一致,但是与德国、意大利、苏联却大相径庭。(《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371页)



竺可桢手迹

第二天,他在新建成的教学楼出席新生谈话会,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他告诉大家:大学是人生最快活的时期,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谋生的问题,因此大家除了诚实做人、勤恳求学之外,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这比单纯掌握一门实用技术更重要。他甚至说:"我们国家到这步田地,完全靠头脑清醒的人才有救。"(同上,第371页)

抗日战争中,竺可桢带领浙江大学师生经江西、广西最后到达遵义,途中他的夫人张侠魂因病去世,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尽管如此,他始终以通才教育



1949年8月竺可桢（前排右四）与自然科学家们在东北参观

为主，把浙大办成了具有国际影响的一流大学。正因为如此，当时来访的李约瑟博士才把浙江大学誉为"东方的剑桥"。

抗日战争胜利后，竺可桢注意到美国教育界在反思战争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认识通才教育的意义。他读了著名教育家纽曼《论大学教育范围与性质》后感受很深，立刻为《大公报》撰写《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一文，再次提出通才教育等问题，希望纠正多年来形成的重理轻文、重技术轻理论以及在学生中弥漫的"谋生不谋道"的坏风气。（《竺可桢全集》第2卷，第640页）不久，他好像从费正清夫人费慰梅那里得到哈佛大学关于通才教育的报告，其中讲到通才教育的目的，在于使民主国家的国民能够对选举和择业有清醒的认识，以及通才教育虽然"不能使人成为良医、大律师，但能使人与医师、律师接谈以后，知其良莠"。（《竺可桢日记》第二册，第888页）这就进一步加固了他坚持通才教育的信念。第二年10月，他参加中央研究院二届三次评议会时，听到陈立夫感叹科学研究的困境，认为这是"自食其果"，与他"当教育部长时，竭力提倡实科"（同上，第975页）有关。

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智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着智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自动求智和不断研究的能力。

——竺可桢

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

——竺可桢

奋斗十三年，黯然离去



竺可桢领导建成的南京北极阁气象台

前面说过，当初竺可桢上任时提出只干半年，没想到却整整干了13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13年包括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而这8年又是浙江大学历史上收获最大、成果最多的时候。浙大百年校庆时，苏步青回顾这段历史，曾经颇为感慨地说：当年“师生们住古庙破祠，吃红薯干，点桐油灯，百结鹑衣。但为爱国而教，为救国而学，弦歌不绝，其精神、气节，远远超过‘贤者回也’！古人云：‘多难兴邦’。多难不仅兴邦，多难也兴学育才。”（《数与诗的交融》第121-122页，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这不但是对浙大师生的赞扬，也是对竺可桢校长的肯定。不幸的是，抗日战争结束后，浙江大学却因为内战和学潮陷入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到了1949年4月底，竺可桢不得不独自一人悄悄出走，离开这所奋斗13年的学校……

苏步青还回忆说：又过了几年，浙江大学在院系调整中被“一分为四”，使这所“名驰海内外”的学校“顿失光彩”，他自己和数学系也被“请出去了”。（同上，第123-124页）正因为如此，他说竺可桢“与蔡元培先生一样，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伟大的校长”（同上，第203页），真是恰如其分。

罗家伦的校长生涯



(1897—1969)

力推清华改革

一、年轻的大学校长

1928年北洋政府垮台后，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当时他只有31岁。

罗家伦(1897-1969)字志希，祖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西进贤。他早年在上海中国公学读书，后来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他和傅斯年等人发起新潮社，创办《新潮》杂志。五四运动时，他被推选为学生代表，起草了《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据说这份宣言是当时唯一的印刷品，“五四运动”这个概念也是他最早提出来的。

1920年，罗家伦从北大毕业后，正值上海实业家穆藕初斥资5万元设立奖学金，资助“有能力、有学识、有领导才干”的北大学生赴欧美留学，罗家伦、周炳琳、段锡朋、康白情、汪敬熙被首先选中。这件事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清朝末年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因此人们说这是北大的“五大臣出洋”。

出国后，罗家伦就读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后来又去欧洲，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法国巴黎大学、英国牛津大学访学。留学期间，他撰写了《科学与玄学》一书，翻译了《思想自由史》。“从他留学期间的言论和活动，可以看到他是位有思想和能力的爱国青年才俊”。（《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第27-28页，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刊印）

冯友兰与罗家伦是校友，他从北大毕业后是用河南官费出国留学的。他回忆当年的情况时说：“中国留学生，大部分还是好好学习的，但是对学位的态度很有



罗家伦没有正式出版的一本书



罗家伦出国留学时在轮船上留影

不同。有些人不要学位，随便选课。有些人认为，只要有个硕士学位就够了。因为要想得到博士学位，就要选一些学校要求选而实际上没有多大用处的功课。”罗家伦和陈寅恪等人大概属于那种只要学问不要学位者，冯友兰则是“想要得个博士”的人。（《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5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了解这一情况，对于研究他们的思想、个性和成就，很有帮助。

1926年罗家伦回国后，担任东南大学史学教授。第二年，商务出版社出版《思想自由史》，他在译者序言中说：“能为纯粹的知识的主张而殉道，是人类最光荣、最高尚不过的事；能自己为思想言论自由作自觉的牺牲，以唤起他人对于此事的觉醒，是对于社会最有实利的贡献。”（转引自《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第28页）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他的理想和抱负。

然而就在这一年，即1927年，本来是准备为纯粹知识的主张而殉道的罗家伦，也被卷入大革命的风暴中。他不仅加入国民党，还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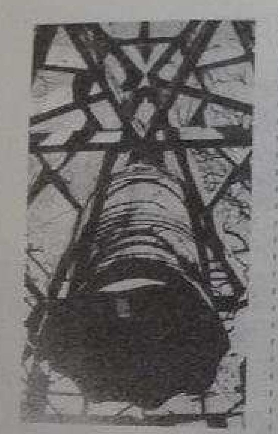








阅兵仪式——清华军训留影



清华园的大钟(明代遗物)

任了蒋介石的秘书。1928年,国民革命军抵达山东,日本政府为了阻挠北伐,出兵侵占济南,与我军发生巷战,酿成济南惨案。在这次事件中,负责外交事务的国民政府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蔡公时被日军挖眼割耳,残酷杀害。当时罗家伦也是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他与熊式辉到日军司令部谈判,面对气焰嚣张的日军司令,他大义凛然,临危不惧。尽管这次谈判没有成功,但是罗家伦的表现却令人称道。

不久,罗家伦随军进入北京。战地动员委员会是一个接收单位,罗家伦是文化教育方面的负责人。1928年8月29日,他被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正廷正式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49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在中外教育史上,30岁左右担任大学校长的人,似不多见。

二、上任前的是是非非

清华大学的校长为什么要由外交部长任命呢?这与它的历史有关。清华大学原是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创办的留美预备学校,其目的是培训可以直接插到美国大学二三年级的学生。由于此事与外交有关,因此在1908年拟定的"派遣美国留学生章程草案"中规定:"赴美留学生将由美国退还赔款支付费用。……外务部负责创办培训学校并任命留学生监督。"(《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第11页,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所谓外务部,就是后来的外交部,该培

训学校一开始叫游美肄业馆，后改为清华学堂、清华学校，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仍然归外交部管辖。

为了改变这种依赖外国培养高级人才的状况，该校从1916年起提出要逐步改为大学。经过10年努力，到1925年成立了大学部和国学研究院。这样一来，清华就有三个相对独立的教学单位：留美预备部还在，却不再招生，直到把原有学生全部送出去为止；大学部招收高中毕业生，接受四年专业教育，毕业生不享受出国留学待遇；国学院招收大学毕业或同等学力的学生，为的是培养国学教师和专门研究国学的人才。在这个社会动荡不安、学校正在转型的重要时期，全校师生从人员结构、教学内容到未来出路，都面临着考验。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清华的归属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当时国民政府想让清华大学隶属于大学院（相当于教育部），但是外交部却以历史关系为由不愿放手。这一点，从该校《南下代表报告书》中可以看出。报告书说："自大学院所召集之全国教育会议通过全国教育学术机关应归大学院管辖后，大学院即根据此项原则，提议清华大学应直辖于大学院。经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议决通过。故清华大学应归大学院管辖，在法律上已不成问题。惟外交部始终声称与清华在历史上有特殊关系，不允完全放手。而大学院蔡院长，又素持礼让态度，不愿力争。一则恐伤外交部与大学院之感情，再则恐酿成僵局，影响学生之学业。结果遂由大学院暂时会同外交部管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册上，第50-51页）

这份报告书是1928年9月中旬写的。在此之前，清华大学经历了一个动荡不安的夏天，许多人由于时局混乱、政权更迭，正在为清华大学的命运担心。据《吴宓日记》记载，早在6月初，清华园就"交通已断，邮信不至"，人心惶惶。有消息说，"海甸一带……将有所动作，先毁燕京、清华二校，……于是本校警备委员会遴请教职员多人彻夜分班巡逻"。随后又有"今夜放火，焚烧校舍"的传闻，使吴宓和衣而睡，彻夜难眠。紧接着，"本校国民党学生已于大礼堂前悬红底之青天白日旗。又于校中到处，满贴颜色纸条之标语。如铲除土豪劣绅，以党为国，党化教育之类"，局势才趋于平静。（《吴宓日记》第四册，第70-72

青年到社会上去要有伟大而坚定的抱负。抱负是由理想而生的，所以不能不先有理想。我们不要专看见物质的现实，人事的现实，而把自己埋葬进去了。

——罗家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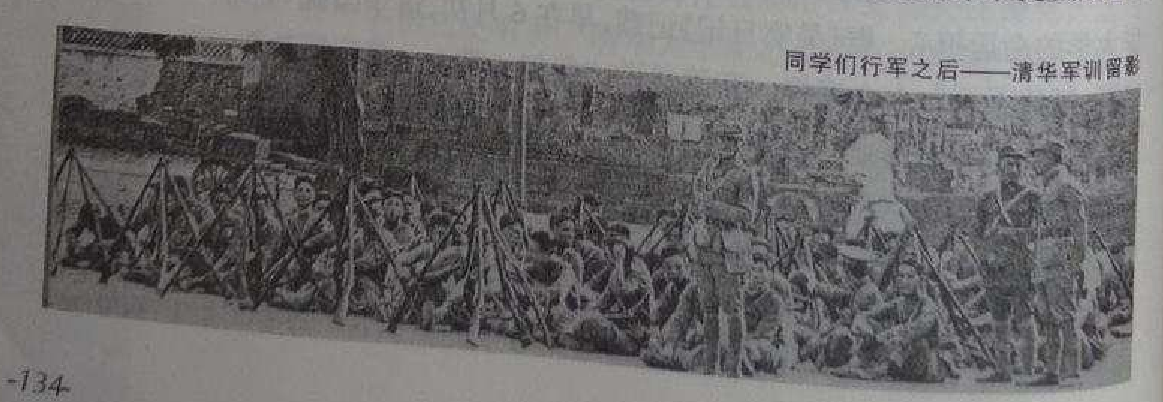

五四运动中的罗家伦（前排右三）

页，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

6月中旬，校园里又盛传当局要解散清华。陈寅恪对吴宓说："清华解散后，仍图居北京，则于学业进步较多。"吴宓同意他的意见，认为"非不得已，不离北京。清华如解散，而京中又为北大派所垄断，不能见容，则或者于辅仁大学等处谋一教职。薪金虽微，不计。"与此同时，吴还在日记中把"胡适、罗家伦之流"，视为"排除异己，以邪说曲学召世惑众者"。（同上，第77页）可见无论学术观点还是政治立场，那时吴宓与罗家伦都格格不入。

7月15日，陈寅恪借赵元任家设订婚筵，吴宓和罗家伦都应邀出席。那天吴不仅写了贺诗，还喝了很多酒。18日，吴宓又听说外交部已经为清华大学物色了三位校长人选，这三个人是凌冰、张歆海、罗家伦，"而以罗为最有希望云"。（同上，第91页）

7月19日，吴宓再次去赵元任家吃饭，在座的还有钱端升、张奚若夫妇、金岳霖及其美国女友。吴说这次饭局是AA制，他怀疑此事由杨步伟发起，"似纠众拥戴赵元任为校长，而由罗家伦暗中主持一切"的。但是吃饭时大家并未提及此事，


同学们行军之后——清华军训留影

而是由“钱、张二君述南京大学院、外交部对于清华之态度而已”。(同
上,第92页)钱、张二人都是欧美归来的学者,当时又在大学院供职,他
们的话非常重要。杨步伟是赵元任的妻子,她在回忆录中说:“……北
伐以后,大学院又下了几次的命令要元任做校长,元任屡辞不就并荐
贤自代未准,但不久就派了罗志希来长校,好些事就一变当日的清华
校风了。”(《杂记赵家》,第256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杨步伟争强好
胜,她这话虽然不大可靠,但是从中也可以看出大家对清华命运的关
心。

这一年暑假,吴宓南下探亲,回来后罗家伦已经上任。罗与清华
没有渊源,又是国民党要员,能否获得广大师生支持,他心中无数。因
此他在8月中旬派郭廷以到清华了解情况。郭廷以完成任务后,在一
封长信中说,除了在京毕业生声称“罗某长校,誓死反对”外,学生会
和大多数在校学生都对罗表示欢迎。郭还对罗家伦说:“我师一再致
意于吴宓,不知吴早已宣言不与我师合作了。”(《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第
30页)

对于吴宓的表现,罗家伦并不介意。9月4日,吴宓与杨振声见
面时,杨代表罗家伦再次向他致意,希望他能留下来继续合作。杨振
声与罗家伦是北大同学,共同参加过五四运动,其小说《玉君》在现代
文学史上享有盛誉。罗家伦上任时,特意把他和冯友兰从北大请来,
分别担任教务长和秘书长。杨还说:“罗君不以个人意见为好恶,且平
昔待朋友亦甚好。”但吴宓还是疑虑重重,心存芥蒂。(《吴宓日记》第四
册,第123页)就在同一天,清华学生召开大会,驱逐了部分教工。吴宓
怀疑这是罗家伦暗中指使的,因此他在9月7日的日记中说:“闻罗
氏将以杨振声为本校教务长。罗之与学生勾结,为之扫除障碍,似属
事实。如是办法,岂可云正当?清华前途,益将陷于悲境矣。”(同上,第
125页)

现在的大学教育的缺陷,就是太注重学生的专门知识,而太忽视其整个人生的修养。所以大学往往只能造就专才而不能造就通才。往往只能造就一技之长的有用人才,而不能造就通达事理,气度雍容的领袖人才。

——罗家伦

三、“学术独立”与“四化”政策

罗家伦是9月18日宣誓就职的。这件事标志着国民政府的权力



清华校徽


清华校徽

已经到达北方教育界，因此各方面都非常重视。清华董事会、北平政治分会、平津卫戍总司令、北平特别市党部、市政府、外交部、美国公使馆、燕京大学都派代表参加，新闻界也争相报道此事。

宣誓仪式由国府委员周震麟监誓。宣誓之后，罗家伦发表长篇就职演说。吴宓在日记中说："……赴大会堂罗校长宣誓就职典礼。一切如党国新仪，演说甚多。罗氏以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四者为标帜。又谓兼容并包，惟贤是用云云。"(同上，第130页)

罗家伦演说的题目是《学术独立与新清华》。他首先指出，国民政府把清华改为国立大学，是一件具有深远意义的事。因为"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要为中国在国际间求独立自由平等"，而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把美国庚款兴办的清华学校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正有这个深意。我今天在就职宣誓的誓词中，特别提出'学术独立'四个字，也正是认清这个深意"。基于这一认识，他兴奋地说："我今天在这庄严的礼堂里，正式代表政府宣布国立清华大学在这明丽的清华园中成立。从今天起，清华已往留美预备学校的生命，转变而为国家完整大学的生命。"(《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07页，台北华国出版社1952年出版)

当时把清华改为国立大学，主要是罗家伦的功劳。十几年以后，他在回忆这件事时说：当时外交部任命他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时，在清华大学前面并没有"国立"二字。之所以如此，"是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的主张，说是恐怕美国朋友看了不高兴！"罗家伦接到外交部任命后，蔡元培让他拟定组织规程，他便与当时还在大学院任职的张奚若、钱端升一同拟定了《清华大学组织规程》。他说他凭借"有一点革命的劲儿"，在清华大学前面加了"国立"二字。这个文件经蔡元培核准，提交国务会议顺利通过。(同上，第116页)因此罗家伦反



“水木清华”匾额

复强调，在清华大学前面增加“国立”二字，是中国学术独立的重要标志。

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向苏俄学习，喜欢用标语口号进行宣传，喜欢用“训导”的方式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罗家伦所谓“四化”，就是一种口号，其中的纪律化，就是要通过军训来实现。他强调，实行军训既是全国教育会议的决议和贯彻教育方针的需要，“又是清华学生的要求和家伦个人的主张”。军训中，他把学生分为四队，要求统一着装、按时作息、早晚点名，无故缺席要记过。为了以身作则，罗家伦和杨振声也身穿军服，脚蹬马靴，与学生一齐出操。按规定，记三次小过合一次大过，记三次大过就开除学籍。著名逻辑学家沈有鼎当时还是学生，他一向自由散漫，经常不上早操，被记小过 8 次，眼看就要被开除了，正好冬天来临，早操在大家的抵制下被取消，他才躲过这一劫。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当年刚刚考入清华，因为受不了早操制约，又转学到了师大。罗家伦的好友冯友兰也承认：“在罗家伦所提的‘四化’之中，学术化的成功最为显著，军事化的失败最为彻底。”（《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 320 页）

四、确立教师的主导地位

除军训之外，罗家伦的治校方略还是可圈可点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改善了教师待遇，提高了教师地位，维护了教授治校的体制。

现在的青年对于「现实」太看重了，尤其是对于物质的现实。我们不能不认识现实。但我们决不能陷死在现实的泥淖之中；若是陷落下去，必至志气销沉，正义感与是非心一道湮灭。

——罗家伦

罗家伦在就职典礼上说:“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为青年择师,必须破除一切情面,一切顾虑,以至公至正之心,凭着学术的标准去执行。”(《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201页)上任以后,他经过一番考察,发现清华存在八大问题:一、机关太多,冗员充斥;二、职员薪金过高,权力太大;三、浪费惊人;四、图书太少,设备不足;五、在教师待遇上,重资历不重学识;六、学生重考试不重学问,教师重教书不重研究;七、学生人数太少,教育成本过高;八、学科配置不合理,有名无实的系太多。基于这些认识,他开始对清华大学进行整顿。其中成效最明显的就是淘汰机关冗员,提高教师待遇。

罗家伦认为,过去清华的工资并不高,只是没有拖欠而已。国民革命成功后,中山大学和武汉大学的教授待遇都超过清华,再加上首都南移,恐怕很难聘到优秀的教授。至于机构臃肿的问题,冯友兰介绍说,罗家伦在“教职员的待遇上,也有办法。发出了一个通知,教员发新聘书,职员发新委任状,突出聘书和委任状的区别。在新聘书中,教员增加工资,在新委任状中,减低职员的工资,特别减少大职员的工资。小职员的工资则未减少。这就提高了教员的地位。这个办法,教员固然拥护,职员并不反对,也有表示情愿自动减薪,只求能加委的。这些都是校长职权范围内所能办的事情”。(《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313页)

这件事影响很大,也改变了吴宓等人的看法。吴在日记中说:“……访王文显,悉罗校长力图改良校务,并增善教授待遇,所认为庸劣及为学生攻击之教授,固在所必去;而优良之教授则反加增其薪金。西洋文学系尤为满意。宓之月薪,已内定增为340元。宓向不持与人比较或虚空立论之态度,自家能增40元,亦佳事也。”


国立中央大学校门


国立清华大学校门

(《吴宓日记》第四册，第 134 页）当时吴宓正暗恋着毛彦文。为了能经常在一起，他还向冯友兰推荐让毛担任女生管理员。后来冯对吴说："彦事已与罗校长谈过，罗似不以彦为然。"（同上，第 140 页）从这些个人琐事上，也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气度和品格。

经过整顿，清华职员由 90 多人减为 70 余人。过去的常设机构招考处、职业指导部被撤消，舍务室、技术部被合并到其他科室，注册部、图书馆等部门也精简了人员。罗家伦说，仅仅是裁减科室，就节约开支两万余元。与此同时，新聘教授却增加了很多。当时受聘的著名教授除了杨振声、冯友兰外，还有钱玄同、沈兼士、朱希祖、张星烺、翁文灏、葛利普、吴之椿、浦薛凤、克尔文、陈锦涛、邓以蛰、孙鏞、吴正之、萨本栋、谢惠、陈桢、孙瑞林等"国内外学问能力颇为著称之教授"。（《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 11 页）据统计，罗家伦在任时"解聘不力教员 30 余人，延揽优良教授多达 40 余人，并发送待遇与其他福利，使之安心教学和研究"。（《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第 51 页）

这样一来，教师的地位大大提高。提高教师地位，不是要压制职员，而是为了维护学术的独立与尊严，避免把大学办成衙门。冯友兰说："当时有一种议论，说清华有三种人物：神仙、老虎、狗。教授是神仙，学生是老虎，职员是狗。这话虽然有污蔑之意，也说明一部分的情况"。（《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 314 页）

作为国民党要员，罗家伦肩负推行"党化教育"的责任。"党化教育"的宗旨与清华自由主义的传统格格不入，所幸罗家伦毕竟是蔡元培的学生，又在欧美接受过自由主义熏陶，因此他能够比较妥善地处理这种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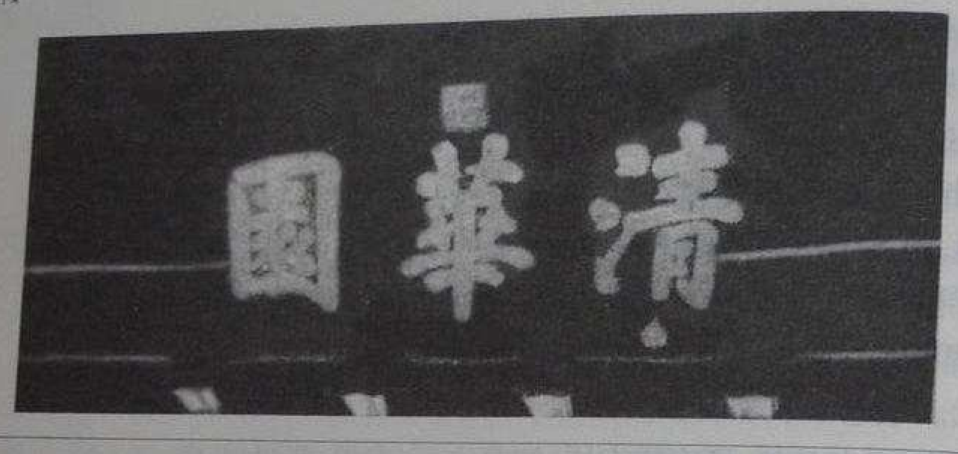
罗家伦上任后，先后制定《国立清华大学条例》和《国立清华大学规程》，由主管部门颁布。这是确立清华管理体制的两个纲领性文件。这两个文件都对教授会和评议会的职能有明确规定。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还有许多具体事宜需要处理。比如在后一个文件中规定，各院院长由"校长就教授中聘任之"。（《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 143 页）由于院长是评议会的当然成员，评议会又是教授会常设机构，学校的许多重要事情都要评议会审议才能执行，因此教授们坚持各

我们应当作什么一种人，将来为国家民族做什么一些事，这主意在大学求学时代，就应该打定的。打定之后，在这时代的立身处事，为学为人，就应该立刻开始按照这标准做起。

——罗家伦

文学哲学和艺术的修养是很重要的。这种修养，可以为你开拓意境，变化气质，调剂性灵，使你人生更加丰富，更感觉得有意义。

——罗家伦



"清华园"匾额（咸丰遗墨）

院院长不能由校长直接聘任，应该由教授会选举产生，否则评议会就会被校长控制。最后罗家伦作了妥协，决定先由教授会提出两位院长人选，再由校长从中选定一位。这不仅化解了校长与教授之间的矛盾，也维护了教授治校的管理体制。冯友兰说，这种体制"一直存在到1952年院系调整时期为止"。（《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318页）

五、保护清华基金的辞职风波

罗家伦上任两个月之后，向清华董事会提交一份《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除了汇报到校经过、考察所得、整顿情况外，还提出一个"将来计划"。在"将来计划"中，有两个比较敏感的问题：一是运用清华基金，增添教学设备；二是改革清华基金的管理使用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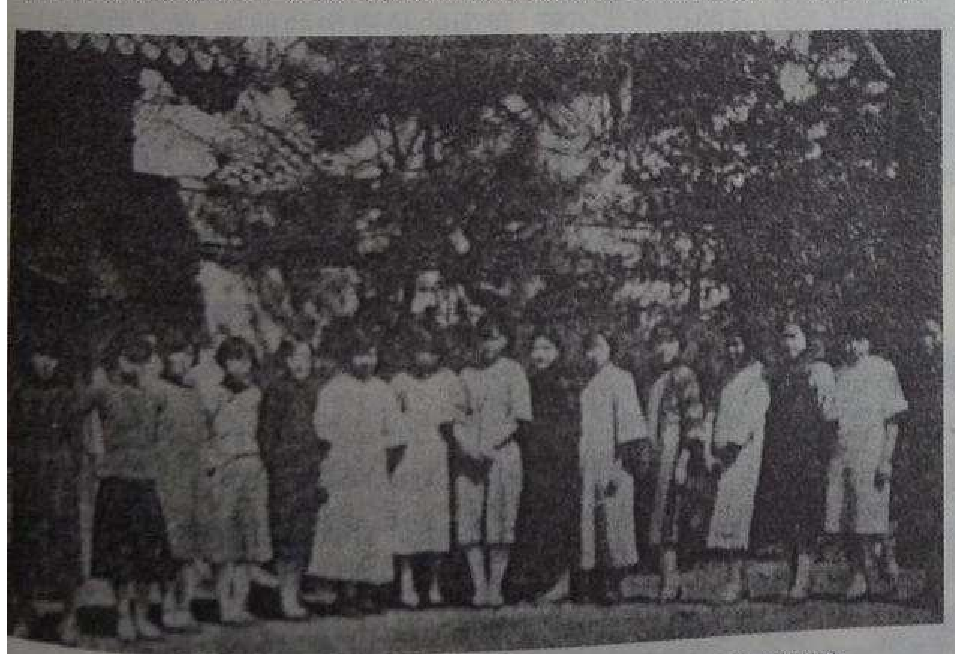
关于第一个问题，他说学校现有设备，都是留美预备学校时代留下来的，与大学的要求极不相称。于是他提出要新建学生宿舍、自然历史馆、化学实验室、办公处以及扩充图书馆、添置图书仪器等6大项目。这6大项目需要资金85万元，因此他想动用清华基金，否则无法进行。

要动用清华基金，就必须改变它的管理模式。在这份材料中，罗家伦对清华大学的董事们说："大家都知道清华有800余万的基金，算一算表面价值，似乎没有什么错误；但是如果合一合实价，就不免使人气短。大家或者也知道清华基金已有亏折，但是为什么亏折，尚实存若干，所存放的银行是否可靠，均很难明确的解答。"他断言："清华的基金向来是一个哑谜，很少有人能够明白其实情。"（《清华大

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19页）因此他提出要彻底清查基金，严肃追究责任。

据罗家伦说，关于清华基金的管理和黑幕，他是偶然发现的。早在1928年初夏他担任战地政务委员的时候，曾在北京看到汤姆生会计师事务所做的关于清华基金账目的报告。这份报告说，清华基金管理非常混乱。有人动用基金随便买股票、买公债；有人前一天把基金存入银行，第二天银行就倒闭了；有人利用换汇等手段，堂而皇之地贪污公款……。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罗家伦说：清华"基金的保管，……以前在北洋军阀政府时代，有一个清华基金保管委员会，是由三个人组织的，一个是外交总长，一个是次长，一个是美国公使。自然外交部占了多数了。横直赔款是退还给中国的，随便你怎么办，一个外国公使也不会因此来得罪中国外交部。于是外交部里的人，就把这几百万基金，随意胡来，把它来做公债生意、来投机、来挥霍。总之谁管基金谁发财。"（《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16页）

罗家伦的《整理校务之经过及计划》提出时，清华董事会刚刚改组，大家对其中涉及的问题基本认可，但是却不同意他动用85万元清华基金。无奈之下，他只好以辞职相抗争。罗家伦说："我的辞职不



罗家伦打破清华不招女生的旧例。这是1928年清华大学招收的全体女生

学。这也是不对的。 ——罗家伦

现在的青年，为时尚所趋，多倾向于应用科学，而忽视基本的理论科学。这也是不对的。

知识里的"万灵丸"是没有的，世界上也决无速成的事。 ——罗家伦

是对于黑暗的屈服。我是要以我的辞职，换取清华基金的安全与独立，和清华隶属系统的正轨化。”（同上）为此，他在提出辞呈的前两天，就草拟一份上万言长篇谈话，以“所争在议决案及制度问题”和公布“本校一切经济之实况”（《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68页）为主题，寄给上海的许多报社，其中，不仅把汤姆生会计事务所的报告和清华基金的黑幕披露出来，还公布了前任校长滥用公款的问题。这个谈话在叶楚伧主持的《民国日报》公布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笔者按：台湾学者苏云峰在《抗战前的清华大学》中说，罗家伦曾“在上海举行记者会，公布辞职理由”，可能有误。参见该书第42-43页）

随后，罗家伦一不做二不休，先后拜访了美国公使马慕瑞、国府委员戴季陶、陈果夫和孙科等人，并提出“改隶废董”的议案。所谓“改隶”，就是要清华大学与外交部脱钩，由教育部单独管理；所谓“废董”，则是废除清华董事会，并将清华基金转交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简称中基会）保管。经过一番努力，教育部重新颁布《国立清华大学规程》，取代了上一年颁布的《国立清华大学条例》，从而使罗家伦的目的得以实现。

在“改隶废董”过程中，罗家伦采取了许多非正常举措。他说：“我承认我所取的办法，有点非常，或者可以说带点霸气。但是向黑暗势力斗争，不能不如此。要求一件事的彻底解决，不能不如此。老于人情世故的人，开始就决不这样做。但是我不知道什么顾忌。人家对我的仇恨我不管，我为的是清华的前途，学术的前途！”（《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19页）另外，冯友兰也举过一个类似的事例。他说，当年清华想招收女生，“这个问题如果要跟有关部门商量，那就可能无休无止地讨论下去”。于是，罗家伦在招生简章上加了“男女兼收”四个字，问题就解决了。（《三松堂全集》第一卷，第313页）从这个事例中也可以看出罗家伦的办事风格确实“带点霸气”。



清华图书馆老馆外景

六、从图书馆看办学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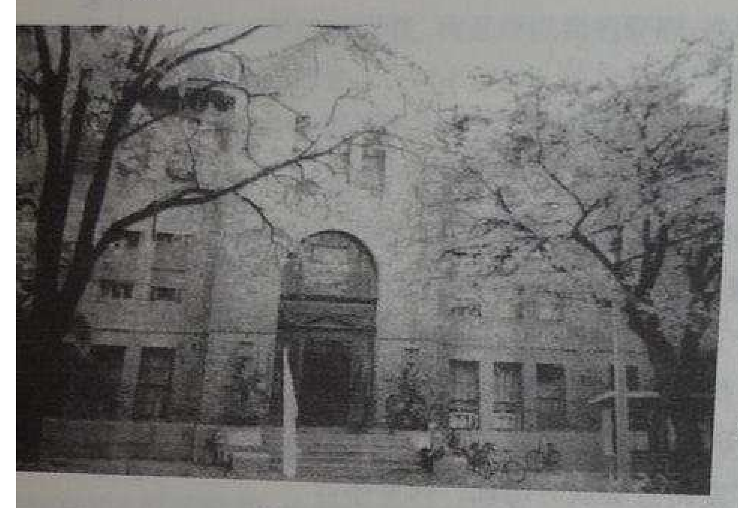
"改隶废董"以后，清华基金于当年8月正式移交中基会。罗家伦争取的六大项目得到资金保证。从1930年到1932年，生物馆、学生宿舍、图书馆、气象台先后落成。其中最漂亮而且影响最大的，恐怕是图书馆了。

凡是去过清华大学图书馆的人，都对它那富丽堂皇的建筑和高雅肃穆的环境赞叹不已。杨绛在《我爱清华图书馆》中谈到，1932年她去清华大学借读时，中学时代的好友蒋恩钿就对她说："我带你去



30年代初的男生宿舍——明斋

看看我们的图书馆！墙是大理石的！地是软木的！楼上的地是厚玻璃！透亮！望得见楼下的光！"一连串的惊叹号，表达了这位清华女生的激动和自豪。进了图书馆，杨绛看到那无须油漆的软木地板，便情不自禁地想摸一摸它有多软，是不是可以掐得动。到了书库，她都不敢落脚，生怕把玻璃地板踩碎。(《不尽书缘——忆清华大学图书馆》，第5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资中筠在《清华园里曾读书》中也说："一进入那殿堂就有一种肃穆、宁静，甚至神圣之感，自然而然谁也不会大声说话，连咳嗽也不敢放肆。……在那灯火通明的大阅览室，浸润在知识的海洋里，有一种无限满足的心灵净化的感觉。"她还说："第一次爬上窄窄的楼梯进得书库，望着那一排排淡绿色磨玻璃的书架，真有


清华科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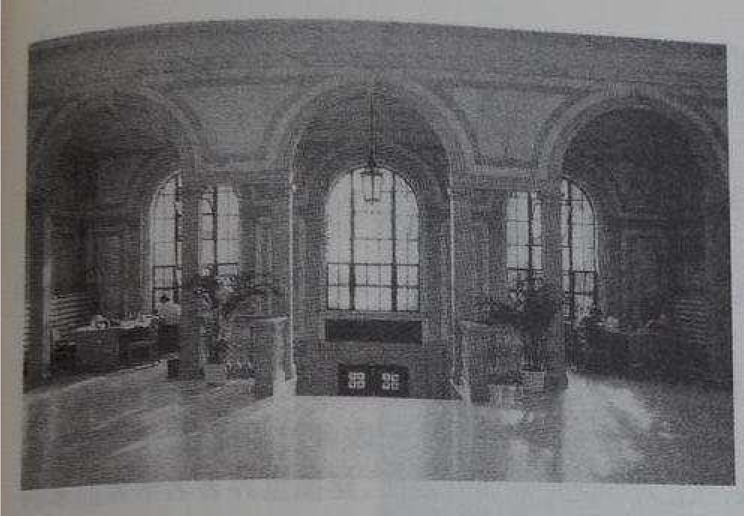
说不出的幸福感，外加优越感”，（同上，第130-131页）这就是她非要报考清华大学不可的原因。

清华图书馆不仅装修考究，馆藏丰富，使用方便，而且还有非常幽雅的外部环境。曹禺说，当年他在那里写《雷雨》，无论是“想到头痛欲裂”还是“写得太舒畅”，都要走出图书馆，在春风、杨柳、蓝天、白云、浅溪和绿草中，才能感受到“韶华青春和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同上，第46页）

毫无疑问，大家都承认清华图书馆在“中国大学中绝对是一流”（同上，第48页）的；但是他们在赞美清华图书馆的时候，几乎都不提罗家伦的贡献。

罗家伦对图书馆有自己的看法。早在就职时他就批评说：“清华现在的弱点是房子太华丽，设备太稀少。设备最重要的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仪器；一方面是图书。我以后的政策是极力减少行政的费用，每年在大学总预算里规定一个比例数，我想至少20%为购置图书仪器之用。”他还说：“图书馆不厌舒适，不厌便利，不厌书籍丰富，才可以维系读者。我希望图书馆和实验室成为教员学生的家庭。我希望学生不在运动场就在实验室和图书馆，我只希望学生除晚上睡觉外不在宿舍！”（《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二卷上，第202-203页）

1930年初，罗家伦公开招标扩建图书馆。后来他在开工典礼上表示：“我对大学建筑计划的基本观念是：图书馆实验室一定要造向坚



清华图书馆老馆内景

固，造得讲究，使人进去工作时觉得舒服。体育馆一定也要设备完好，……体育场一定要宽大，要多分几处。至于宿舍，则一定要朴素，乃至于不甚舒适。必须如此，学生才不愿意老躲在宿舍里'高卧隆中'，而乐意上图书馆、实验室、体育馆和操场，发扬青年们蓬蓬勃勃，努力上进的精神。这才是我心目中大学应有的气象。"（《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14页）

除了讲究、舒适以外，罗家伦还有两个原则：一是要为将来的发展留下余地，二是要有一个"伟大的阅览室"。关于第一点，他说我们要接受芝加哥大学图书馆的教训，该图书馆建成后，没几年就面临书库爆满的困扰，以致不得不另谋出路。为此，他不同意当初要在原图书馆背后加盖一个建筑物，使之形成工字形结构的方案，而是主张把书库建在北面，"使他有很大的地面可以不断的推进"。几十年后，清华图书馆在原来基础上再次扩建，应该感谢罗家伦的远见。至于第二点，罗家伦富于激情地说："大阅览室是最可以使人兴奋，最能刺激人好学兴趣的场所。所以这次在西面所建的大阅览室中，预计可设1000个座位，而且每一个或两个座位上都安置台灯。诸位想想，将来有人一踏进这个阅览室，看见1000个青年学子各个都在座位上，面对着绿色的台灯，静静地埋头用功研究——这是何等可以使人感动的气象！"（同上，第113页）此外，罗家伦还在扩建后的图书馆一层设置许多研究室供教授使用，这也是他的高明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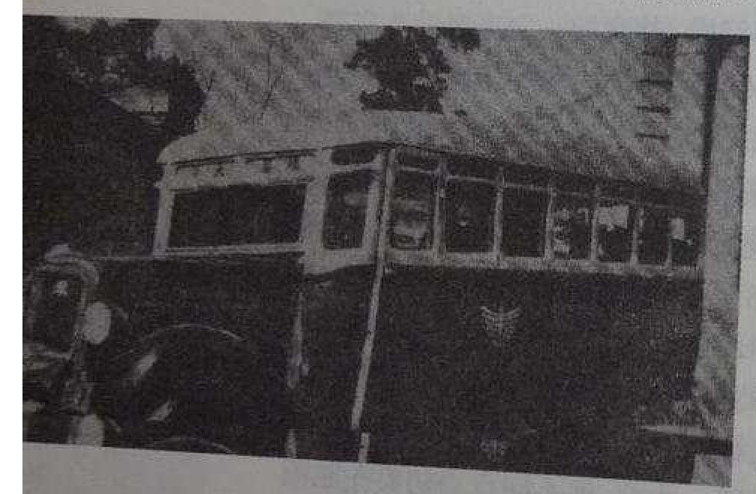
从前中国就害在日本的「速成法政」「速成师范」这些学校或班次上面，造成了一班「速成大家」回到中国来，什么东西都是一知半解，做文章噜吵却是第一。

——罗家伦

清华大学图书馆为中国养育了一大批优秀学者和文化名人，在这方面罗家伦功不可没。

七、贡献卓著，黯然离去

谈到罗家伦对清华大学的贡献，台湾学者苏云峰总结为八个方面：1、提前二年实现了前任校长曹云祥建立“完备之分科大学”的计划；2、废除董事会，使清华改归教育部，不再受外交部牵制；3、健全了基金管理，稳定了经济基础；4、增加建筑，添置设备，大大改善了读书环境；5、重建教师队伍，改善教师待遇，使之安心教学和研究；6、整理原有学系，强化理学院增加研究院所，延揽世界著名学者前来讲



清华大学早年接送师生的校车

学，提高了清华的学术水准；7、扩大招生名额，设立奖学金助学金，以培养更多人才；8、招收女生，使女子教育机会平等。除此之外，他还认为：“罗家伦的成就，上承旧清华传统，同时开启了日后的新发展。人皆以为梅贻琦是清华大学的功臣，而不知道罗家伦的奋斗成果，实为梅氏铺下了一条康庄大道。”这一评价是很中肯的。同时他也指出：罗家伦“年轻气盛，好展才能，思想激进，好批评现状不讲情面，在当时社会文化条件下，必然会得罪他人。”此外，罗家伦的国民党背景对于“主张学术独立于政治之外的清华人而言，是难以容忍的。”这些都构成了他只做了两年校长就过早离开清华的因素。（《抗战前的清华大学》，第51-52页）

罗家伦是1930年离开清华的。离开的外部原因，是1930年中原大战时阎锡山控制了华北，当然要除掉蒋介石的人；离开的内部原因，是在学生会召开的一次

罗家伦手迹

我们痛骂贪官污吏是不中用的，我们要自己平时有很好的修养，将来不会做贪官污吏。

——罗家伦

要大学好，必先要师资好。为青年择师，必须破除一切情面，一切顾虑，以至公至正之心，凭着学术的标准去执行。

——罗家伦

大会上，反对校长的学生提出议案，要求罗家伦辞职。这个议案虽然没有通过，罗家伦却不能装聋作哑。他找冯友兰等人商量，冯认为这是对校长的侮辱和挑战，应该提出辞职，以示反击。罗家伦采纳这个意见，便飘然而去。苏云峰认为，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文化、学术环境中，再加上各种利害冲突，只要有类似背景的人都会有同样的下场，只是罗家伦的表现更有格调罢了。（同上，第 53 页）

开中央大学气象

一、受命于动乱之际

罗家伦提出辞去清华大学校长职务后，没有得到教育部批准，但他去意已决，便独自到武汉大学当了一名历史学教授。不料蒋介石到武汉后，先要他回清华去，后来又让他到南京担任中央政治学校教育长，主持校务。中央政治学校的校长是蒋介石，其前身为中央党务学

校。它与普通高校不同,是一所党政干部培训学校。罗家伦曾参与该校筹备,对这个学校非常熟悉。

罗家伦对政治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不要仅存批评现状的态度,要存如果自己接上来干,如何可以干得好的心理。我们痛骂贪官污吏是不中用的,我们要自己平时有很好的修养,将来不会做贪官污吏。"他认为,从事政治的人不仅要有专门的知识和技能,还要有健全的人格。否则就只能是"有一技之长的书吏",或者是"只会活动的政客"。(《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24-125页)

1932年9月,罗家伦被任命为中央大学校长。中央大学的前身是张之洞创办的三江师范学堂。所谓三江,是指江苏、安徽、江西,后因三省合不来,又改为两江师范学堂。辛亥革命后,两江师范学堂改名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简称南高师。1921年,南高师又改为东南大学,成为东南地区的最高学府。在这一过程中,校长郭秉文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25年,东南大学爆发更换校长的"易长风潮"。这一风潮的起因和经过非常复杂,由于郭秉文与江苏督军齐燮元关系不错,因而被段祺瑞免职,因此《南京大学史》说这次风潮"源于国内的政争"。(见该书第71页)不过,当年学术界对这个事件却另有一番评论。

有人说撤消郭秉文校长职务,是政治干涉教育的表现,著名法学家王世杰认为问题并不这么简单。他在《东大风潮与教育独立》中说:东南大学自郭秉文被免职以后,形成两派。"拥郭诸人的表示,是要拥护教育独立。教育独立确是应该拥护的;但是拥护教育独立,决不就是拥护郭秉文。郭氏趋附军阀是无可讳饰的事实;他对外并没有给东南大学保全一个教育独立的颜面。郭氏的东南大学是一个校长独裁制的大学;所以他对内也不曾给东南大学立下了一个教育独立的基础。"(《现代评论》第一卷,第14期)

郭秉文被段祺瑞政府免职后,接替他的是著名学者胡敦复。当胡敦复于1925年3月9日上任时,"拥郭派"学生在教授陆志韦、徐则陵带领下,对胡敦复一行大打出手,酿成著名的"三九"事件。陶孟和在《东大暴动》一文中严厉谴责了肇事者,他尖锐地指出:这次暴动既反映了东南大学教育的失败,也是"中国教育史上一个大污点",实在让人不敢相信。(同上,第16期)

另外,有人指责郭秉文被撤换,是汪精卫、吴稚辉等人参与操纵的结果,其目的是为了推行"党化教育"。为此,张奚若在《党化教育与东南大学》中说:"据我看来,郭氏免职与一般人所谓'党化'是毫无关系的。因为这件事是由东南大学内部



中央大学礼堂

发动的，不是由外面干涉的。内部发动的重要理由，是因郭氏有推翻评议会，取消工科，擅改校章，和其他种种不正大不规则的行为。"他还指出，新校长胡敦复被"拥郭派"教师雇佣流氓殴打凌辱，是无赖的"朋党"行为。（同上，第 17 期）

据说，曾经在东大担任教授并与郭秉文有矛盾的杨杏佛，在这次风潮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1927 年国民党定都南京后，将东南大学与江苏境内的其他 8 所专科以上学校合并，改名为第四中山大学，简称第四中大。这种贪大求全并将所有大学冠以"中山"二字的做法，终究是行不通的。于是到 1928 年初，国民政府下令将第四中大改为江苏大学。这个校名与首都大学的地位极不相称，遭到师生反对，最后又改名为中央大学。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因本校师生怒打外交部长、砸毁《中央日报》社、酿成"珍珠桥事件"而辞职。几经周折，教育部任命段锡朋担任校长。段锡朋是江西永新人，早年考入北大，五四运动时担任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会长、全国学生联合会会长。五四那天，他是天安门大会的主席。为了对抗段祺瑞政府，同学们称他为"我们的段总理"，因此他也是北大出洋的"五大臣"之一。留学归来后，他先在武昌大学和中山大学任教，北伐时曾在陈果夫手下供职。朱家骅辞职后担任教育部长，他是教育部政务次长，协助朱家骅工作。

国民革命的目的是要为中国在国际间求独立自由平等。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把美国庚款兴办的清华学校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正有这个深意。我今天在就职宣誓的誓词中，特别提出『学术独立』四个字，也正是认清这个深意。

——罗家伦



北京大学"五大臣出洋"合影，后排左一为罗家伦，
其他四人为段锡朋、周炳琳、康白情、汪敬熙

据罗家伦说，段锡朋虽然久居官场，却没有沾染一点腐败习气。抗日战争期间，他主持的中央训练委员会本来是120人编制，却只有60多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看到“老百姓太苦”，想节约点开支。对于个人前程，他也有独到的见解。比如当局让他出任某部部长，他不接受。罗家伦问他为什么拒绝，他说“干政治就得要有主张，有抱负，不然，我何必去站班”。由于他在生活上律己太严，近于苦行主义，遂积劳成疾住进医院。在病中，为了节省开支，他只肯住三等病房。作为老同学、老朋友，罗家伦送去一点钱让他买营养品，他说什么也不收。病危期间，医生用氧气对他进行抢救，他知道氧气需要进口，便用微弱的声音反复说“外汇，少用一点”，令在场的人无不感动。罗家伦认为段锡朋既有儒家气概，又有墨家传统，便用“亦儒亦墨亦真诚”的诗句歌颂他的美德。

按理说，派段锡朋担任中央大学校长本来是很合适的，但由于地下党组织在中央大学十分活跃，他们在“珍珠桥事件”中还“带赤色臂章，打出共产党旗帜”。（《南京大学史》，第150页，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出版）1932年7月初，段锡朋前来上

任，不料许多学生高呼反对口号涌向校长办公室，有的上前扭打，有的砸毁汽车，致使段锡朋极为狼狈，只好仓惶离校。事情发生后，蒋介石"极为震怒，即刻下令解散中央大学。"（同上，第118页）

中央大学解散后，行政院派蔡元培、李四光、罗家伦等10人为中大整理委员会委员，对事件进行调查处理，可见所谓"解散"，其实是利用暑假进行整顿。整顿之后，罗家伦于当年8月26日被任命为中央大学校长。因此有人说他是受任于动乱之际。

二、"诚朴雄伟"与大学使命

1932年10月中旬，中央大学重新开学，罗家伦为了陈述他的理想和抱负，在全校大会上发表了题为《中央大学之使命》的就职演说。

他指出：作为校长，应该与大家共同认清大学的使命，这样才能"创造一种新的精神，养成一种新的风气"；作为首都大学，应该对国家民族担负起特殊的责任，否则办这个大学就没有意义。现在，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关头，在此国难当头的时候，中央大学的使命就是"为中国建立有机体的民族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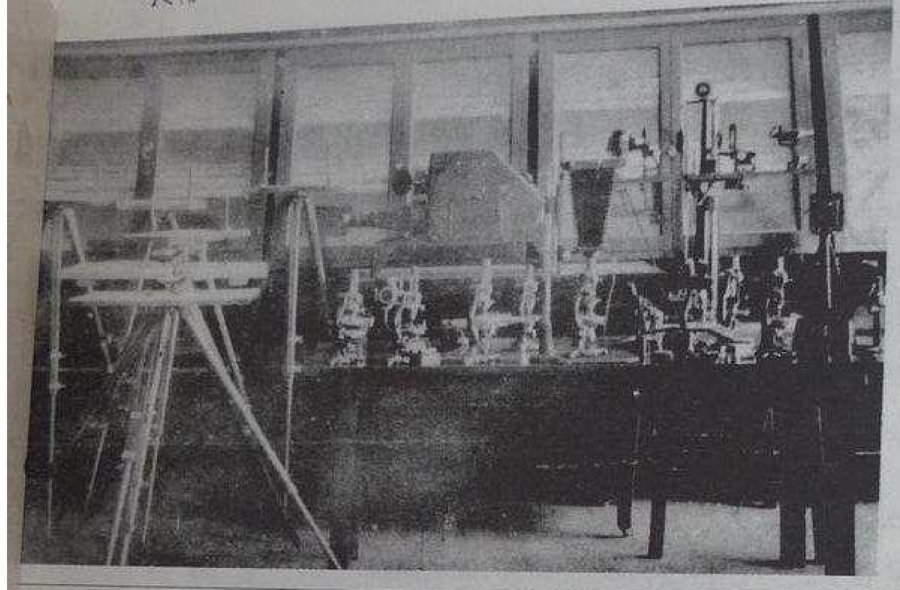
他还说，民族文化是民族精神的结晶，民族团结的基础。一个民族要自立图存，就不仅要在文化上有所创造，还必须使民族文化有所寄托。国立大学是民族文化的寄托处，如果我们不能承担这一使命，就不能塑造民族的文化精神，领导民族的文化活动。

为此，他提出要树立"诚朴雄伟"的新学风。所谓诚，就是对学问要有诚意，而不是把学问当作升官发财的途径。他说如果学者对学问缺乏诚意，文化就会堕落，事业就会败坏。所谓朴，就是以质朴的不计功利的态度埋头学问，而不是把它拿来做门面、当摆设。所谓雄伟，则是要改变中华民族体质柔弱、精神不振的状况。他认为树立并养成理想的学风，对于担负起上述使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演讲中，他还以柏林大学为例，说明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努力创造新的民族文化，比政治改革和军事改革还重要。基于这一认识，他指出"有机体民族文化"包括两个含义：第一，大家要具有死里逃

清华现在的弱点是房子太华丽，设备太稀少。设备最重要的是两方面：一方面是仪器；一方面是图书。我以后的政策是极力减少行政的费用，每年在大学总预算里规定一个比例数，我想至少百分之二十为购置图书仪器之用。

——罗家伦


中央大学地质系实验室


位于南京丁家桥的中央大学二部

生，复兴中华民族的共同意识；第二，"无论学文的，学理的，学工的，学农的，学法的，学教育的，都应当配合得当，精神一贯，步骤整齐，向着建立民族文化的共同目标迈进"。（《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42页）由此可见，罗家伦所谓"有机体民族文化"，就是要把教育纳入"精神一贯，步骤整齐"的"共同意识"和"共同目标"之中。这是否体现了集权主义的政党意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三、建设理想的学术都城

罗家伦上任后，曾提出要按照安定、充实、发展的思路重建中央大学。为此，他在精简行政机构、节约开支的同时，还是非常重视添置图书仪器和教学设备。罗家伦上任的前一年，中央大学在图书仪器方面的开支是

36582元;上任四年后,图书仪器经费共计120万元以上,每年平均30余万元,是过去开支的8倍多。"新增图书,中文及日文书籍共48265册,西文书19570册,中文杂志266种,西文杂志186种,卷册均不及计。中文书中善本极多。西文书中亦多较珍贵者,……西文杂志种数甚夥,其中……最可乐道者,则在此短期内,购齐西文全部杂志计30余种",有些图书杂志价格昂贵,也要"不惜巨资"购买。(《中央大学之最近四年》,第15-18页)这些数字,虽然与他后来在《中央大学之回顾与前瞻》中列举的那组数字有些出入(参见《文化教育与青年》第243页),但罗家伦在图书仪器和教学设备上舍得花钱,是毫无疑问的。

罗家伦说:我在中央大学"充实的不仅是图书仪器,而且还有教学人才。聘人是我最留心最慎重的一件事"。因为中央大学就在首都,一些党政要员想把亲朋好友安插进来,都被罗家伦拒绝。因此他在离任时能够问心无愧地说:"我抚躬自问,不曾把教学地位做过一个人情。纵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同上)据说蒋介石曾问教育部长王世杰:"罗志希很好,为什么有许多人批评他、攻击他,这是什么原因?"王回答说:"政府中和党中许多人向他推荐教职员,倘若资格不够,他不管是什么人,都不接受,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南京大学史》第123页)

> 图书馆不厌舒适,不厌便利,不厌书籍丰富,才可以维系读者。我希望图书馆和实验室成为教员学生的家庭。我希望学生不在运动场就在实验室和图书馆,我只希望学生除晚上睡觉外不在宿舍!
>
> ——罗家伦

1934年,罗家伦因为学校处于车马喧嚣、市气逼人的南京市区,既不利于研讨学问,又没有发展的余地,便想在郊区另觅新址,建造一所能容纳5000至10000人的首都大学。罗家伦的想法得到教育部长王世杰的支持。王世杰曾经担任武汉大学校长,他当年在珈珞山主持建造的武汉大学校园,被胡适视为"中国进步"的标志。(《走近武大》,第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正在这时,国家急需航空人才,国民政府把这一任务交给中央大学。罗家伦利用这一机会,征得蒋介石同意并经有关方面批准,首先获得240万元建筑费,他的想法开始付诸实现。

为了选择校址,罗家伦跑遍南京四郊,终于选定中华门外石子岗一带。他认为那里山林起伏,气象宏大,"不但环境优美,格局轩昂,而且其间有安置一切近代式的实习工厂和农场之余地。再加上还有一

条秦淮河的支流通过，更能增添校园景致”。他还说，这是参考了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经验，吸取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德国柏林大学的教训，才做出决定的。因此他在一首诗中把新校址誉为“理想的学术都城”，在回忆中又把它当作“玫瑰色的甜梦”。(《文化教育与青年》，第245-246页)

经过紧张的准备，新校址于1937年1月凿井，5月正式动工，预计在1938年秋季便可落成。这时的中央大学，除了文、理、法、教、工、农、医7个学院及其所属30多个系科外，还有一个附属牙医专科学校，一个实验学校，一个畜牧兽医专修科，一个航空机械特别研究班，两个研究所，一所实行义务教育的小学，22个实验农场，(同上，第187页)其规模已经蔚为大观。罗家伦说：“‘九一八’事变和淞沪战争以后，中国学术界，尤其是大学，毫不挫气，而且加倍迈进。从‘一·二八’到‘七七’这一段期间，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育进步最迅速而最沉着的时候。”(同上，第222页)中央大学是这些进步和成就中的一个实例。

四、“应该得到勋章”的成功大搬迁

然而，就在这座“理想的学术都城”刚刚开工不久，“七七”卢沟桥事变突然爆发，从而打破了罗家伦“玫瑰色的甜梦”。

当时罗家伦正在庐山开会，他听到这一消息后，知道一场大战已经不可避免，便利用招生出题的机会飞回南京，开始布置迁校事宜。在这方面，中央大学虽然比北方各大学具有地理上的优势，但是罗家伦未雨绸缪的远见卓识也不容忽视。早在一年前冀东事变时，他就让总务处做了一批大木箱，里面钉有铅皮，以防不测。庐山谈话会结束后，他先拿出550只木箱装重要图书仪器，随时准备启运。可以设想，如果事先没有准备，事到临头要找这么

罗家伦手书诗集



罗家伦一家

多木箱，是不可能的。

如何面对突然爆发的这场战争？当时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人主张在城外挖防空壕上课，有人主张迁往上海租界，有人主张迁往安徽山区，有人主张迁往江西庐山或湖北武汉等地。在这危急关头，罗家伦派几位教授分别去两湖、四川寻觅校址。这几位教授不但顾不了家庭，还可能遇上意想不到的危险。据说心理学教授王书林在湖南醴陵，居然被当地县长当作汉奸捉了起来，最后还是由担任过湖南省教育厅厅长的朱经农出面，才被释放。

经过详细考查和慎重考虑，罗家伦决定除医学院迁到成都与华西大学合并外，其他各院系都迁往重庆。为此，他征得教授会同意，又拜见蒋介石，当面陈述他的理由："第一，我断定这次抗战是长期的，文化机关与军事机关不同，不便一搬再搬。第二，所迁地点，以水道能直达者为宜，搬过小家的应该知道搬这样一个大家

的困难。第三,重庆不但军事上为险要,而且山陵起伏,宜于防空。"(同上,第224页)当时南京政府还没有迁往重庆,罗家伦为中央大学选择重庆,是明智的。

不久,敌人开始空袭南京,中央大学遭到轰炸,破坏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罗家伦认真负责,指挥若定。有一天,他刚让一批男生、女生分别从危险的宿舍搬出,那里就被轰炸,险些出了大事。他说这样做不是凭什么灵感和直觉,而是因为有一颗负责任的心。

随后,他率领教职员工在战火中井然有序地进行搬迁。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到10月下旬,中央大学不仅全部迁往重庆,还在嘉陵江畔的沙坪坝盖起可以容纳上千人的校舍。11月初,中央大学在重庆正式上课,"这个速度,不能不算是一个纪录"!(同上,第228页)

罗家伦是个诗人,即使谈这种经历,也是感情充沛,趣味盎然。他说:

> 我们这次搬家,或者可以算是较有计划有组织的;几千个人,几千大箱东西,浩浩荡荡的西上,于不知不觉中,竟做了国府为主持长期抗战而奠定陪都的前驱。这次搬来的东西,有极笨重的,有很精致的;还有拆卸的飞机三架(航空工程教学之用),泡制好的死尸24具(医学院解剖之用),两翼四足之流,亦复不少。若是不说到牧场牲畜的迁移,似乎觉得这个西迁的故事不甚完备。中大牧场中有许多国内外很好的牲畜品种,应当保留。我们最初和民生公司商量,改造了轮船的一层,将好的品种,每样选一对,成了基督教旧约中的罗亚宝筏(Noah's Arc),随着别的东西西上。这真是实现唐人"鸡犬图书共一船"的诗句了。可是还有余下来在南京的呢?我以为管不得了。所以我临离开的时候,告诉一位留下管理牧场的同人说,万一敌人逼迫首都,这些余下的牲畜,你可迁则迁,不可迁则放弃了,我们也不能怪你。可是他决不放弃。敌人是11月13日攻陷首都的,他于9日见军事情形不佳,就把这些牲畜用木船过江。由浦口、浦镇,过安徽,经河南边境,转入湖北,到宜昌再用水运。这一段游牧的生活,经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这些美国牛、荷兰牛、澳洲牛、英国猪、美国猪和用笼子骑在他们背上的美国鸡、北京鸭,可怜也受日寇的压迫,和沙漠中的骆驼队一样,踏上了他们几千里长征的路线,每天只能走十几里,而且走一两天要歇三五天。居然于第二年的11月中到了重庆。我于一天傍晚的时候,由校进城,在路上遇见它们到了,仿佛如乱后骨肉重逢一样,真是有悲喜



中央大学前身两江
师范学堂的口字房

交集的情绪。领导这个牲畜长征的，是一位管牧场的王酉亭先生；他平时的月薪不过80元！（同上，第228-229页）

对于这件事，当年还是学生的王作荣也有回忆。他说：

在所有内迁的学校中，中大是唯一事先有准备，临危又不乱，将全部图书仪器迁至后方，立即安定下来，维持弦歌不绝的一个学校。虽然其他中大老师对迁校之功甚大，但究竟不能缺少当家者的气魄与眼光。中大不仅图书仪器全部内迁，连农学院的外国种牛猪鸡等都经过一年多迢迢万里的跋涉，而到达重庆。在化龙桥附近与罗校长的座车相遇，连天烽火，几番生死，老友异地重逢，罗校长的诗人气质又来了，单向热泪盈眶，下车与那些畜牧拥抱亲吻了一番。……其实，中大的牲畜都有中大之风——朴实而有光辉。默默的走遍长江黄河，秦岭蜀山来参加抗战行列，多么朴实，多么光辉。

写完这段轶闻后，他还表示："罗校长迁校成功应得到一个勋章"。（《走近南大》，第54-55页）

需要指出的是，王酉亭先生的表现，是当时社会风气的一个缩影。据说中大附近的居民都很羡慕中大的校工和厨师，认为他们的言谈举止都有大学生之风。这也说明当年的教育是成功的。

争，不能不如此。我承认我所取的办法，有点非常，或者可以说带点霸气。但是向黑暗势力斗

——罗家伦

清华隶属系统的正轨化。我的辞职不是对于黑暗的屈服。我是要以我的辞职，换取清华基金的安全与独立，和

——罗家伦

五、用正义感和是非心转移风气

中央大学在重庆的校址选择在沙坪坝的松林坡。这里的景色很美，一边是碧绿的田野，一边是清彻的嘉陵江。远远望去，简陋的教室宿舍以图书馆为中心，鳞次栉比的散布在小山坡上，再加上松涛汹涌，花香袭人，是一个很好的读书环境。入川两年后，由于流亡青年的涌入，中央大学学生增加到2000多人，于是罗家伦又在嘉陵江对岸的柏溪建立分校。柏溪是嘉陵江支流，这里山峦起伏，恬静幽雅，风景极佳。罗家伦以松林坡的建校经验，历时两个月，又盖起校舍数十栋。这一切，都得益于当年那笔建校款。因此他感叹造化的安排使他"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在南京没有实现的理想，却在兵荒马乱中到重庆实现了。然而，就因为动用了这笔款项，最终成为罗家伦下台的一个原因。

校园建好后，重庆大轰炸开始了。面对日寇的狂轰滥炸，罗家伦总是竭尽全力保护学生。有人回忆说："一天下午敌机来袭，紧急警报已发出，大群的同学仍在人行道上游来游去。罗校长身著夏布长衫，两臂伸张，不顾自身的危险，跟在同学们的后面追赶大家进入防空洞，像个牧羊人要保护他的羊群不受伤害一样，那景象感动人极了。"（同上，第55页）

罗家伦对学生的爱护，还体现在人格的熏陶方面。抗战前，他就因为"近年来高等教育偏重知识的灌输，而缺少精神人格的训练"，（《文化教育与青年》，第158页）忧心忡忡；抗战中，有人提出要用战时教育取代常态教育，他坚决反对。他告诫大家：有人"以为知识里有一种'万应丸'，一吞下去就有用，对于按部就班的学问，不耐烦学。在这抗战的年头，不耐烦是普遍的心理，也无怪乎学生。但是知识里的'万灵丸'是没有的，世界上也决无速成的事。从前中国就害在日本的'速成法政'、'速成师范'这些学校或班次上面，造成了一班'速成大家'回到中国来，什么东西都是一知半解，做文章瞎吵却是第一。你看民国元二年国会里的人物，大部分都是日本速成的反映。'一点知识是最危险的事'，这是西方一句颠扑不破的格言。"（同上，第203页）

1941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四周年纪念日，罗家伦主持了他上任后的第十个毕业典礼。面对即将离校的学生，他是这样讲的："我首先要说的就是青年到社会上去要有伟大而坚定的抱负。抱负是由理想而生的，所以不能不先有理想。我们不要专看见物质的现实，人事的现实，而把自己埋葬进去了。"他要求大家走出



罗家伦(左)晚年在台湾担任国史馆馆长，与黄季陆合影

校门后，无论如何忙碌都不要放弃学问。因为“理想是人生事业的蓓蕾，学问就是滋养这蓓蕾的雨露”。他劝大家在工作读书之余，要留出闲暇来思考问题。在思考问题的同时，不但要读专业方面的书，还要读常识和修养方面的书。因为“现在的大学教育，往往容易造成狭隘的专家，不容易造成豁达的通才”。他还指出：如果没有坚实的学问做基础，单纯凭借学生时代的激昂慷慨或断指血书来呼号爱国，这种人是靠不住的。(同上，第 237 页)

由于害怕年轻人误入歧途，他告诫学生对黑暗势力既不要偏激反抗，又不要同流合污。以构建理想社会为目标的偏激反抗，是拿千百万人的生命作实验，将国家民族的存亡当儿戏；为攫取个人利益而同流合污，则是非常可耻的人格崩溃。最后，他希望大家不要迎合社

会潮流,要有特立独行的精神,用“正义感”和“是非心”做转移风气的工作。毕业之后,千万不要只认校友,安插亲信,因为“胸襟狭,格局小,藩篱隘,成见深的人,就无从讲风度”。只有坚持“泱泱大风”的气度,才是中央大学的作风。(同上,第239页)

六、临别赠言六大问题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学,所遇到的某些问题与八九十年代有点类似。当时社会上有一种尊重科学、发展经济的思潮,于是许多年轻人在报考大学时,首先选择的是经济类和应用类专业。对于这种情况,罗家伦在题为《一个天文学家的长叹》的文章中有所反映。

这篇文章有点像独幕剧,其中除“我”和天文学教授外,还有哲学教授、物理学教授、工程学教授、经济学教授和一位投考大学的青年。因此罗家伦在文章前面特意加了一句话:“请求读者不要把这篇柏拉图式的对话认作独幕剧。”

故事发生在寒酸的哲学教授的客厅里。“我”走进客厅时,上述几位已经在座,哲学教授正拿着一份报纸大发牢骚:“……你不看今天报上的记载吗?这个大学投考经济系的学生多到900多人;那个大学投考经济系一系的学生人数,超过投考文理师范三院学生的总和;又一个大学因投考理学院学生太少,又要补招了。经济!经济!青年岂不是在发经济狂吗?”

物理学教授是个明白人,他发表了这样的意见:“我想每个时代思想的变动,总是发动在文哲方面。你们才是精神方面的领导者,是社会思想的前驱;现在许多青年看不到这点,真是可惜。”

哲学教授接着说:“岂但青年看不到,社会上多少人何曾注意?我们哲学本来是冷门,自甘寂寞。我所可惜的是现在提倡科学的时代,大家倒把纯粹科学置之脑后。不知纯粹科学是应用科学之基础。注重应用科学而不注重纯粹科学便是饮无源之水……”

对于这种现象,经济学教授从专业角度做了分析。他说:“经济系教的并不以银行为主体,但是想来学的人,往往以进银行为目的。”由于银行的工作其他专业人才也可以做,未必非要经济系学生才能胜任,因此就形成一种奇怪的现象:“国家一方面培养人才而且需要人才,一方面又如此糟蹋人才,真是不经济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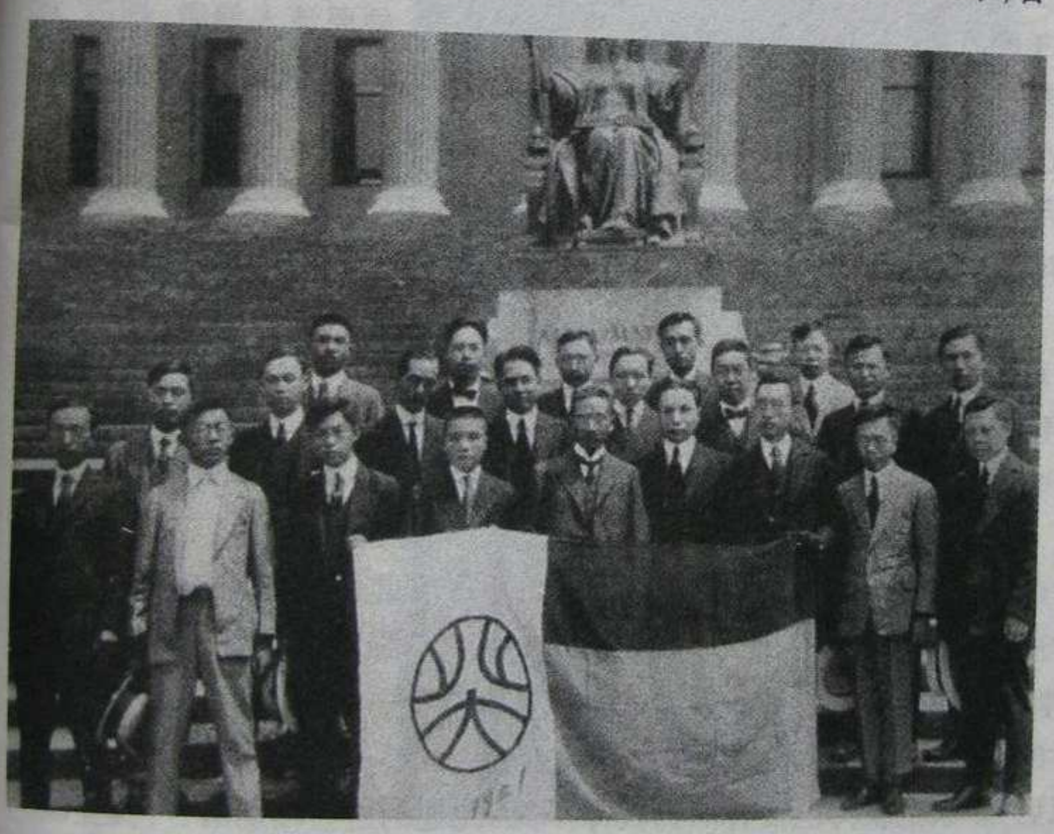
面对教授们的感慨,投考青年申辩说:同学中“投考经济系的,……都是受了

家庭的命令”；而那些不报考理工的，“乃是因为中学的数理化教育愈来愈坏的缘故”。

故事的最后，一直没有发言的天文学家仰天长叹，发出一句出人意料的哀怨：“天啊！你也得救救青年！”（《文化教育与青年》，第 256-260 页）

这时的罗家伦，已经卸去中央大学校长职务。他写这篇东西，表达了他的担忧和无奈。不过，他担任校长时还是做了许多工作的。因此 1942 年他离开中央大学回顾总结自己的工作时，还指出在青年和教育中存在的六个问题：

第一，“现在的青年对于‘现实’太看重了，尤其是对于物质的现实。我们不能不认识现实。但我们决不能陷死在现实的泥淖之中；若



罗家伦（左一）是北大“五大臣出洋”中的一员

是陷落下去，必致志气消沉，正义感与是非心一道埋灭。我们应当作什么一种人，将来为国家民族做什么一些事，这主意在大学求学时代，就应该打定的。打定之后，在这时代的立身处事，为学为人，就应

我对大学建筑计划的基本观念是：图书馆实验室一定要造向坚固，造得讲究，使人进去工作时觉得舒服。体育馆一定也要设备完好，……体育场一定要宽大，要多分几处。至于宿舍，则一定要朴素，乃至于不甚舒适。必须如此，学生才不愿意老躲在宿舍里『高卧隆中』，而乐意上图书馆、实验室、体育馆和操场，发扬青年们蓬蓬勃勃，努力上进的精神。这才是我心目中大学应有的气象。

——罗家伦

该立刻开始按照这标准做起。正当生活习惯的养成，是实现这高尚理想的阶梯。我们唱高调责备流俗，是没有用的。若是我们没有抱负而只以个人的实利主义为前提，则我们于未问世之前，已经坠入流俗的溷潴之中而不自觉。在这彷徨的人生幽径里面，只有坚定而高尚的理想，是我们前途的明灯。”

第二，“现在的大学教育的缺陷，就是太注重学生的专门知识，而太忽视其整个人生的修养。所以大学往往只能造就专才而不能造就通才。往往只能造就一技之长的有用人才，而不能造就通达事理，气度雍容的领袖人才。我不是说专门人才不要紧，我只是说一个专门人才能通达事理，气度雍容，蔚为全部或局部的领袖人才，则其将来对于国家民族的用处更大。文学哲学和艺术的修养是很重要的。这种修养，可以为你开拓意境，变化气质，调剂性灵，使你人生更加丰富，更感觉得有意义。‘质胜’‘文胜’之说，中国古来教育家已经注意到了。我们今日仍不可忽视。人生是要经过千磨万折的；若是平素没有修养，一经折磨，便要流入偏激、烦闷、横溃、或是悲观的路上去。我们要知道中国俗语所谓‘老和尚成佛要经过千修百炼’这句话，何况我们还不到老和尚的境地呢？”

第三，“现在大学的教育，往往把一个青年知识造好了，身体却弄坏了。现在的大学课程，加在不用功的学生身上固无所谓，加在真用功的学生身上，却是忙不过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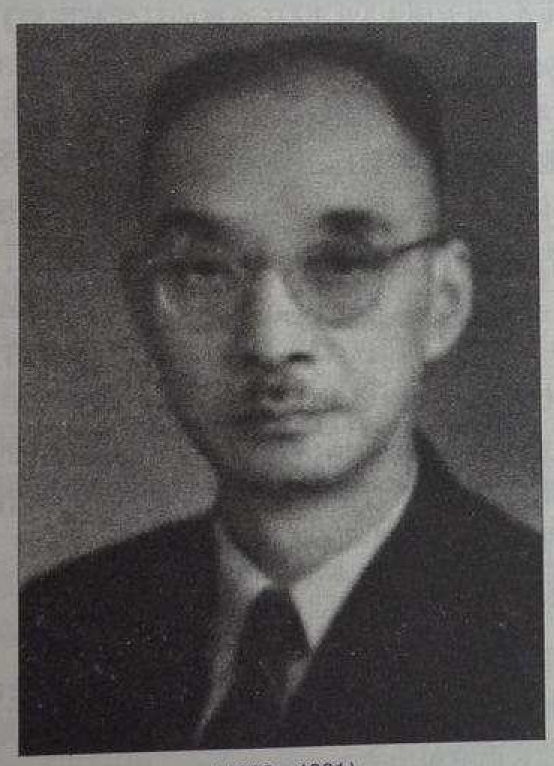
第四，“现在的青年，为时尚所趋，多倾向于应用科学，而忽视基本的理论科学。这也是不对的。在大学里基本的理论科学，尤当注重。须知应用科学是从基本的科学原理中产生出来的。应用科学将来的发展，还要靠新的原理的产生，前途才有希望。”

第五，“现在的大学太重物的组织和科学，而不曾注重人的组织的科学。”

第六，“现在中国社会上喜欢牵强附会的人太多。牵强附会是由于一知半解来的。于是科学的精神，就在这种浑沌的空气之中牺牲了。……所以我们青年对于非科学反科学的现象，必须尽力排除。”（同上，第 248-251 页）

从此以后，罗家伦就再也没有回到教育界。因此他的这些临别赠言，就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特别是在这些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更趋严重的时候。

任鸿隽与四川大学



(1886—1961)

前几年，我在《南方周末》发表《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梦》。该文引言介绍说："任鸿隽（1886 –1961）是我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月刊的发起人，也是我国最早的综合性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的领导人。作为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领导的科学救国运动与胡适发动的白话文运动，被誉为五四以来两个重大的文化革新运动。纵观其一生，他始终为科学救国奔走呼号，热情地介绍科学起源、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了解一下他那鲜为人知的思想和经历，会给我们很多启示……"（参见拙著《胡适和他的朋友们》，第1页，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年出版）当时因资料不足，篇幅有限，对任鸿隽的教育思想以及他在四川大学担任校长的经历言之不详，留下遗憾。如今我在1985年出版的《四川大学史稿》和《任以都先生访问记录》中又看到一些任鸿隽的材料，再结合任鸿隽的有关著述，觉得任鸿隽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对于当前的教育改革也有很大启示。需要说明的是，《任以都先生访问记录》是该书"记录"、台湾学者潘光哲先生所赠，在这里顺致谢忱。

一、任鸿隽的科学思想与教育主张

任鸿隽字叔永，原籍浙江归安（今吴兴），出生于四川垫江（今属重庆）。他从小勤奋好学，曾在1904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中考取秀才。废除科举后，他顺江而下去了上海，进入中国公学深造。中国公学是由当年被迫回国的留日学生创办的，其中有不少革命党人。任鸿隽入校后与该校学生胡适、朱经农等人建立了深厚的友



任鸿隽(前排左五)参加中国科学社第一次年会

谊。后来他东渡日本求学,加入同盟会并担任四川分会会长。求学期间,他除了旁听章太炎先生的国学讲座外,还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专攻应用化学。

辛亥革命爆发后,任鸿隽立刻回国,担任了总统府秘书处秘书,为孙中山起草文稿并协助处理政务。袁世凯上台后,他去北京政府当过秘书,但由于厌恶官场生活,再加上学业未竟,又以“稽勋生”(对革命有功的学生)的身份赴美国留学。初到美国,他进入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在感受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同时,也认识到科学的真谛。

任鸿隽对科学的理解和阐释与教育密切相关,其中有几点特别值得注意。

第一是科学的起源。许多人认为,学习科学知识就是为了报效祖国、振兴中华,但是任鸿隽却不以为然。他说: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固然是因为没有科学,但是却不能把科学与这类功利性目的联系在一起。因为真正的科学家,比如阿基米德、伽利略、哥白尼等人,就不是为名利驱使,而是为好奇心引诱。这也是科学首先出现在西方的主要原因。相反,如果仅仅是为了外在的功利目的而不是为了内心求知的需要,科学是不会产生也不会健康发展的。这些论述提醒我们:如果只想把科学当作一种富国强兵的手段,或者是改善生活的工具;如

科学是从原因求结果的学问。——任鸿隽

科学精神就是常识训练。——任鸿隽



任鸿隽（前排右六）参加中国科学社第二次年会

任鸿隽（后中）与赵元任（前左）、周仁（前右）、秉志（后左）、胡明复（后右）当选为中国科学社第一届董事会成员后合影留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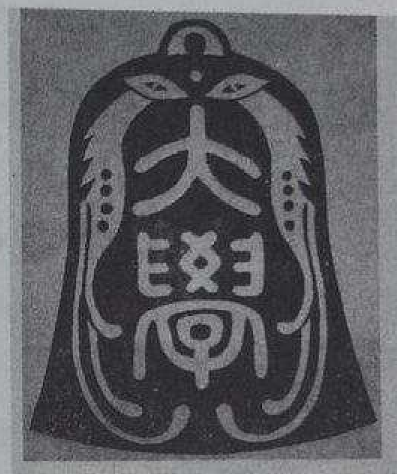
果只想从物质文明方面追赶西方，却又不晓得科学的起源和科学的真谛，其结果只能是像洋务派一样，陷入舍本逐末的老路。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当年自己为了革命、为了制造炸弹而选择化学专业也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教育不注意培养学生的求知欲和好奇心，他们长大后就不会有研究科学的内在动力，也不会把科学引向健康之路。

第二是科学精神。任鸿隽说，所谓科学精神，完全是为了追求真理而已，即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他希望科学研究和科学教育要“把事实放在思想构造的第一位，（至于）那些主义和理论，只放在第二位，或竟不管他。”著名科学家竺可桢也把科学精神概括为“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他说，要想在科学上有所成就，就必须有“不盲从、不附和、不武断、不蛮横、不苟且、不无病呻吟的科学态度”。这正是我们的教育最需要、也是当今社会最缺乏的东西。

第三是科学的功用。长期以来，许多人都把学科学、学技术当作捞取功名利禄的一块敲门砖，至于个人的兴趣、爱好，特别是那些可贵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则根本不顾。任鸿隽说他们是“为利而学”，而不是“为学而学”。这种状

况是中国科学事业举步艰难、发展缓慢的原因所在。另外，任鸿隽还反对把科学与技术混为一谈。他指出，人类物质生活的改善和技术的进步，不是科学家的最初动机，而是科学研究的必然结果。如果只重技术而不重科学，就会重复洋务运动的老路。后来，任鸿隽看到许多学生把经济学、商学和应用科学当作热门专业，而纯粹的基础科学却几乎无人问津，便感到我国科学面临着重大危机。他告诫大家：人不能单靠面包而生活，如果在物质生活之外不能发现高层次的精神活动，人生还有什么意义？他还指出，纯理论研究最需要保持心灵的自由，它不应该受到干涉，应该享受特别保护。

第四是科学与教育。任鸿隽对教育问题特别关注。他认为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强迫他学习不感兴趣的专业，从事不感兴趣的工作。他非常赞成长期在中国工作的外籍科学家葛利普先生的观点：一个人选择某个专业不是为了谋生，而是因为他喜欢这种工作。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必须热爱他所从事的专业。他还指出，中国的"学术死亡率"高达99%以上，是因为许多人在大学毕业后放弃了研究工作，这是一种很大的浪费。任鸿隽指出，一个人获得博士硕士学位，并不算真有学问；只有经过10年20年艰苦努力，才能跻身于学者行列。他强调：大学教师的职责不是贩卖知识，而是要培养学生的研究兴趣，要让他们明白科学研究的目的不在于物质享受，而在于精神满足。这是一种高尚的刺激和智识的愉快，大学生只有懂得这个道理，养成研究习惯，才能对人类有所贡献。为此，大学教师必须在独立研究中，对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具有深切的了解和体会，才能在思想和人格上对学生产生好影响。他还说，真正的科学是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主义的，把科学和物质文明等同起来，或者"骂科学是帝国主义的"，都是不明白



国立四川大学校徽

把事实放在思想构造的第一位，那些主义和理论，只放在第二位，或竟不管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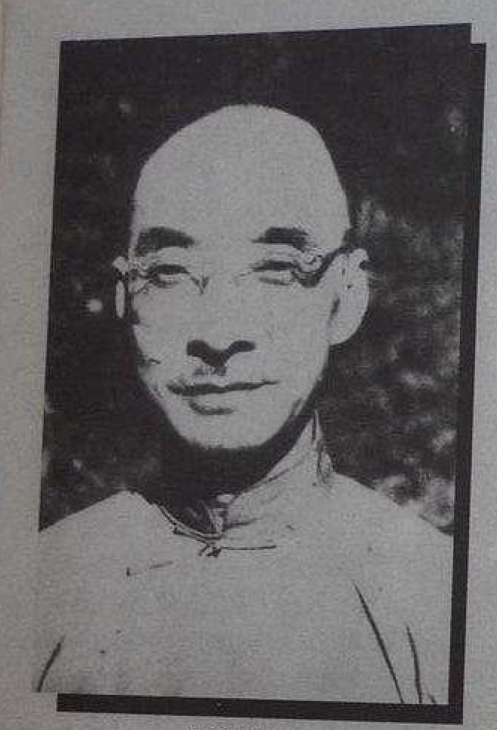
——任鸿隽

世间上只有一种学问，那便是凡以求真理为目的的，方能当得学术这个尊称。

——任鸿隽

科学的真谛。

第五是教育与独立。1932年胡适创办《独立评论》，任鸿隽夫妇参与其事，并写了不少文章。其中任鸿隽那两篇批评国民党“党化教育”的文章值得注意。文章说：“一个理想中有教育的人，在智慧方面，至少的限度，必须对事理有正确圆满的了解，对于行事有独立自信的精神。要养成这样的人格，第一的需要，是智识上的好奇心。有了智识上的好奇心，方能对于各种的问题或事务，加以独立的研究。研究所得的结果，才是我们信仰的根据。这种教育的方法，在党的立场看来，是最危险的。他们的信仰，是早经确定了的；他们的问题，是怎么的拥护这个信仰。因为要拥护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因为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所以不能有智识上的好奇心。这个情形，恰恰与17世纪初年，欧洲宗教的专制思想相类。”因此他认为：“有了‘党化’，必定是没了‘教育’；反过来说，要有‘教育’，必定要除去‘党化’。”（《独立评论》，第三号，第13－14页）



任鸿隽先生

任鸿隽手迹



任鸿隽（二排右八）和蔡元培（二排右七）、胡适（二排右九）、竺可桢（前排右四）等人参加中国科学社第 12 次年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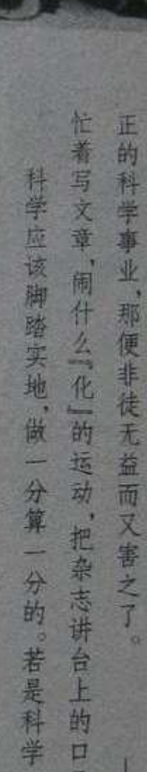
二、国立四川大学的艰难诞生

任鸿隽 1918 年回国后，担任过北京大学教授、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商务印书馆编辑、东南大学副校长、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干事长等职务。直到 1935 年他担任四川大学校长后，才有机会为家乡服务。

四川古称巴蜀，其教育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汉景帝时代。当时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办学育人，使“文翁之教”成为千古流传的佳话。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四川成立锦江书院，为当地最高学府。同治年间，张之洞主持四川学政，认为该书院以八股文为敲门砖，不符合时代要求，又创办尊经书院，鼓励学生专攻经史，从学问的根本入手，培养良好学风。此外，该书院还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计划开设天文、地理、算学、格致等课程。但由于风气未开，条件有限，未能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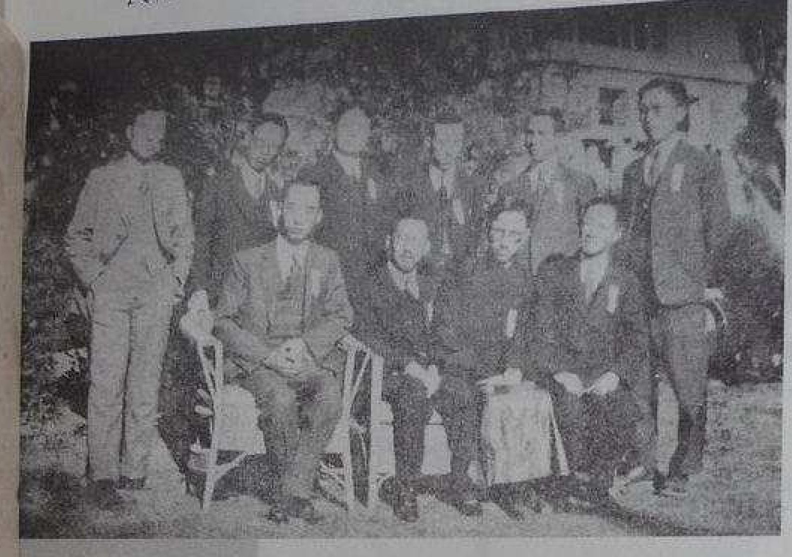
1901 年清政府开始推行新政，并于第二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当时的四川总督奎俊将锦江书院和尊经书院合并，按照京师大学堂模式成立四川通省大学堂，成为四川近代第一所综合性高等学校。不久，清政府规定“大学堂”是全国最高学府，其他学堂不能使用这个名称，该校又改名四川省城高等学堂，这就是四川大学的前身。

新政期间，新式学堂纷纷成立，迫切需要大量师资，四川通省师范学堂于 1905 年成立。随后，废科举重实学的潮流席卷全国，四川又



这实验两个字，就是近世科学的命根。

——任鸿隽



任鸿隽（前排左一）、竺可桢（后排左二）、胡先骕（前排左三）参加第三次泛太平洋学术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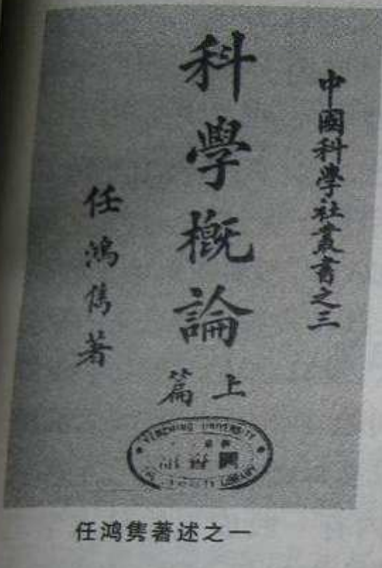
成立了法政学堂、藏文学堂、通省农政学堂、工业学堂和存古学堂。这“五大学堂”后来演变成公立四川大学的法政学院、外国文学院、农科学院、工科学院和中国文学院，最后都成为国立四川大学的一部分。

辛亥革命后，中央临时教育会议于1912的召开。为了纠正大学过滥的状况，会上决定全国只设立三所大学，其他高等学堂必须取消。于是四川高等学校（原四川高等学堂）在1916年送走最后一批学生后被迫停办。该校停办后，国立成都高等师范学校接收它的许多教师，也扩大了招生人数。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成都高师搬入新校址，成为四川全省规模最大的高等学校。与此同时，五大专门学堂也有长足发展，有的学校还培养出一些人材，比如巴金就是四川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学生。

在此期间，四川各界要求办大学的呼声很高。1919年任鸿隽留学归来后，曾向省长杨庶堪建议，应该仿效美国州立大学模式，办一所四川大学。杨省长采纳这个建议，向省议会提出咨文，省议会讨论通过。但由于政局动荡，军阀们不愿意出钱，该议案未能实现。1922年，全川教育教育在成都召开，任鸿隽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并要求在全省教育专款的肉税项目中，每年拨出四五十万元作为筹办四川大学的经费。这个意见经大会表决通过，送省长刘成勋执行。但是全省

学会的组织有两种：一种是专为自己研究学问的，一种是为开通民智的。
——任鸿隽

我们所希望于教育界的，是有一个钱就做一个钱的事，不可永远守着讨账放账的政策。
——任鸿隽



任鸿隽著述之一

肉税被各防区军阀分割，筹办四川大学的事还是被搁浅。就在这一年，后来成为“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担任成都高师校长。“他办成都高师，首先是为了培养革命人才，‘推进新思潮的扩展’，以启发学生‘走俄国人的路’，力图以马克思主义教育师生。”(《四川大学史稿》，第95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因此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应该说与此有关。

1924年春，杨森打败熊克武，独揽四川军政大权。曾经留学美国的傅振烈接替吴玉章担任成都高师校长后，重提在四川办大学的旧案。他认为只有像南京、沈阳、武昌、广东等地那样，把高等师范学校升格为大学，这件事才有进展，办学经费才有着落。傅振烈计划受到杨森的大力支持，并以成都高师名义向教育部呈报改办大学和招收预科生的章程。这一年暑假，成都高师招收第一批大学预科学生143人。第二年，成都大学正式挂牌成立。这本来是件好事，却遭到一些高师师生的反对，他们主张要改大学也只能改师范大学，意思是他们也要享受大学的名分。由于傅振坚持要办综合大学，并受到第一届预科生和全社会的支持，这所新生的大学才没有垮掉。正在这时，支持傅振烈的杨森因战败下台，由刘湘接替他的职务。有幸的是刘也一直希望四川能办一所国立大学，于是他改聘张澜为成都大学校长，并在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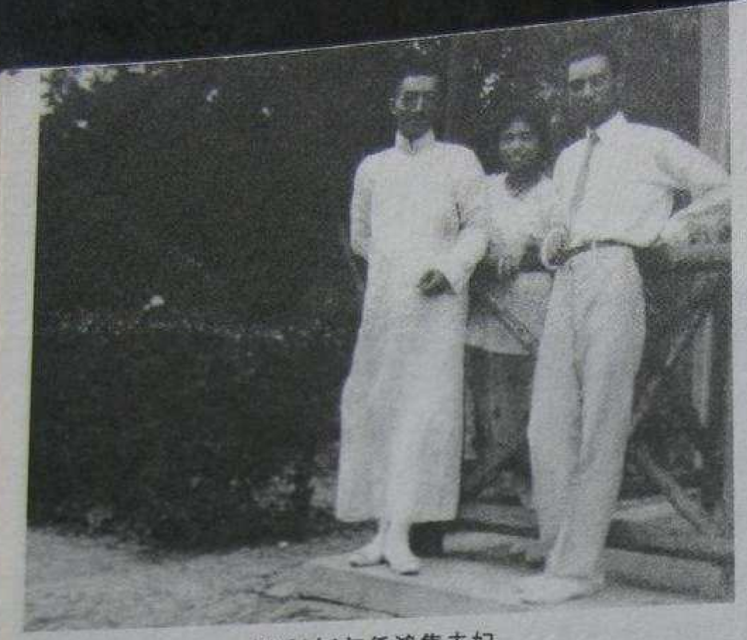
任鸿隽主办的《科学》杂志

我们只要记得研究科学的最高目的，并不在追求物质享受，而在追求真理。为了追求真理，科学家不但不暇顾及身体的享乐，甚至连性命安全也可以置之度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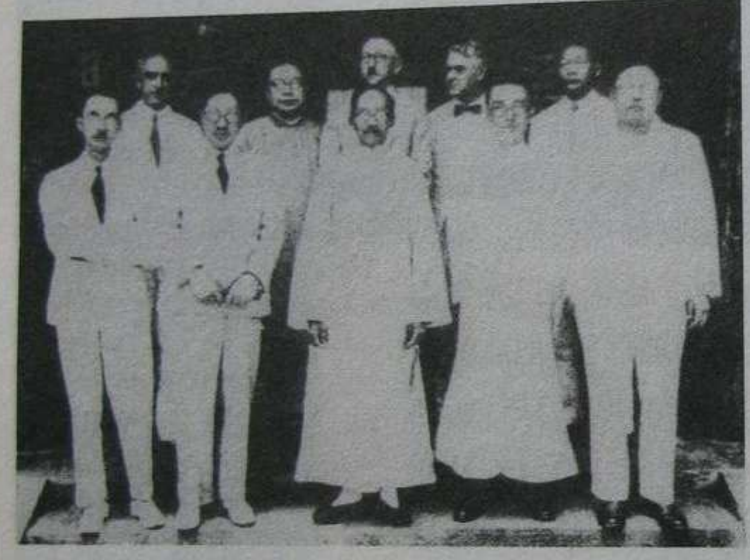
——任鸿隽

我们现在教育的口号，应该是：先人格而后技能。

——任鸿隽



胡适(右)与任鸿隽夫妇



任鸿隽（前排左一）、蔡元培（前排左三）、胡适（前排左四）与参加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第八次年会的其他董事合影留念



任鸿隽(左)、竺可桢(右)与物理学家饶毓泰(左二)、数学家姜立夫(右二)在北戴河

川善后会议上使用被称为“盐余”的税款解决了该校的经费问题。至此，四川才有了第一所综合大学。

成都大学虽然成立了，但因为与成都高师共处一校，引发不少纠纷，学生之间也冲突不断。1926 年，参加四川中学校长会议的众多校长联名致函省长公署，要求将高师改为师大，没有成功。第二年高师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刚刚诞生的南京国民政府批准国立成都师范大学成立。正在这时，全国范围内有一股成立单科大学之风，五大专门学校也趁机合并，成立了公立四川大学。公立四川大学成立后，还与成都大学发生了争夺原四川高等学校校址的纠纷，经省长公署仲裁，成都大学于 1929 年迁入原四川高等学校旧址，才解决了这些矛盾。

如此一来，四川高等教育呈三足鼎立之势。其中，成都大学经费充足，教师阵容强大，在三所大学中最具实力。相比之下，成都师范大学因为成都大学的分离而元气大伤，再加上经费和师资等问题，到 1930 年几乎陷于停顿状态。公立四川大学成立后，五大专门学校不仅没有融为一体，而且人均经费仅仅是成都大学的七分之一左右。(1930 年《全国高等学校统计》，转引自《四川大学史稿》，第 140 页)在这种情况下，该校人事变动频繁、专任教师太少、图书设备缺乏等问题，就很难解决。

1931 年 5 月，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

在训令中指出：三所大学自“成立以来，数载于兹，别户分门，叠床架屋”，应该予以整顿。10月，刘文辉召集会议，宣布由他担任委员长的四川省政府整理大学委员会成立，并提出合并三所大学的具体安排。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各方面矛盾得以化解，直到1931年11月9日，三所大学完成交接任务，包括四院11系的国立四川大学才正式成立。

三、开风气之先　极一时之选

四川大学成立后，校务由省政府整理大学委员会代行。1932年2月，经张澜推荐，国民政府任命王兆荣为该校首任校长。王上任后，为提高教育质量和学术水平做了不懈努力，但因经费等问题不易解决，使他心力交瘁，最终于1935年8月辞职。随后，国民政府任命任鸿隽为四川大学校长，并要求他尽快到校处理校务。9月初，任鸿隽飞抵成都正式上任。同年12月，他把家搬到成都，只把上中学的大女儿任以都留在北平。

早在1928年国民政府就任命任鸿隽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厅长，他没有就任。1931年，他回四川考察成都大学，希望四川的文化能与世界潮流并驾齐驱。这次出任四川大学校长，用他的话来说，是因为国难当头，“乃不得不奉命驰驱”。（《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第687页）当时的四川在蒋介石的策划和刘湘的经营下，为了阻止红军西进或北上，取消了原来的防区制，并决定军费由中央直接划拨，从而使学校经费有了保证。因此任鸿隽在1935年5月向记者说：“‘国立四川大学在西南方面极为重要，彻底整顿，数年来即有此计划，亦实有此必要。惟以往四川政局不定，整顿计划殊难实现。’现在，防区制打破，整顿川大计划乃趋于实现。”对于任鸿隽的到来，当地舆论也好评如潮，认为任鸿隽是我国学术界少有的人才，他人主川大，是四川教育界的福音，也会给四川文化带来转机。

任鸿隽上任后明确提出四川大学的两大目标和三大使命。两大目标是实现“现代化”和“国立化”，三大使命是输入世界知识、建设西

科学精神在求真理，而真理之特征在有多数之事实为之佐证。

——任鸿隽

科学事业不当偏重应用而忽略根本之纯粹科学。应用科学以易收切近之功效常易为人所重视，纯粹科学反之，故常易为人忽略。

——任鸿隽

南文化中心、担负民族复兴责任。这一切，都是为了“把川大办成一座规模宏大、师资设备齐全、有国内第一流学术水平的综合大学”。与此同时，他还把学费从20元降到12元，以减轻学生负担。因此当报纸认为，新校长“是深得从前蔡孑民先生办北大时的遗风”。(《四川大学史稿》，第178-180页)

与梅贻琦等人一样，任鸿隽也认为大学的好坏不在于有没有大楼，而在于有没有大师。因此他一上任就把聘请著名学者当作头等大事。他认为原来的教师队伍有两个问题：一是川籍教授太多，有近亲繁殖的危害；二是有些教授思想陈旧，方法不当。因此他宣布重新发放聘书，没有得到聘书的可以另谋出路。与此同时，他四处聘请著名学者前来任教。

1936年9月，任鸿隽在开学典礼上说，经过一年努力，学校在以下三个方面发生变化：

第一是学生人数大大增加，学生人数由原来的400多人已经增加到600多。新生中外省人比例很大，这种作法与国外大学招收外籍学生一样，有利于大家开阔视野，交流思想，增进友谊，也与“国立化”目标完全一致。

第二是新聘一批教授，其中有担任过厦门大学副校长和北京大学教授的著名哲学家张颐，有研究西南民族语言的闻宥，有分别在南开大学、山东大学中文系任教的戴家祥和萧涤非，有刚从英国归来的外文系教授钟作猷，史学教授范祖淹、教育学家张敷荣和刚从美国归来的心理学家刘绍禹，有在中央研究院担任过化学研究所所长的王季梁，有在北大任教多年的光学专家张宗蠡，有在比利时研究法学的刘雅声，有在浙江大学森林系任教的程复新，还有曾在清华大学任教、最近刚从美国归来的体育系教授黄中孚……前后来川大的还有曾经担任中央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桂质柏，曾在南开大学中文系任教的刘大杰，著名生物学家钱崇澍等数十人，这些人均为一时之选。据当年曾在这里就读的著名学者王利器回忆：“那时的四川大学很注意教师阵容，尽力网罗有真才实学的名家学者来校执教，学校办得很有生气，一时蔚为蜀学中心。”(同上，第183页)

第三是校舍和教学方面有所变化。在校舍方面，任鸿隽经过调查草拟了一个三年计划，要求中央和地方政府每年拨出30万元，先建一座大型图书馆，再将原校址皇城改建成一个大学城。在这个开学典礼上，任校长说虽然经费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商讨，但校舍改建的筹备工作已经就绪，马上就可以动工。1937年4月，任鸿隽再三权衡，最后决定将校址定在望江楼附近。不久，新校舍破土动工，后人



任鸿隽（左八）、陈衡哲（左六）夫妇同到北京大学担任教授，与胡适（左五）等朋友们合影留念

称这一决策很有远见。（《四川大学史稿》，第199页）在教学方面，任鸿隽认为课程标准必须注意两个原则：一要注意打好基础，“即在第一二年级，必须将中国文、外国文，及普通科学修读完毕、到三四年级时然后学习专门功课，免致好高骛远，一无所成”。二要注重培养学生自学研究的能力。他提出“本学期为免除教学上灌注式的弊病起见，除少数特别情形外，所有讲义决定完全废除。要大学生多读书，多动手笔记，以养成自动的探讨研求的精神”。（《科学救国之梦》，第545页）

任鸿隽非常注重理论联系实际。他说：“学政法的，我们可以使他们去研究地方政治，或县政实施，学经济的，可以叫他们去调查商业状况和农村经济，学农的可以叫他们去改良农作种籽，学物理化学的，可以叫他们调查及改良土壤。”（《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4卷，第2期，转引自《四川大学史稿》第187页）在他的主持下，四川大学在这方面进步很大。以农学院为例，该院师生深入田间地头，在开展双季稻栽培试验、引进优良品种、调查柑橘生产和其他农业资源、改进植棉技术和植树造林等方面，都做出许多显著成绩。更重要的是，这些活动激发了学生的研究兴趣，他们主动成立各种研究会探讨学问，从而大大增强了学术空气，丰富了校园生活。据说“从1935年到1936年下（半）

若是大学教育还有它的目的与意义的话，培养社会上健全与有用的分子，就是它的最高的目的与意义。

——任鸿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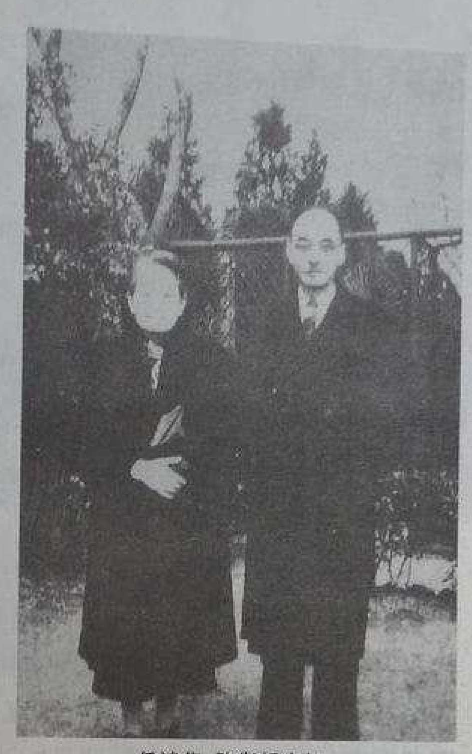
胡适(左)与任鸿隽在南京(1947年)

年，除王兆荣时期已成立的研究会外，新成立的研究会有英文研究会、史学研究会、戏剧研究会、音乐研究会、演说辩论会(分国语和英语)、奖励论文会、法律学会、体育研究会、经济研究会、国学研究会、经济地理研究会、政治学会、数学研究会、物理学会、化学研究会、生物学会、农学研究会、园艺学会、植物病虫害学会、蚕桑学会、农业经济学会、农业教育学会、社会问题研究会、青年问题研究会、妇女问题研究会、青年写作协会川大分会、新闻学会、歌咏戏剧社、绘画研究会等。许多学会的学术活动搞得十分出色，成绩卓著”。(同上，第191页)这就是任鸿隽“现代化”目标的具体内容。可见他不是把理论联系实际当作一个为我所用的口号，而是扎扎实实地注入了生动丰富的内容。

四、陈衡哲的直言和任鸿隽的辞职

任鸿隽锐意革新，有目共睹，成就很大，因此获得教育部传令嘉奖。正当四川大学步入正轨，并进入欣欣向荣的发展阶段时，突然传来正在南京的任鸿隽向教育部提出辞职的消息。川大师生闻讯后，文学院院长张颐与76名教授职员联名致电教育部和任鸿隽，进行挽留。全体学生也召开大会，并致电任校长，要求他继续主持校务。电报说：“本校自先生长校以来，校务蒸蒸日上，全校师生额手称庆。近闻先生忽将引退，群情惑然，现值本校正谋发展之

际，尚非贤者高蹈之时，万恳早日回校主持校务，不独本校，亦国家民族之幸也。”（《国立四川大学一览》，转引自《四川大学史稿》第209页）但由于任鸿隽去意已决，教育部部长王世杰于1937年6月签署了同意他辞职的训令。



任鸿隽、陈衡哲夫妇

任鸿隽的辞职原因很多，细说来主要有两个：一是他的改革触犯了一些人的利益。比如他要广纳名师，并反对把四川大学办成一个闭关自守、近亲繁殖的地方性学校，就必然辞退一些思想陈旧、教学方法落后的四川籍教师，这就引来不少人的反对。据说他上任时，曾宣布前任校长聘定的教授不算数，要另送聘书，无聘书者可以自谋出路。这一措施在教授中引起轩然大波，许多教授公开表示反对。这次反对虽然无效，但也为后来埋下隐患。

二是其夫人陈衡哲的有关文章引来恶意攻击，终于导致他们愤然离去。陈衡哲是江南大家闺秀，她从小接受新式教育，是中国第一位庚款女留学生，第一位北大女教授，第一位成功地用白话文写小说的女作家，第一位参加太平洋科学会议的女学者。1936年2月，入川不久的陈衡哲在《独立评论》上发表《川行琐记——一封给朋友的公开信》，披露她一路上的经历和到达四川后的见闻感想。这是一组分四次写成的散文，分别刊登在《独立评论》第190号、195号、207号和216号。陈衡哲是文章高手，这组散文至今给人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从第一篇文章中，可以看出她对这次远行极不适应。比如在重庆吃饭，就辣得难以下咽；从重庆到成都，因为天气不好，被折腾得够

我们以为一个学校所能给与学生最大的环境影响，莫过先生的学问与人格，其余的都可以说是次要。

——任鸿隽

科学于教育上之重要，不在于物质上之智识而在其研究事物之方法；尤不在研究事物之方法，而在其所与心能之训练。

——任鸿隽



任鸿隽和他的三个孩子

呛；到了成都以后，正值冬天，因为行李未到，房子走风漏气，又买不到火炉，让她大病一场。这一切，都让她对四川产生不良印象。几个月后，她发现这里大多是阴天，太阳难得一见，因此不仅对“蜀犬吠日”有了深切体会，而且还对云南有了真正的理解。她说，由于四川总是阴云密布，因此所谓“云南”，就是“云天云地之南”了。她还幽默地说：“‘四川’的名字不很恰当，因为一省之中，川流何止千万，那能以‘四’为限？倒不如把牠改为‘二云省’”（《独立评论》第195号，第16页）更恰当。为什么要改为二云省呢？她解释说，因为除了天气多云以外，当地人还喜欢吞云吐雾（吸鸦片）。

如果说自然环境和生活习惯还是个适应问题的话，那么文化落后和政治腐败则让她不能接受。在《川行琐记（二）》中，陈衡哲举了三个例子来说明四川的落后。一是小孩子到处拉屎、砸汽车玻璃，没有教养；二是女学生“宁为将军妾，不作平人妻”；三是许多人吞云吐雾，不把吸鸦片当作可耻的事。她认为四川的落后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军阀，二是鸦片。只有彻底销毁鸦片，人民有了奋发向上的精神，才能对军阀统治来个釜底抽薪。《独立评论》发表这篇文章时，胡适在《编辑后记》中说：“这一期里有两篇文字都是写四川的现状的。衡哲女士的‘四川的二云’写的是四川在那双层密云笼罩之下的黑暗。‘寿生’先生的‘二三十年代’里面写的那个黑暗惨酷的‘桐尖市’，他用的地

人不能专靠面包而生活。当初步的物质生活需要满足之后，跟着来的是精神生活。精神生活最显著的一例，是智识的爱好，而科学实为新智识与正确智识的来源。——任鸿隽



任鸿隽（叔永）、陈衡哲夫妇同时在《独立评论》发表文章

名虽然是捏造的，读者当然认得出那是什么地方。”（同上，第21页）

陈衡哲的文章发表后，社会上反响很大。赞成者说：“您太客气了，若由我来写，哼，我不能仅仅说那么一点。”有人甚至说：“这位陈女士真不知道黑暗哩。她那（哪）知道比她所说还要丑恶，还要壁垒森严的四川内地的情形，她说得真太少了。”还有的说：“您是外省人，您可以说真话，我们可不敢说。我们一开口，人家就骂，‘为什么你不投胎到外省父母的肚子里去呀！’”但是陈衡哲在《川行琐记（三）》中说：“这位朋友不知道，外省人说真话，也一样要挨骂的。”（《独立评论》第207号，第18页）当地的几家报纸甚至把这件事当作重要问题，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文章，并假造学生来信，说陈文是颠倒黑白，污蔑四川人的人格。对于这种状况，任鸿隽不得不在《独立评论》第215号发表《关于〈川行琐记〉的几句话》，说明言者无罪的道理以及陈衡哲的幽默和良苦用心。

平心而论，陈衡哲以她敏锐的感觉和独特的视角，反映了四川的真实情况。有人以为她是因为物质生活不好而发牢骚，她辩解说：“我们这一群人在此的最大困难却也并不尽在物质和环境上，虽然我们对于有些情形，有时也感到难受；但一想到现在正在被人吃，或吃他人之肉的四川灾民，想到了四川内地人民的流离困苦，我们也就怀着一颗惭愧的心，自动的去和环境妥协了。”她还说，在四川大学的教职员中，有一群非常努力的人。她觉得：“在一个受过军阀蹂躏的社会环

学术确是学校目的的所在。凡是与学校有关系的，无论教职员也好，学生也好，都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工作。

——任鸿隽

一个研究所最重要的条件，是勤奋的精神开发商探的兴趣，而这种空气，大半是靠一二个人造成的。

——任鸿隽

境中，竟能找到这样一群手持火把接前导后的朋友们，真不能不使人感到格外的钦敬。”（《独立评论》第207号，第19-20页）这些话都是非常真诚的。

大约在1937年年初，陈衡哲离开四川，先行回到北平。她的离开，可以用她自己在《川行琐记（四）》中的话来形容：“一个受过教育者的最重要的品性，第一是自尊。他不能让一个在泥里打滚的人，把他也拉到泥里去。”（《独立评论》第216号，第8页）在这篇文章里，她还讲了两个爱管闲事的故事，大意是管闲事本是为了对方好，但是却受到对方的责难。这明显地表达了她在四川的处境。不过，她认为即便如此，也不能撒手不管。因为好人不管闲事，会让罪恶增加。因此她的大女儿说：“我想家父离开四川多少是有点遗憾，虽然他从来没有对我们表示过，但我设身处地来假想，倘若我抱着一腔热切的期望，想要建设一番事情，结果却不欢而散，自然也会感到很失望。但他始终不谈这件事，只是淡淡地说，事情既然到这个地步，我们所能做的就这么多，以后就让他们接着办罢！”

陈衡哲在《独立评论》发表《川行琐记》

任以都还说：“那时的四川，落后闭塞得不得了。他们刚到成都，便有许多不认识的人一窝蜂跑到他们住的地方来，说要来看博士，问他们看什么博士呀？他们就回答说来看女博士。家母看到这个场面，觉得啼笑皆非，因为她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就算拿到了，女博士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诸如此类的事情，让她深深感到四川的文化实在太落后了，加上家母又是心直口快的人，言语间常常透露出对四川的不满，可以说她是不太喜欢四川的。没想到后来抗战期间，又到四川住了好些年。”（《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第89-90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八十二年出版）另外，从陈衡哲去四川没有退掉北平的房子来看，她本来就没有做长期打算，因此他们的离去，也是意料中的事情。

五、"希望能做一个屏风"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任鸿隽夫妇去香港将子女送往美国并交代了中基会的财产后，又返回大陆。随后他们定居上海，担任过一些名誉职务。任鸿隽回来的一个最大愿望，就是维持中国科学社及其事业，但是从1950年到1960年，中国科学社及其所属《科学》杂志、图书馆、研究所和所有房产资金，一个也没有保住。到了1961年11月9日，75岁的任鸿隽与世长辞，可以想象他走的时候心情多么沉痛。任鸿隽去世后，他在美国的儿女连回国奔丧的念头都不敢有。据说任家在上海有一座别墅式小洋房，人们称之为"任家花园"。但是1974年任以都第一次回国时，她看到母亲的"生活环境很差，住的地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的《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封面是任鸿隽的大女儿任以都在哈佛图书馆门前

大学生四年毕业，并非教育的终了，乃是教育的开始。
——任鸿隽

严格说来，凡没有设立毕业院或研究所的都不能称为大学。
——任鸿隽

方几乎比抗战时期还不如”。（同上，第 116 页）

1962 年，长期被眼病折磨的陈衡哲应子女要求，写了《任叔永先生不朽》。其中谈到多年前任鸿隽曾经对她说：“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和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同上，第 194 页）这一细节也许有助于解读他们夫妇离开四川的原因。在此之前，她还写过许多诗词，其中有一首《浪淘沙》是这样的：

何事最难忘，知己无双：“人生事事足参商，愿作屏山将尔护，恣尔翱翔”。
山倒觉风强，柔刺刚伤；回黄转绿孰承当？猛忆深衷将护意，热泪盈眶。

（同上，第 196 页）

1976 年 1 月 7 日，陈衡哲没有等到“文革”结束，在上海去世，享年 86 岁。任以都记得母亲曾经对她说过这样的话：“我们那一代人出去留学，都有一个理想，就是学成归国，要为国家、人民尽点心力、做点事。你们这一代却根本对公众的事，没有什么理想，只愿念个学位，找份好差事，这算什么？”（同上，第 120 页）

如果说任以都那一代已经是“没有什么理想，只想念个学位，找份好差事”的话，那么如今的人就更严重了。我想，这就是我们与五四先哲的巨大差距，也是大家怀念他们的主要原因。

胡先骕与中正大学的命运



（1894—1968）

《不该遗忘的胡先骕》是2005年出版的一本好书。作者胡宗刚长期致力于生物学史与知识分子的研究，因此在描述生物学家胡先骕方面，下了不少功夫，也有很大优势。相比之下，该书在介绍胡先骕担任中正大学校长时，却略微显得单薄。诚如胡宗刚先生所说，胡先骕不是一个困守书斋的专家，而是一位关心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从上世纪20年代初到40年代末，他一直对教育问题非常关注，并发表过许多很有见地的文章。他出任中正大学的首任校长，这是一个重要因素。但由于多年来急功近利的教育早已造成一条很难逾越的专业鸿沟，再加上《胡先骕文存》的发行量太小（只有900册），使今人对生物学家胡先骕的教育思想了解很少。因此，仔细梳理胡先骕的教育理念，可以为当前的教育改革提供某种借鉴；认真反思胡先骕与中正大学的命运，可以找到教育危机的根源所在。

一、毛泽东说"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

胡先骕（1894-1968）字步曾，江西永新人。他的曾祖父胡家玉，是道光年间的探花，担任过贵州学政、太常寺卿、都察院左都御史等职。胡先骕以"步曾"为字，是要步曾祖父的后尘，以便光耀门庭。

胡先骕开口很晚，到两岁才会说话，家里人曾以为他是哑巴。正因为如此，他记忆力很强，四岁左右就认识几千个字，并开始学《论语》和《诗经》。据说，胡先骕五六岁时，家里来了客人，曾在酒席上以"五龄小子"考他，他马上以"七岁神童"相对，满座为之惊讶。后来他父亲（一说祖父）去陕西做官，他与母亲到码头送行。临

开船时，他呈上一张小方纸，上面画着乌云密布，水鸟低飞，小船逆水而行，旁边还有题诗："连日风和雨，孤舟远远行。"船至汉江，他父亲恰好遇上画中情景，便续了两句："可怜儿七岁，犹解宦游情。"1904年，胡先骕在南昌府应童子试，文章写得很好，却因为在交卷时不慎滑倒，被泥水弄脏试卷，未被录取。当年的主考官沈曾植是胡家玉的部下，虽然对这孩子非常赏识，却也无能为力。考完后他去沈府拜师，看到家中到处是书，便暗下决心，一定要像老师那样学富五车，名扬四方。（参见《缅怀先翁胡先骕》，《国立中正大学》第166-169页，江西文史资料第50辑；《不该遗忘的胡先骕》，第12-14页，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出版）。



青年胡先骕

1909年，胡先骕考入京师大学堂预科，因颇有诗名，被誉为"太学十君"之一。在此期间，他曾经随张之洞晋见慈禧太后，后来又参加了慈禧、光绪的葬礼。由于家庭出身和所受教育，胡先骕具有浓厚的忠君思想。辛亥革命后，他在母亲的熏陶和科学救国思潮的影响下，对植物学产生兴趣，并以此为终生志业。

1912年，他考取江西省赴美留学资格，于第二年进入加州柏克莱大学农学院。1915年加入中国科学社，开始在《科学》发表文章。1916年，他学成回国，先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担任英语教师，后来回到江西，担任庐山森林局副局长，开始从事专业工作。1918年，受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聘请，担任农科教授。1922年该校扩充为东南大学后，胡先骕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生物学系。据说他"讲课从不发讲义，只板书标题和少数科学名词，而着重要学生去多读植物学家的传记和旅行记"。（《学林散叶》第2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

吾省不办大学则已，欲办则必须办一模范大学。

——胡先骕



胡先骕(前左二)与江西省选派的第一批留美学生(1912 年)

1923 年胡先骕再度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完成《中国有花植物属志》，这是学术界首次对中国植物进行的全面整理。留学期间，他不仅研究植物分类学，而且受到西方公共知识分子的影响，开始关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问题。1925 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到南京，在东南大学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工作。

当时，中国第一代生物学家大多聚集在南京。为了把研究活动推向北方，大家决定在北京成立一个研究机构，胡先骕是其中最积极的倡导者。1928 年，北平静生生物调查所在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资助下正式成立，著名农学家秉志担任所长，胡先骕担任植物部主任。由于秉志还要负责南京中国科学社生物所工作，无法两头兼顾，所以静生生物所所长很快就由胡先骕接任。

静生所主要任务是开展生物资源的调查和采集工作，并进行分类学研究。上世纪 30 年代，静生所在胡先骕领导下取得丰富的成果，胡也当选为中国植物学会会长，成为中国植物学界的领军人物。1935 年中央研究院成立评议会，他当选为评议员。在此期间，他还创办了庐山植物园、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积极开展植物调查活动。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先骕认为自己是国际知名学者，日军不敢随便动他，便留在北平，准备潜心于科学研究。但由于他多次去重庆开会，招致日军怀疑，迫使他于 1940 年留在大后方。不久，国立中正大学在江西成立，他被委任为该校首任校长，但是还没有等到第一届学生毕业，他却因为保护学生而黯然离去。1945 年抗

日战争胜利后，胡先骕重新主持静生生物所工作。他一方面为战后重建四处奔走，一方面发现具有“活化石”之称的水杉。这一重大发现轰动了国际科学界。

这时国共两党之间重启内战。1948 年 8 月，胡先骕参与发起成立一个类似英国工党的政党，想用合法斗争的手段，谋求中国的政治出路。不久，国内政局发生急转直下的变化。胡先骕本想离开大陆，但因为舍不得植物学事业，才留了下来。新中国成立后，静生生物所被纳入中国科学院系统，胡先骕也成为该院的一名研究人员。在 50 年代初思想改造运动中，他是重点对象，不断受到批判。有人指责他不愿意骂一声“蒋匪”，是没有和蒋介石划清界线。他私下说：“我不能骂蒋介石，骂了蒋介石，就等于变节。”

1955 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并选举学部委员，胡先骕因为反对苏联生物学权威李森科的伪科学等原因而落选。第二年 4 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陆定一在发言中提到胡先骕还不是学部委员时，毛泽东一边说“那个人是很顽固的”，一边又说：“恐怕还是要给，他是中国生物学界的老祖宗。”尽管如此，他还是与学部委员无缘。

书生报国今春时，我们是动员群众的试金石。
——胡先骕

二、留美归来，慨叹教育危机

胡先骕从 1916 年留美归来到 1923 年再度留美，正好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由于思想认识上存在巨大分歧，他对陈独秀、胡适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一直持批评态度。1922 年初，他与梅光迪、吴宓共同创办《学衡》杂志，成为中国文化保守主义者的一个阵地。一开始，他除了直接批评胡适的《尝试集》之外，还发表过一篇译文、一篇论文。这两篇文章都与教育问题有关。译文是哈佛大学著名教授白璧德的一个讲稿，题为《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胡先骕文存》上卷，第 72-81 页，江西高校出版社 1995 年出版，书中旧式标点，本文引用时酌情改动)发表于《学衡》第 3 期。该文介绍了西方新人文主义的教育理念，也表达了胡先骕的文化取向。

英国有句格言，牛津大学拔了刀，全国跟着跑。我要做到中正大学拔了刀，全国跟着跑。
——胡先骕

随后，他又在《学衡》第4期发表《说今日教育之危机》(同上，第82-90页)，正式提出自己对教育的看法和主张。该文开门见山说：近年来中国教育的改革来自西方文化的压迫。改革之前，中国的旧式教育虽然不重视物质科学的研究和科学的方法，但是其中"人文主义之学问，如经学文学史学等"，却不亚于欧洲中世纪的水平。不久前兴起的新文化运动虽然有普及教育、重视科学、促进民主等作用，但由于西方文化危机已经到来，如果我们放弃传统文化，只知道一味地学习西方，就只能是买椟还珠，前途"日趋黑暗"。这就是当前教育危机的症结所在。

紧接着，作者对教育的功能作了分析。他说教育的作用有两个：一是养成治事治学的能力，二是培养健全的人格，二者不可偏废。他认为西方教育虽然受功利主义的影响，但还有宗教补救；中国没有宗教，却有传统文化可以起到相应的作用。洋务派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以中学修身，以西学治事的意思。遗憾的是许多人把

留美时期的胡先骕(二排右一)



提倡传统文化当作抱残守缺，而一般青年又以为教育的唯一目的就是治学治事，于是他们往往把成为一个文学家、科学家、实业家、政治家或学问家当作自己的理想，至于正心修身的旧学功底，或者"以道义相砥砺圣贤相期许"的社会风尚，则被彻底抛弃。

在这里，胡先骕把养成健全人格当作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正确的。他提出的即便是专家学者未必是一个人格健全的人，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问题是，他对洋务派"中体西用"观的解释虽然也有道理，却没有指出其维护专制统治集团利益的本质特征，这恐怕与他的家庭影响有关。另外，他把治学与修身对立起来也是有问题的。蔡元培等人一再告诫青年，读书不是为了当官，也不是为了找个好饭碗，而是为了研究学问，就是因为研究学问与人格修养是一致的，二者并不矛盾。


青年胡先骕

在这篇文章中，胡先骕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五四新文化运动。他认为欧美留学生回国后，拥有很大的知识优势和就业优势，因此他们既有广泛宣传西方功利主义的资格，又有无情诋毁中国传统文化的能力。但由于他们既不重视传统文化，又不能对西方文化做深入研究，因此好一点的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差一点的则成为赚钱的机器，或曰功利主义的奴隶。至于那些"自命为新文化之前锋者"，也和这些人没有什么差别。他们求学时，唯一的愿望就是想在社会上争名夺利，因此本来没有什么修养，还喜欢标新立异。结果只能使西方偏激思想风靡全国，中国传统文化归于灭亡。因此，他们是

当前教育危机的制造者，比西方功利主义的为害更大。与此同时，胡先骕对刚刚传入中国的共产主义学说，也表示了异议。在此基础上，胡先骕提出：欧美留学生既是教育危机的制造者，也是这一危机的解救者。他认为"今日中国社会之领袖，舍吾欧美留学生莫属"，挽救中国教育的使命，必然落在他们的肩上。

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出胡先骕早年对教育的思考基本上是针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其中虽然有不少偏激的被批评为顽固、守旧的情绪和观点，但也有某些合理的成分值得思考和研究。

三、二次归来，讨论教育问题

1925年，胡先骕留美再次归来，担任东南大学教授，发表过几篇讨论教育问题的文章，分别涉及到留学政策、师范教育、大学独立和博士考试等方面的问题。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情绪化批判已经很少，理性化思考大大增多。

关于留学政策，胡先骕是在《留学问题与吾国高等教育之方针》(同上，第284-299页)中提出来的。该文发表于《东方杂志》22卷第9期(1925年)，是一篇上万字的长文。文章说，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以前，中国去欧美留学者唯一的特点就是不通中文。后来中国留学生在美国创办《科学》杂志，有人拿给詹天佑看，詹表示非常吃惊，因为他没想到留美学生居然能够办中文杂志。胡先骕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当年留美幼童的中文水平太低，因此他们学成回国后，影响不会很大。清末推行新政，掀起赴日本留学高潮。为了接待大批涌来的中国人并迎合他们急功近利的心理，日本人开办了许多速成学校。速成的后果，就是对所学的东西一知半解：你说他懂吧，他并不是真懂；你说他不懂吧，他还能应付两下。于是这种人所造成的危害，比完全不懂的人更严重。因此胡先骕指出，留日学生的"最大之短处，在不肯耐心由日本高等学校肄业以至帝国大学卒业，故鲜有高深之学问"。另外，日本大学的课程重视理论，不重视实习实验，所以胡先骕在文章中又说：这些留日学生回国后，因为缺乏实际经验，往往只能是"坐而言不能起而行"。那些在专门学校毕业的，也因为学术根基太浅而不能搞独立研究，所以他们回国后除了在官场、学校或军队里混事外，很少能够胜任技术性工作。相比之下，由于到美国留学的难度更大，美国大学又重视实用，再加上美国的民主制度为国人所向往，因此留美学生、特别是庚款留美学生就大受欢迎。他们不仅在大学里任教，还分布在铁路、工



胡先骕与中正大学龙门读书会会员

厂和银行等领域，其成就也引人注目。但是留美学生也有问题：一是有些人不通中文，既缺乏本国文化底蕴，又不可能对欧美文化有深刻理解，这种人充其量也是一个“仅有职业训练而未受教育之人”，如果让他们“为社会之领袖，其影响之恶可知矣”。二是有些人为了混张文凭，宁肯读二三流学校也不敢报考第一流大学，这其实是为了学位放弃了学问。

胡先骕介绍说，日本的留学政策有两个特点：一是为了与名人交往，以便增长见识，他们给留学生发放的津贴很高；二是为了开展研究，他们鼓励有工作经验的大学教授二次出国留学。相比之下，我国留学生的津贴只是日本的一半，而许多人认为让大学教授二次出国，等于夺去别人的机会。他还指出，如果派遣留学生仅仅是学习普通大学课程，而不是为了研究高深学问，乃是重大失策。

关于高等教育，胡先骕提出两点意见：一是主张教育独立，二是倡导通才教育。关于第一点，他说解决留学问题不过是治标之策，只有教育独立，才是治本大计。文章中提到即使国家民族之间有矛盾或隔阂，学术界也应该保持友好关系。在这方面，留学生具有增进两国关系的特殊作用。当时他就估计，中国的留日学生可能起不到化解矛

盾、消除战争的作用，这也被他不幸言中。至于第二点，他以生物学为例，说有些学生以为学了生物系的课程，就可以成为生物学家。殊不知研究生物学首先要通德文和法文，因为这是治学的工具；其次要懂拉丁文，这是分类学的钥匙。此外，研究育种学和植物生理学需要微积分知识，研究生物演变需要历史地理知识，研究土壤学和生态学离不开地质学，研究植物营养学离不开物理化学……更重要的是，通才教育的基础是文史知识，这些知识对人格的陶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他认为，单纯的专业知识不但不能造就第一流专家，而且还可能影响人格的健全发展。胡先骕的两点意见，大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明确当今教育改革的方向。

在这篇文章中，胡先骕还说中国人有一种“学位万能”的误区，以为一旦获得博士学位，就无所不知。“殊不知区区博士学位所需之研究，实至有限，……而硕学如严复梁启超者，又何尝在外国大学，得一博士头衔乎？”

他还指出，许多人想学工商政法，其实是升官发财的观念在作怪。为了让“智识界不为利禄所蛊”，他提出中国应该办研究院，大学教授应该分教学和研究两种，应该以优厚的待遇支持学术研究。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改变老师待遇太低的状况。此外，他还批评用量化方式来考核教师的作法，认为这种作法对教师的教学和研究有害无益。

1925年，胡先骕还在《甲寅》杂志发表《师范大学制平议》，(同上，第300-303页)批评当时的师范教育。胡先骕说，欧洲各国不仅没有师范大学，就连教育学也仅仅是文科的附属课程。美国人虽然对教育学颇有研究，但是也没有专门的师范大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师范大学不过是为了培养中学教师，而中学教师只要读完普通大学，再学一两年教育学、心理学就完全可以胜任，因此，设立师范大学没有必要。但是为什么中国的师范院校这么多呢？他认为这是从日本学来的。这种急功近利的做法使师范学生除了教育学之外，对其他学科往往是浅尝辄止，这样就不可能培养出合格的教师。

就在这一年，东南大学爆发大规模学潮，胡先骕在《东南论衡》上发表《东南大学与政党》(同上，第304-305页)的评论。这次学潮是因为撤换校长郭秉文引发的，故称之为“易长风潮”。学潮的背景和经过相当复杂，学界内部和社会各界也众说纷纭。胡先骕是东南大学教授，他在文章中首先批评了国民党是一个不能容忍异己的政党，而研究系的反复无常也使它“终难成一强有力之保守党”，然后指出：郭秉文与军阀政客周旋是不得已的事情，目的是为了学校的发展。他虽然在学术和

政治上没有一定主张，但他还是使东南大学成为一个“不受政治影响专事研究学术之机关”。胡先骕认为这一点非常重要，是关系到教育能否独立的大问题，因此不应该“责人过苛”。

1933年，胡先骕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论博士考试》。(同上，第333-335页，《独立评论》第三卷，第64号)胡适与胡先骕曾被称为“南北二胡”，早在1922年《学衡》创刊后，胡先骕就发表长达2.5万言的《评尝试集》，严厉地批评胡适的诗集是“卤莽灭裂趋于极端”的“必死必朽”的文学，无论形式还是精神，“皆无可取”之处。胡适对此并未计较，只是在《尝试集》第四版自序中说：“这几句话，我初读了觉得很像是骂我的话；但这几句话是登在一种自矢‘平心而言，不事漫骂，以培俗’的杂志上，大概不会是骂罢？”紧接着胡适幽默地说，胡先骕教授把陀思妥耶夫斯基和高尔基的小说也称为死文学，让他们“陪我同死同朽，这更是过誉了。”(《胡适全集》第2卷，第816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到了1930年，由胡适负责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成立时，胡先骕也是委员之一，由此可以看出胡适的气度。《独立评论》创刊后，胡先骕写过几篇文章，其中多数涉及生物学领域，只有这篇文章讨论教育问题。当时教育部准备举行博士考试，胡先骕认为这是鼓励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举措，因此表示支持。同时他还提出，应该成立一个诸如中央研究院评议会之类的荣誉机构，对国内最有成就的学者表示鼓励。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是1935年成立的，不知与胡先骕这个建议有没有关系。

四、艰难时期出任中正大学首任校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先骕继续留在北平，潜心科学研究。有人找他担任伪职，被他坚决拒绝。据他的儿媳符式佳回忆，1939年他曾经偷偷去过重庆，然后潜返北平。第二年二月他又离开北平，再次到重庆开会。由于他的言行已经引起日伪的注意，因此他只好去了昆明。第二次去重庆，是为了参加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第五次年会，因为蔡元培逝世，还要选举中研院院长。后来去昆明，则是为了看望儿女，并亲

教育不可过于标准化。
——胡先骕

我们一生的精力不应该限于职业，在从事职业之暇，应善自利用时间，去追求真善美，去追求世上无穷的知识。
——胡先骕


担任中正大学校长时的胡先骕

自主持他创办的农林所。符式佳说，初到昆明，胡先骕住在挚友任鸿隽家，她在那里第一次见到未来的公爹。当年7月，胡先骕为大儿子和符式佳主持订婚仪式。9月，教育部任命他担任中正大学校长，他便离开昆明去江西泰和赴任。

中正大学是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了发展地方教育，向蒋介石建议成立的。为此，蒋介石拨出200万元作为创办经费。当时江西省会城市南昌已被日军占领，省政府迁往泰和，中正大学的校址就定在泰和的杏岭一带。据说，为了物色大学校长，熊式辉还颇费了一些周折。开始他想请晏阳初，后来又想到蒋廷黻、吴有训等人，最后才决定由胡先骕担任。中正大学以蒋介石字号命名，是为了纪念这位领导全民抗战的首脑。对于这件事，胡先骕在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中交待说："那时陈立夫本来是想任命吴副院长（按，指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去做校长的，而我却是蒋介石所特别赏识的人，我对于做官没有兴趣，此次却做了第一任纪念国民党领袖的大学校长，我是引以为荣的，所以我便毫无迟疑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不该遗忘的胡先骕》，第127页）胡先骕对于蒋介石，曾经有一个由严厉批评到产生好感、进而相互信赖的过程。蒋介石没有因为胡的批评而耿耿于怀。

除了蒋介石的赏识之外，胡先骕出任校长可能与他的籍贯有关。据说熊式辉开始想把学校定为省立大学，但陈立夫不同意，只好改为国立，因此找一位江西籍人士出任校长，容易让各方面接受。

另外，胡先骕对家乡教育特别关注。早在1926年，他就在《东南论衡》发表《致熊纯如先生论改革赣省教育书》，（《胡先骕文存》上卷，第321-326页）提出自己的主张。熊纯如即熊育锡，此人在清朝末年就开书局，办学校，并担任过江西省教育会副会长，辛亥革命后又担任江西军政府教育局长，用胡先骕的话来说，是该省教育界泰斗式人物。



庐山植物园成立合影，前排左一为胡先骕

在这篇文章中，胡先骕提出五个问题：一、宽筹经费，二、广延人材，三、免收学费，四、改进学风，五、道德教育。他认为教育经费是提高教师待遇、购买图书设备的保障。"吾省不办大学则已，欲办则必须办一模范大学。"从这篇文章看，胡先骕对于应该办个什么样子的大学以及怎样才能办好大学是有过充分考虑的。十几年后他能够当此重任，显然与他一直思考教育问题有关。

中正大学是1940年10月31日正式成立的。为此，蒋介石专门发来训词，其中谈到他的教育主张是"文武合一"、"术德兼修"。"所谓文武合一者，即恢复古代以六艺为教之主旨，俾吾在学青年之精神体

魄生活习惯，均无愧一战斗军人之标准。所谓术德兼修者，即谓教育之功用，不仅在传习知能，而当以造就人格为基本。”教育部长陈立夫也书写训词以示祝贺，熊式辉还为奠基石写了碑文。碑文曰：“本大学敬奉我民族领袖之名而名之，开创于战时，建立于战地，断垣破瓦中留此轰炸不烂之石奠其基。巍巍乎我民族复兴之精神堡垒，庄严伟大，百世之辉。”(《国立中正大学》，第 228-229 页)从当时的情况看，中国人在最困难的抗日战争中，能创办一所有高标准要求的国立大学，是了不起的。



中正青年剧社演出《阿 Q 正传》海报，蒋经国、谢兆熊主演

五、率真可爱的人格风范

据中正大学学生回忆，开学那一天，胡先骕“身著马褂长袍的中装礼服，鼻梁架著一副宽边玳瑁眼镜，上唇还蓄着一小撮希特勒式髭须”，主持了开学典礼。一周后，他在周会上对同学们说：“在国外的知名大学，如牛津、剑桥，学生们是很难见到校长的，在校四年，一般可能只有两次见到校长的机会；一次是始业典礼，一次是毕业典礼。今天，诸生能够如此轻易地见到我，这是你们毕生的荣幸。”周会结束后，大家对这段开场白议论纷纷。有人说：“哇！好大的口气！”有人说：“从来没见过这么自负的人！”也有人说：“我们的校长率性得可爱！”(《国立中正大学》，第 7 页)

无论别人怎么说，胡先骕的率真自负是一贯的。后来他在广西大学讲演，一开始就说：“我是国际国内都有名的科学家，我的名字早已在历史上注定了！诸生今天能够听到我的讲演，这是你们莫大的荣幸！”此言一出，全场哗然，有人还发出嘘声，但胡先骕却视若无睹，继续他的讲演。讲演结束后，掌声四起，经久不息，说明大家对他的认可。

胡先骕致胡适手迹

胡先骕主持中正大学时，经常请本校名师和校外名人发表演讲。每次讲完，胡先骕都要做个总结。当年到中正大学演讲过的校外人士有张治中、陈立夫、朱家骅、邓文仪、熊式辉、蒋经国、吴有训、陈嘉庚等等，据说胡先骕的总结往往比演讲人还要精彩。有一次，本校文法学院院长马博厂作完学术报告，胡先骕居然毫不留情地提出批评，并且说："想不到马院长不学无术，一至于此！"据中正大学的学生说："马院长的确也是个处世圆滑的人物"(这可能是胡先骕不喜欢他的主要原因)，再加上"他事先的准备不够，讲学的内容较为贫乏"，因此也只能怪他自己。(同上，第 9 页)



在抗战中牺牲的中正大学教授、战地服务团团长姚名达烈士



1944年，姚名达之妻巴怡南携子女与学生在丈夫墓碑前留影并题诗志意

在胡先骕的带动下，中正大学师生把自己命运与战争的胜负、国家的存亡和民族的兴衰紧紧联系起来。1942年，日军发动浙赣会战，先占领上饶、鹰潭、抚州等地，进而向吉安、泰和一带扑来。中正大学一边准备疏散，一边成立战地服务团，由胡先骕担任名誉团长，著名教授姚名达担任团长，赴赣北等地慰问。为此，胡先骕专门撰写《中正大学组织战地服务团之意义》。战地服务团团歌慷慨激昂，其中"书生报国今春时，我们是动员群众的试金石"等句，更是催人奋进。

姚名达先生出身于清华研究院，受业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梁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就是他纪录整理的。此外他还有《中国目录学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章实斋年谱》、《程伊川年谱》等著述问世。战地服务团组建时，期末考试刚刚结束，团里一位学生问姚先生试卷看完没有，姚先生回答说："早看完了。战地服(务)团的团员一律80分以上。你是82分。"这位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的学生听了以后，有些不以为然。他说："那末对其他同学有点不公平罢？"没想到这句话却把姚先生激怒了，他用炯炯有神的目光盯住这位学生，严肃地说："你以为我不公平？你是读过旧书的人，总该知道'士先器识而后文艺'这句话。"说到这里，姚先生又提高嗓门说："一个做学问的人，最要紧的是做一些立身处世的真学问。别人在准备逃难的时候，你们参加战地服务团，虽未必真能收到什么服务效果，却至少可以有一点振奋民心士气的作用，你们也可以体验一下实际的战场生活，这



在抗战中牺牲的中正大学学生吴昌达烈士

是当前第一等的真学问。光读几句死书，强记几个朝代、年号，有什么用呢？”（同上，第155页）

说到考试，还要插进来一个话题。当年的师生对考试都有自己的理解。比如俞调梅先生喜欢在星期天考试，但他“出的考题单凭念书本是不容易做出来的”。（同上，第3页）又比如在学校的规章制度中规定：“考试时不得舞弊，凡舞弊者不论情节轻重，一律勒令退学。这一点全校已形成风气。不少教授在考试时离开考场，而学生同样认真考试。不会发生舞弊行为。”（同上，第75页）勒令退学有点过分，但是同学们在无人监考时也不会作弊，却让当代人有一种“白头宫女说玄宗”的滋味。

话说回来，姚名达一行在前方不幸与日军遭遇。他用日语向敌人说明自己的身份，却无济于事；无奈之下，他只好赤手空拳与日寇展开搏斗，不幸中弹牺牲，同时牺牲的还有学生吴昌达。消息传出，海内外为震惊。包括《新华日报》在内的各路媒体都多次报道他们的英勇事迹。不久，江西省政府在中正大学礼堂为两位烈士举行公祭，各界人士和中外记者前来参加，曾出现从“码头到杏岭，沿途路祭，万人痛



1944年中正大学第一届毕业生纪念章

哭"(同上,第160页)的感人场面。据一位校友回忆,他在学校看到胡校长哭过两次,一次是这一年春末夏初,学校50多人感染疟疾,有半数"英年早逝",学校举行公祭,"校长踉跄而至,恸哭失声,久久无法自抑"。另一次就是"当姚、吴两烈士的灵柩运抵学校大礼堂时,校长抚棺大恸。此情此景,至今历历在目"。(同上,第15页)

然而到了1949年以后,这两位烈士却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1952年的一场洪水中,烈士墓被冲毁,墓碑也当了抽水沟的垫底石,居然无人过问。"文革"期间,杏岭烈士墓更是惨遭破坏。直到1987年,民政部才为姚名达颁发"烈士证书",1990年,吴昌达的遗骸也被迁至浙江长兴烈士陵园。至于商务印书馆和上海古籍出版社先后再版姚名达先生的目录学著述,则表达了文化学术界应有的价值取向。

六、提出"精神改造"的五点要求

胡先骕担任校长后,一心要把中正大学办成一所知名的高等学府。他曾经说:"英国有句格言,牛津大学拔了刀,全国跟着跑。我要做到中正大学拔了刀,全国跟着跑。"(同上,第1页)为了实现"名人名校"的办学理念,他先后请来蔡方荫、俞调梅、戴良谟、张闻骏、周拾禄、叶青、雷洁琼、王易、欧阳祖经、姚名达(又名显微)、王宗和、刘乾才、潘大逵、卢润孚等人担任教授。有一位名叫郭善洵的学生后来赴美国留学,最终成为知名的电脑专家。1978年,他应清华和中国科技大学邀请多次回国讲学,留在国内的老同学问他改行有没有困难,他不假思索地说:"当年正大有那么棒的老师,使我大学四年学到的专业基础理论很扎实,后来虽一再改行,毫无困难。"(同上,第20-21页)

中正大学建校之初,拥有三院九系,即文法学院的经济系、政治系、社会教育系,工学院的土木系、化工系、机电工程系,农学院的农艺系、畜牧兽医系、森林系,另外还有一个研究部。第二年,文法学院增设文史学系,农学院增设生物系。胡先

骕是生物学家，他本人有深厚的文史修养，因此非常重视文史研究。为此，他在杏岭山坡上建起一栋两层楼房供研究部使用。楼内辟有中山室和资料室，收集了大量资料，聘请了研究教授，既领导着校内的学术研究，又为师生们提供了方便。

除了研究院之外，学校图书馆的藏书也比较丰富，其中有"各种中英文书籍、刊物也不少，很多影印的外文书，纸张低劣，字迹不清，但总算满足了学生读书的需求。"(同上，第4页)为了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学校还建有实验室和实习工厂。当年负责采购的万发贯回忆说，他曾经去福建购回一批图书和物理实验仪器，去桂林运回几十台机床，途中既有日军，又有土匪，其危难程度非亲身经历实在难以想象。(同上，第132-136页)试想，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候，中正大学能够尽可能添置图书设备，真不容易。

除了图书设备之外，胡先骕的学生的思想状况和精神需求也非常关心。他认为，中国在物质生产方面远远不如日本，之所以能够坚持抗战数十个月，完全是因为我们有一种同仇敌忾的精神。为了赢得胜利，他在《精神之改造》(《胡先骕文存》上卷，第352-355页)中向学生提出五点要求：

第一，尽管我们周围有许多不法奸商和贪官污吏还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但无论对国家还是对自己，那都是一条自取灭亡的道路。因此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必须改正。

第二，为了抗战的胜利，我们在心理方面要养成坚忍不拔的自信心和奋发图强的进取心，在生理方面要养成整齐清洁、守时守信的好作风。

第三，人总有一死，与其默默无闻地生，不如轰轰烈烈的死。因此，"苟且偷生的习惯必须革除"。

第四，不要贪图过分奢侈的生活，更不要以不正当的手段获取非法报酬。汪精卫、周佛海等人都是为了追求名利、贪图享受才沦为汉奸的。因此"自私自利的企图必须打破"。

第五，好高骛远、向往革命是青年的"通病"。但是，"中国只有大贫小贫之分，并没有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产阶级"。何况这些国

大学教育，既贵专精，尤贵宏通。
——胡先骕

同时规定学生舍专业课程外，必须选习相当数量之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科学美术等课程，以收『自由教育』之效。将专业课程之修习时间大为减少，而将自由选课之时间加多，
——胡先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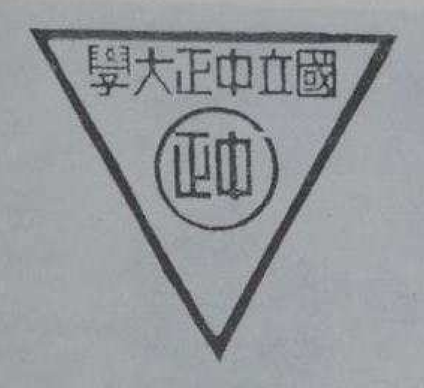
胡先骕(前排左六)与中正大学生物系首届毕业生合影

家正在通过累进税等办法“自然而然的走向均富的路”。因此,那种“纷歧错杂的思想必须纠正”。

另外,他在《如何获得丰富快乐之人生》(同上,第356-360页)的演讲中对学生们说,“物质享受是一种低级趣味”,丰富快乐的人生并不需要获得很高的物质享受。现在许多人求学的目的不是为了精神的需要,而是为了找到一份好工作。这种人的志向未免太低了,将来也很难获得丰富快乐的人生。他举例说,有一位美国工程师挣了很多钱,但是退休后却无聊得很。买了汽车,很快就玩腻了;买了留声机,却不懂得音乐;对于读书和美术,也没有什么兴趣。最后只能郁郁而死。

胡先骕指出:“古今中外名人乐于过简朴生活的,不胜枚举。”中国古代圣贤所谓“一箪食,一瓢饮”,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与古希腊人追求真善美的精神是一致的。所谓真,就是真理,它包括精神上的真理和自然界的真理。前者有中外先哲留给我们的遗产,足够一生去研究;后者的范围广阔无垠,也足够我们毕生去探求。至于美的欣赏和善的修养,也完全可以充实每一个人的生活,使人生充满快乐。因此他认为“我们一生的精力不应该限于职业,在从事职业之暇,应善自利用时间,去追求真善美,去追求世上无穷的知识”,这才能获得丰富快乐的人生。

七、为保护学生而辞职



国立中正大学校徽

1943年上半年，中正大学青年剧社在泰和城内举行义演，演出话剧《野玫瑰》。第二天，当地的《民国日报》刊登一则简讯："国立中正大学青年剧社昨晚公演话剧《野玫瑰》，演出成绩欠佳，秩序尤成问题。"该报由国民党江西省党部主办，消息刊登后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因此激起学生的强烈反弹。

关于这则简讯的来历，至少有两种说法。其一来自当年的政治系学生，后来担任过台湾校友会理事长的谭峙军；其二来自当年经济系学生，后来在长沙某中学担任教师的邹嗣奇。谭峙军说，当时他正在主持这个剧社，公演第一天，《民国日报》一位姓项的记者把自己的招待券送了人，却带着女朋友强行入场，还搬了两张椅子挡住观众视线，造成通道阻塞。负责前台事务的同学劝他购票入座，他一口拒绝。于是维持秩序的警员只好在观众的嘘声中把他们赶了出去。但是，自称前台主任并负责后勤和对外联系的邹嗣奇，在几十年后写的加快文章中却没有提到这个情节，而是说开幕不久，一盏汽灯从舞台顶上掉了下来，引起台下骚动，幸亏演员经验丰富，才使剧场秩序立即恢复正常。


晚年胡先骕


台湾国立中正大学校长林清江

无论如何，《民国日报》的简讯激怒了学生，他们找报社交涉，认为这个报道失实，影响了剧社的演出声誉，要求予以更正。但是报社方面却始终虚与委蛇，毫无解决问题的诚意，直到义演结束，也没有任何表示。在多次交涉终无结果的情况下，学生们在情绪失控的情况下一哄而起，把报社砸了个稀烂，并且围攻了省党部，迫使省党部头头越墙而逃。事件发生后，日军乘机大做文章，胡说什么国立中正大学反对抗战，与中国国民党发生激烈冲突。蒋介石闻讯也非常生气，责令朱家骅等人严肃处理此事。为此，陈立夫和朱家骅先后来到中正大学，正在重庆的胡先骕也赶回学校。

胡校长回来后，马上把谭峙军找来，在详细了解当时的情况后，对他说："事情已经过去有一段时间了，现在你冷静想一想，为什么一定要去打报馆？难道没有别的方法可以解决？"然后扬了扬手说："你不要不经思索便急于回答我的问题。你冷静的想想，想清楚了，再回答。"谭峙军想一半天，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便回答说："报告校长！我想过了！我实在仍然想不出更好的法子。——因为，当事件发生之后，我们已经把一切能做而该做的都做过了。"胡先骕听完后，平静而慈祥地说："事情过去了这么多天，你仍旧认为除了采取野蛮手段而外，别无其他方法可以解决，可见得也并非一时冲动。"说到这里，谭峙军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他完全没有想到校长会说出这样的话。胡先骕接着说："不过，年轻人动辄打架，总是不好的！你们也应该受点儿处分。……既然不是你一个人闯的祸，那么好汉做事好汉当，你叫所有去打过的同学大家签名，你去吧！"谭峙军正要出门，胡先骕又叮嘱说："你不要签第一名，这种事儿没有什么锋头好出的！你懂不懂！"（同上，第14页）

谭峙军回到宿舍，召集同学们在两张大纸上不规则地签了名送了过来。第二天，公布栏贴出布告，对签名同学给予处分。对于这件事，邹嗣奇的说法大同小异。他说，胡校长回来后，曾召集全校师生大会，他在会上幽默了几句，然后掏出一张条子，提高嗓门说，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着中正大学校长迅即返校，惩办为首学



胡先骕（前排右四）与中正大学生物系全体师生（1946 年 6 月）

我们一生的精力不应该限于职业，在从事职业之暇，应善自利用时间，去追求真善美，去追求世上无穷的知识。

——胡先骕

生"。但是怎么惩办你们呢？我看还是惩办我吧！都是我教育无方，使你们闯下大祸。接着胡校长又将复电中央的内容向大家介绍一遍，其中有"教育无方，责任在我，事件已平息，对学生已作处理，未便变更"云云。最后胡校长说，尽管如此，我对你们还是要做点处分的。凡是去打了报社的，签上一个名，各人记大过一次，但是不取消你们的助学金，也不影响你们毕业和毕业后找工作。（同上，第 64 页）

不久，胡先骕果然辞职。对于他的离去，邹嗣奇是这样说的："我们的老校长，赤诚待人，爱护学生，牺牲自己的精神，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同上）谭峙军则说："校长不惜以崇隆名位作了牺牲，来保全一群该受到严厉的、甚至开除学籍处分的学生；就像一只慈爱的老母鸡不顾自己的安危去庇护一群小鸡仔一样。校长的这一片'燃烧自己、照亮学生'的苦心与爱心，怎能不令人毕生感念！"他还说："一年之后，当我们这一届同学领到毕业证时，证书上署名的竟然不是步公校长！不少同学内心明白，自己的这张毕业证书实在是以校长的牺牲作为代价"换来的。（同上，第 15 页）其实，胡先骕是非常看重这份工作的。他有言："（大学校长）在欧美各国欧美以名流硕学充之。如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聘艾森豪威尔元帅为校长，即其一例。而在中国过去亦极重视大学校长之人选。过去无论矣。自民国建立以来，北京大学先后为严几道、马相伯、蔡孑民所充任。以校长为一时之人望，故能增加大学之

尊严,有名之学者亦易礼致。”(《不该遗忘的胡先骕》,第120页)

关于胡先骕的辞职,胡宗刚另有看法。他在《不该遗忘的胡先骕》中说,胡先骕辞职表面上看是因为《民国日报》事件,其实是蒋经国所为。当年蒋经国为了扩大自己势力,想把中正大学迁往赣州,被胡先骕拒绝。因此他向蒋介石进了谗言,才迫使胡先骕辞职。

八、抨击专才教育,关注教育改造

胡先骕辞职后,仍然继续关注教育事业,并于1945年底发表长篇文章《教育之改造》。该文与后来发表的《思想之改造》与《经济之改造》构成一个系列,阐述了他在抗战胜利后全面改造中国的主张。

《教育之改造》(同上,第406-428页)大约15000言,分7个部分。在第一部分“教育之目的”中,胡先骕首先指出教育与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所谓生活是指人生的一切活动,它“包括谋生之知能,物质之需要,身体之发达,保健之方法,求偶生殖之知能,求知之欲望,情感之发泄,道德感与美感之满足,宗教伦理之信仰,德性之修养,政治社会之活动”等许多方面,因此教育的目的,在于指导与训练每一个人,使人人都能在生活中尽量发展潜能,并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他认为我国的教育制度远远不能担负起这一重任。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在第二部分“生活教育之长成及其变质”中,胡先骕分析了问题所在。他说,我国古代教育中的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曾着眼于人生的全面发展。当时在小学教洒扫、对应、进退,在大学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广义的生活教育。只是后来逐渐偏重于知识教育和文字教育,才使教育与人生脱节,以致后患无穷。他认为这种情况是从汉武帝时代开始的。汉武帝为了奖励学术,立五经博士,用高官厚禄引诱读书人,致使求学不是为了生活、而是为了功名利禄,也使生活教育难以继续。清朝末年,虽然废除了科举制度,但是许多人上学仍然是为了文凭、为了获得一种资格而已。他痛切地说:“国家与家庭每年耗费亿万资财、个人也要花费一生中三分之一的光阴来受教育,却学了许多与生活不相干的事,这不是最大的悲哀和浪费吗?”

紧接着胡先骕在第三部分中分析了我国抄袭欧美教育制度的流弊。他说,我

国现代教育制度是从欧美学来的，由于欧美教育基本上是“囿于求知”，不大重视个人修养，因此我们的学生在学校里所学的知识，也仅仅是为升学做准备，如果不能升学，就几乎没用。即使是升了学的学生，也只知道学习专业知识，根本不注意道德修养和待人接物之道。至于国家大事和现行法令制度，更是茫然无知。因此，这种人除了专业知识外对其他事物几乎一无所知，他们既没有精神寄托，又缺乏个人爱好，一旦有点闲暇，除了酗酒赌博或放荡人生外，什么也不会干。这都是教育的失误。

基于上述判断，胡先骕在第四部分中提出要“确定我国之教育目标”，创立我国的教育制度。为实现这一目的，他认为首先要检讨全部课程的内容，看看究竟应该设立哪些科目，应该用多少时间“研究修身之道”，用多少时间“研究应世接物治事之方”，用多少时间“研求如何作一国家之世界之公民”，用多少时间“研求专科之学问”，然后再编制一种“生活学”的课程，让学生在个人修养和知识技能方面都能有所提高，并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胡先骕还说，我国古代教育是文武合一，德术兼备；如今的教育是有术无德。有德无术，还可以努力做人做事，有术无德，则不可能成为君子，只能是个小人。

在第五部分“教育改造之要旨”中，胡先骕提出改造教育的12个点意见，其中第一点就是“教育不可过于标准化”。他尖锐地指出：教育不仅要普及，还要培养天才；由于人的天赋不同，才能各异，比如综合能力较强者分析能力就弱，喜欢文艺美术的可能不喜欢数理化，因此只有因材施教，才有可能挖掘每一个学生的潜质。现在的问题是人们对物质文化过于崇拜，把数理化捧得过高，让它们在升学考试中占有很大比重，这样一来，所谓高考就和当年的科举制度差不多了。此外，他还分别提出并阐述了“适应学生个性”、“培养高尚人格”、“建立宗教信仰”、“发展劳作教育”、“国民教育职业化”、“政治经济知识之培养”、“发展健康教育”、“求偶生殖与育儿知识之传授”、“女子教育之改进”、“重视美育”、“师范教育之改进”等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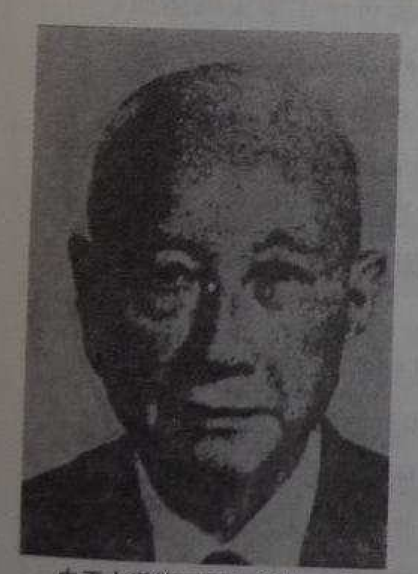
作为一个生物学家，他对教育问题考虑得如此全面，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在第六部分中，他还提出“改造教育制度之具体方案”。其中涉及到义务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侨民教育等问题。在高等教育的改造中，他所提出的大学校长和大学教授的资格与标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他说：大学是培养领袖人才的地方，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学府。大学校长的地位极其崇高，政府当局和整个社会应该


中正大学第二任校长萧蘧

把他们“尊为宾师，决不可视同一般之高级政府官吏”，否则就会让各种事务束缚他们的手脚，也容易使南郭先生滥竽其中。大学教授必须是“学术宏通品德高尚，可为青年表率者”，才能胜任；“品德不足以为青年师表者，虽有专门学问”，也不能聘任。为此，政府与社会也应该对大学教授“优其礼遇，丰其俸给”，使他们能够专心做“育英才潜心学问之盛业，而不为外物所诱”。

胡先骕认为“大学教育，既贵专精，尤贵宏通”。他强调：不应该让大学生的知识过于专业化，而应该让他们有自由选修课程、自由研究学问的机会。他认为大学课程设置的弊病是限制太严，必修课太多，结果是“大学教育在过度专业化积习之下，遂造成无数未受宏通教育之专家”。这些人的专门学问也许还可以，但是“高等常识，一般学术上之修养，则太嫌不足”，这种情况“尤以学应用科学如农工医商者为甚”。他还指出：“今日医学界之专业化，实为人类之灾难。”

胡先骕告诫人们，更重要的是，如果“以此等专家领导国家社会，其害有不可胜言”之大。欧美大学之所以重视“自由教育”，就是基于这个道理。挽救的办法是：“将专业课程之修习时间大为减少，而将自由选课之时间加多，同时规定学生舍专业课程外，必须选习相当数量之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哲学科学美术等课程，以收‘自由教育’之效。”另外，胡先骕还再次抨击了“速成”思想。他说求学不仅仅限于大学四年，而是一辈子的事。只有“愿献身数十年潜修学问，以谋国利民福者”，才能充当政府的首脑或顾问。胡先骕的这些看法，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正大学第三任校长林一民

九、后　话

胡先骕去职后，中正大学校长由萧蘧担任。萧是江西泰和人，早年就读于清华，后留学美国，毕业后曾在国内外多所著名大学任教。他本来也是很好的校长人选，抗日战争后他还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准备在庐山白鹿洞一带建立永久性校址，但由于内战期间学生运动此起彼伏，终于迫使他辞去校长职务。萧走后，中正大学校长由林一民接任。不久，迁校规划搁浅，这时的中正大学，已经发展为 5 院 18 系的规模，并拥有教师 181 人，其中教授 65 人，副教授 46 人，讲师 17 人，助教 53 人，在校学生保持在 1000—1400 人之间。

1949 年 8 月，中正大学因政权易手，改名为国立南昌大学。随后江西省人民政府决定，以南昌大学和江西八一革命大学为基础，将江西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农业专科学校、体育专科学校等合并进来，成立新的南昌大学。这可能是新中国第一轮合并大学之举。当时南昌大学拥有政治学院、工学院、农学院、理学院、文学艺术学院和体育专修科。但是没几个月，江西八一革命大学重新恢复，南昌大学又经历一次不大不小的折腾。

这还不算，到 1952 年院系调整时，南昌大学更被彻底肢解：实力最强的农学院除了森林系一分为二，分别并入华中林学院和南京林学院，畜牧兽医系的畜牧专业合并到华中农学院之外，剩下的部分从南昌大学独立出来，成立了江西农学院。与此同时，数学系、生物系、文史系、外语系、物理系、电机工程系、土木工程系、电机工程专修科、机械工程系、经济系、体育专修科等系科，分别并入中山大学、武汉大学、湖南师范学院、华南工学院、华中工学院、华南师范学院、中南财经学院、中南体育学院、中南土木建筑学院、中南矿冶学院和华中师范学院。这次调整，共调出学生 1233 人，教师 159 人，使这所大学几乎成为一座“空城”。到 1953 年，南昌大学改名为江西师范学院时，仅剩师范专修科一个专业，留下来的教师只有 74 人，其中教授 10 人，副教授 19 人。这样一来，曾经在抗日战争中弦歌不绝、并且为这场战

大学教授必须是学术宏通品德高尚，可为青年表率者，才能胜任；品德不足以为青年师表者，虽有专门学问，也不能聘任。

——胡先骕

大学是培养领袖人才的地方，是一个国家的最高学府。大学校长的地位极其崇高，政府当局和整个社会应该把他们尊为宾师，决不可视同一般之高级政府官吏。

——胡先骕


00737913


晚年胡先骕

争做出重大牺牲的国立中正大学，便不复存在。至于胡先骕本人，在经历了一系列磨难后，于“文革”中去世，享年74岁。

1982年2月，台湾成立国立中正大学筹备委员会，1989年7月1日，国立中正大学在台湾嘉义县问世。至此，原本在江西创办的这所大学，在台湾获得了新生。几年后，江西省政协主办的文史资料出版《国立中正大学》专辑，提出“让海峡两岸携起手来，让记忆的光环重塑今日的辉煌”！（见该书概述）在这本书中，还有一份中正大学青年剧社的海报。从海报上看，这次演出是为了“庆祝首届青年节暨筹献青年号飞机”，演出的剧名是《阿Q正传》，主演是蒋经国和谢兆熊。

我想，历史的记忆的确非常重要，但如果没有真正的认识和行动，所谓“重塑辉煌”，也只能是望洋兴叹。


38.8042
Z64

- 强国之道，不在强兵，而在强民。强民之道，惟在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

——蒋梦麟

- 教育是给人戴一副有光的眼睛，能明白观察；不是给人穿一件锦绣的衣服，在人前夸耀。

——胡　适

- 所谓大学者，非谓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

- 只知道压迫着学生读死书的学校，结果不过是造出一群“病鬼”来，一点用处也没有。

——张伯苓

- 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

——竺可桢

- 近年来高等教育偏重知识的灌输，而缺少精神人格的训练。

——罗家伦

- 大学生四年毕业，并非教育的终了，乃是教育的开始。

——任鸿隽

- 大学教育，既贵专精，尤贵宏通。

——胡先骕

北京硕良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策划


ISBN 7-5354-3225-5

9 787535 432254 >

定　价：22.00 元